中共中央西北局
陕甘宁边区政府
在马蹄沟

主　编　董万寄
副主编　冯腾飞　梁　瑞
编　辑　栾世宏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三　秦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共中央西北局陕甘宁边区政府在马蹄沟 / 子洲县史志办编著. -- 西安 : 三秦出版社, 2015.11

ISBN 978-7-5518-1174-3

Ⅰ. ①中… Ⅱ. ①子… Ⅲ. ①陕甘宁边区（代军区）—史料 Ⅳ. ①K26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76436号

中共中央西北局陕甘宁边区政府在马蹄沟

主　编　董万寄　　子洲县史志办公室编

出版发行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三秦出版社
社　　址　西安市北大街147号
电　　话　（029）87205121
邮政编码　710003
印　　刷　中煤地西安地图制印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成品尺寸　170mm×240mm
印　　张　14.25
字　　数　140千字
版　　次　2015年12月第1版
　　2015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3000册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18-1174-3
定　　价　86.00元

网　　址 http://www.sqcbs.cn

序

子洲，物华天宝、人文荟萃，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光荣的革命传统。近年来，子洲政通人和、百业俱兴，史志工作有了长足发展，专题史志也崭露头角，所谓盛世修史正当其时。

本书是县史志办同志辑录的中共中央西北局、陕甘宁边区政府在马蹄沟的一段史实，史、事、人、文兼有，内容丰富多样；实录与文学并举，笔触灵活多端。对县志有拾遗补缺之价值，对政事有学习借鉴之裨益，对社会有匡正风气之功效，较好地发挥了存史、资政、教化作用。

当前，县委、县政府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共同致力于实力子洲、幸福子洲建设事业，希望广大干部群众牢记前人不朽功绩，弘扬革命传统，艰苦创业，务实工作，勇于担当历史发展重任，努力开创子洲美好生活。希望从事文化、史志工作的同志和社会有识之士积极投身史志事业，抢救保护珍贵史料，深入挖掘时代价值，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为繁荣子洲文化事业做出新的成绩，为“两个子洲”建设

贡献更大力量。

在此，对县史志办的同志和参与本书编辑的工作人员付出的辛勤劳动致以敬意。

中共子洲县委副书记　焦延平

2015 年 6 月 16 日

陕甘宁边区政府驻地上院

陕甘宁边区政府驻地下院

陕甘宁边区政府驻地在张圪崂村，是村民张永安家的一组院落，坐落在山沟的中部。上院十二孔窑洞，呈不对称三角，下院十孔窑洞，正面六孔，侧面两层四孔，1947 年 6 月 11 日，陕甘宁边区政府从白庙岔迁到这里，林伯渠主席率边区政府在这里生活工作了 50 多天。

中共中央西北局驻地

中共中央西北局驻地在水浇湾村，是王姓村民的一组院落，正窑五孔，两边各有厢窑三孔，穿过西边厢窑的通道，是一院四孔很深的土窑。

陕甘宁边区政府办公厅驻地

陕甘宁边区政府办公厅驻地在马蹄沟村，是村民栾万魁家的一组院落，在大山的脚下，正面三孔窑洞。为了照顾当时随行的老幼病残，周围仅有的六孔石窑洞和几孔土窑洞，便是转战陕北时老人队的驻地。

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驻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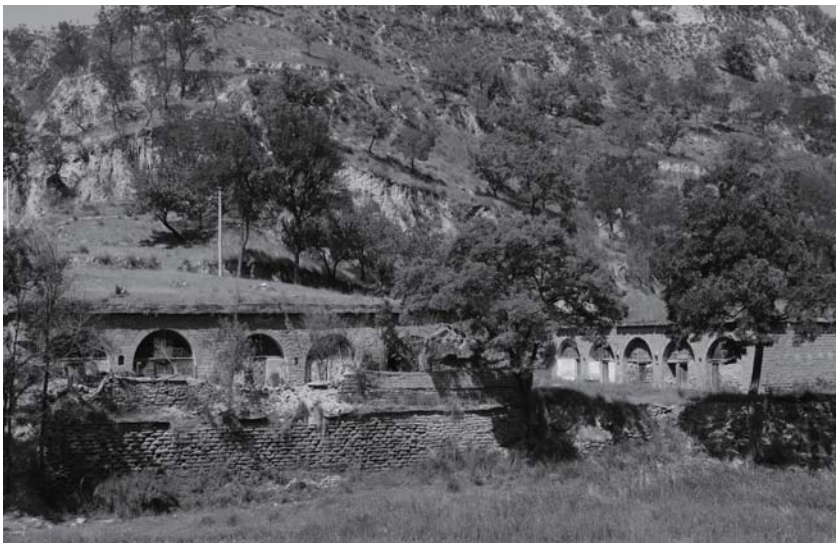
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驻地在张圪台村，是村民栾正成家的一组院落。坐落在山沟的上部。上院有六孔窑洞，正面三孔，倒坐三孔，下院有八孔窑洞，正面五孔，侧面三孔，上下院各有自己的大门，院落之间又有道路相连，且有小道可直达窑后。

西北野战兵团马蹄沟会议旧址

西北野战兵团马蹄沟会议旧址在马蹄沟村，是民间修筑的新民寨中一处十五孔窑洞的院落，俗称三城。1947 年 7 月下旬，西北野战兵团聚集在大理河与小理河流域，在彭德怀司令员的主持下，在这里召开了旅以上干部会议。

边区群众报社驻地

边区群众报社驻在柴家圪崂村，是村民柴本禄家的一组院落，正面六孔，东边厢窑三孔，西边厢窑是一孔高大的枕头窑（当年的印刷机就安装在这里，现窑洞已不存在），倒坐有三孔。由于当时窑洞少，报社员工分散在周围老庄沟、李家坬等几个村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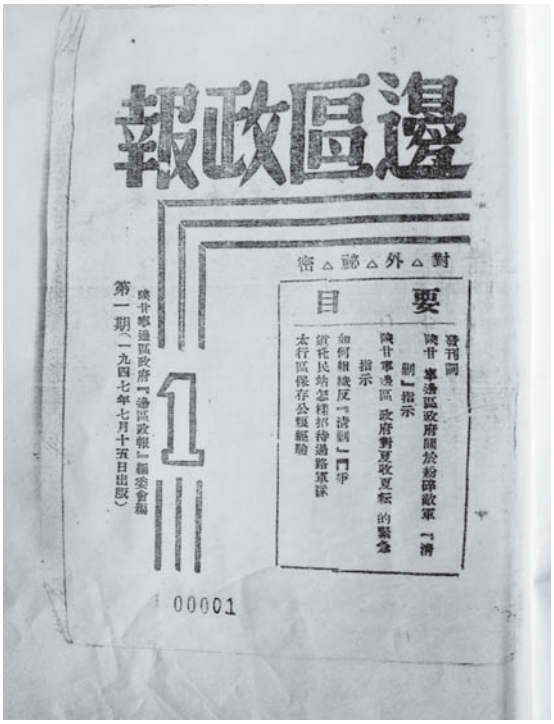
第四后方医院驻地

第四后方医院临时驻地在清水沟村，南院为村民王化玉的院落，有五孔窑洞，是后勤人员驻地，北院是村民王恩培的院落，也是五孔窑洞，是救治伤员的场所。伤员在这儿经过救治后，分散居住各家各户。

陕甘宁边区政府被服厂驻地上院

陕甘宁边区政府被服厂驻地下院

陕甘宁边区政府被服厂驻地在吴家沟村，上院七孔窑洞，是村民钟茂雄的院落，是生产车间；下院三孔窑洞，户主是钟荣秀、钟俊秀，是原料库房。1947 年 6 月，被服厂来到这里后，有工人 50 余人、缝纫机 20 多台，生产了一个多月。


邊區政報

對△外△祕△密

要目

發刊詞

陝甘寧邊區政府關於粉碎敵軍「清剿」指示

陝甘寧邊區政府對夏收夏耘的緊急指示

如何組織反「清剿」鬥爭

貧民站怎樣招待過路軍隊

太行區保存公糧經驗

1

陝甘寧邊區政府「邊區政報」編委會編

第一期（一九四七年七月十五日出版）

00001

陕甘宁边区政府来到马蹄沟后，于 7 月 15 日创刊发行了《边区政报》，图为创刊号封面。

中共子洲县委和子洲县人民政府驻地

中共子洲县委和子洲县人民政府驻地在水浇湾村，是村民栾万礼的院落，正窑七孔，倒坐五孔。1947 年 5 月，子洲县委和县人民政府来到马蹄沟区，就在这里办公，一直到 1948 年春。

目　录

一、概　述

概　述…… 1

二、文件选编

陕甘宁边区政府财政厅通知…… 4
陕甘宁边区政府关于动员护士的命令…… 4
陕甘宁边区政府办公厅通知…… 5
陕甘宁边区政府命令…… 6
关于禁止机关部队使用白洋及敌币的通知…… 7
陕甘宁边区政府关于粉碎敌军“清剿”的指示…… 8
林伯渠关于做好收复区群众工作给唐洪澄的指示信……10
林伯渠给子长县苏县长的信……11
陕甘宁边区政府办公厅关于胡建民等人违反群众纪律问题
　给强自修同志函……11
陕甘宁边区政府命令……13
陕甘宁边区政府关于注意放哨人员成分的指示（密）……14
陕甘宁边区政府对夏收夏耘紧急指示……15
陕甘宁边区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镇川工作给榆横政委会副主任
　王恩惠函……17
陕甘宁边区政府命令……17
林伯渠关于妥慎处理犯人问题给高等法院的复函……18

陕甘宁边区政府命令……19
陕甘宁边区战时勤务动员暂行办法……20
陕甘宁边区政府命令……27
林伯渠关于王生明婚姻纠纷问题给三边专员函 ……28
陕甘宁边区政府命令……29
陕甘宁边区政府办公厅关于纠正第二后方医院私印粮票
事给联卫苏部长函……30
陕甘宁边区政府办公厅关于制止酿酒问题给联司函……31
陕甘宁边区政府办公厅关于派人清理河边人员及牲口
给绥德专署的函……31
陕甘宁边区政府命令……32
陕甘宁边区政府办公厅关于购粮问题给佳县政府的复函……33
林伯渠主席关于我军人员违反纪律问题给联防军司令部函……34
林伯渠关于严办申回子等犯兵给保安处的批答……34
林伯渠对延属专署工作的几点指示……35
中央军委电 ……36
陕甘宁边区政府命令……37
陕甘宁边区政府通知……38
中共中央西北局关于蒋管区工作的指示(初稿) ……39

三、文章择录

为支援前线立功……43
西北局召集边区一级党员大会，号召做好支前工作 …… 44
加速解放大西北　陕甘宁干部参军……44
壮大主力军　消灭胡宗南　陕甘宁党员带头参军……45
发刊词——林伯渠……45
转战陕北……46
心系前线……50
在战争中大量发展党员……54
校部转战陕北(1947.3—1948.1)(节选) ……60

流动政府的廉政建设经受了战争的考验……63
西北局．陕北解放区的中共组织及正规部队（节选）……67
陕甘宁边区……76
马蹄沟……80
拜　庙……83
马蹄沟行……84
一九四七，马蹄沟的夏季……88

四、人物回忆

汤　洛：《延安游击队纪实》（节选）……94
王　诤：《周副主席主持召开通信保密会议》……109
王铭慈：《一名报务员的回忆》（节选）……113
胡绩伟：《啊！延安，我们回来了》……120
王黎明：《艳红的青春旗——延安中学毛泽东青年团》……129
雷根善：《转战三千里》（节选）……136
李树庭：《岳嵩转战陕北》（节选）……141
刘玉兰：《我心中的二哥》……145
薛振和：《绝不能让伤员落在敌人手里》（节选）……149
米世同：陕甘宁边区政府主要机构设置（节选）……153

五、历史故事

彭德怀主持马蹄沟会议……155
贺龙双湖峪参加庆祝会……157
王维舟挂帅查泄密……160
李鼎铭急治病人……161
马锡五调解纠纷……163
岳嵩照顾老人队……166
胡绩伟三皇峁办报……168

六、在马蹄沟各机构组成人员

中共中央西北局…… 170
陕甘宁边区政府…… 170
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 171
参加西北野战兵团马蹄沟会议人员…… 171
中共子洲县委…… 172
子洲县人民政府…… 173
马蹄沟区…… 173

七、部分在马蹄沟生活、工作过人物简介

习仲勋…… 174
马文瑞…… 174
马明方…… 175
马锡五…… 175
王　震…… 175
王子宜…… 176
王尚荣…… 176
王绍南…… 177
王政柱…… 177
王恩茂…… 177
王维舟…… 178
刘绍文…… 178
刘景范…… 179
朱辉照…… 179
江隆基…… 179
余秋里…… 180
张文舟…… 180
张仲瀚…… 180
张国声…… 181

张宗逊…… 181
张贤约…… 182
张德生…… 182
李　铨…… 182
李鼎铭…… 183
杨秀山…… 183
陈海涵…… 183
冼恒汉…… 184
周　兴…… 184
林伯渠…… 185
罗元发…… 185
范子文…… 185
饶正锡…… 186
贺　龙…… 186
贺连城…… 187
贺炳炎…… 187
唐洪澄…… 187
唐健伯…… 188
徐立清…… 188
贾拓夫…… 189
郭　鹏…… 189
顿星云…… 189
常黎夫…… 190
曹光琳…… 190
阎揆要…… 191
黄振棠…… 191
黄新庭…… 191
傅传作…… 192
彭绍辉…… 192
彭德怀…… 193
惠中权…… 193

曾　涤…… 193
程悦长…… 194
廖汉生…… 194
薛兰斌…… 194
霍子乐…… 195
霍维德…… 195

八、大事记

大事记…… 196

九、附　录

毛泽东与中共中央在巡检司…… 204
霍家渠行知中学调查…… 211

后　记…… 216

一、概　述

陕甘宁边区，亦称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是1935年10月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在原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1937年，在抗日统一战线原则的指导下，中共中央为了与国民党达成共同抗日协议，于9月6日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改组为陕甘宁边区，宣告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林伯渠为主席，初辖18个县。12月增加清涧、米脂、绥德、葭（佳）县、吴堡5县，至年底又划宁夏的豫旺和甘肃的镇原、环县为八路军募补区，共26县，包括陕西北部，甘肃和宁夏的东部，面积约13万平方千米，人口约200万。

1940年9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统一边区党政军工作领导，成立了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1941年4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与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合并，成立西北中央局。5月13日发出《中央关于成立西北中央局的通知》，高岗、习仲勋等先后任书记。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是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所在地，是敌后抗日战争的政治指挥中心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总后方。日本侵略者投降后，国共双方在重庆举行谈判，同意避免内战、和平建国，共同推动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以及与其他政党合作组建多党制民主联合政府。但谈判结束后不久，国民党背信弃义，宣布对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展开进攻，内战全面爆发。

1947年，国民党政府军在全面进攻到处碰壁的情况下，于3月被

迫停止了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改为对山东和陕北两个解放区实行重点进攻。在毛泽东主席“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战略思想的指导下，中共中央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在中共中央的统一指挥下，依依不舍地告别了延安，开始了转战陕北的伟大历程。

6 月 11 日，经过几个月的奔波，转战陕北的中共中央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在马明方副书记和林伯渠主席的带领下，从安塞县白庙岔来到位于大理河中游的子洲县马蹄沟区，与此同来的还有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第四野战医院、边区群众报社、延安行知中学、边区被服厂等一大批机关单位。直到八月初离开，共住了五十多天。

马蹄沟，陕甘宁边区子洲县的一个区，因沟内石上有巨大马蹄印而得名。境内的十里盐湾，有着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和革命的传统。1924 年，广大盐业工人就展开了反对盐税过重的打盐局斗争。1927 年成立了中共党支部，党员思想先进，群众基础良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为边区的经济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涌现出许多劳动英雄和支前模范，西北局和边区政府住这里后，马蹄沟人民给予了大力支持，同时也受到了西北局和边区政府领导的教育和熏陶。

在这里，中共中央西北局召开了撤出延安之后的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举行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26 周年的陕甘宁边区一级党员大会；发出了关于蒋管区工作的指示。

在这里，陕甘宁边区政府创办了《边区政报》；召开了政务会议，撤销了一些与战争关系不大的组织机构；发布了一系列命令通知；任命了诸多政府工作人员；奖励了一批涌现出的英雄模范。

在这里，西北野战军（野战兵团）屯兵大理河、小理河川道，准备进攻榆林；彭德怀主持召开了旅以上干部会议，就落实“小河会议”精神，如何进攻榆林，吸引胡宗南主力北上，配合陈赓、谢富治集团南下，作了详细研究部署。

在这里，《边区群众报》从油印报，改为石印，又改为铅印，坚

持出版，还将四开四版的报纸版面，正式改为对开四版的报纸版面。

50 多天的时间里，各级各地的报纸杂志，记载了西北局与边区政府的大事要事；坡坡坳坳的窑洞院落，目睹了首长与百姓的传奇经历。

近七十年过去了，许许多多的人物回忆，诉说着自己与同伴在马蹄沟的日日夜夜；代代流传的历史故事，记录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马蹄沟的方方面面。

1947 年夏季的马蹄沟，可以说每一天都是不平凡的日子，每一晚都是不眠之夜，中共中央西北局、陕甘宁边区政府在这里度过的峥嵘岁月，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这里书写的光辉历史，是马蹄沟人民的光荣与骄傲，也是子洲人民的光荣与骄傲，值得我们永远珍藏，永世不忘！

二、文件选编

陕甘宁边区政府财政厅通知

【财秘字第8号】

（一九四七年六月十四日）

为加强战时粮改工作，业奉政府新胜字十五号命令，粮食局改归边府直接领导。为此，从通知到达之日起，凡有关粮草供给、保管、调剂与筹集等问题，希直接与粮食局发生联系，商同处理，以专职责。

特此通知

代厅长　范子文

副厅长　黄静波

陕甘宁边区政府关于动员护士的命令

【新胜字第21号】

（一九四七年六月十五日）

专员、县长：

在此自卫战争中，前线伤员继续不断到医院来，原有的护理人员又不敷应用，现为改进医院护理工作，边府决定在这次参军运动中，动员五百名护士到各医院服务（包括在二万六千扩兵数内）。其数目

分配：绥德分区除仍须完成前次榆横扩兵中的二百人以外，再新分配一百五十名，前后共三百五十名；延属分区七十名；三边分区吴旗县十名，靖边县二十名；陇东分区五十名。动员对象：从完小初中学生中年在十五岁以上（男女皆可）而又身体健康的动员一些，和在扩兵中一部分不合规定年龄的（十七岁到十五岁）中间选择一些。动员方式：或用招收形式，或用动员方法均可；总之，必须动员其自愿报名参加，不得强迫命令。此批护理人员，在战争时期应顶兵役，并算在此次扩兵数目之内。

希各分区务须于七月二十日前如数完成，随即报告民政厅统一分配，加以训练使用。

此令！

主　　席　林伯渠
副　主　席　李鼎铭
　　刘景范
民政厅兼厅长　王之宜
副　厅　长　唐洪橙

陕甘宁边区政府办公厅通知

——春耕播种期间各机关不得动员群众牲口

（一九四七年六月十五日）

程参谋长并转联司直属各单位
曹秘书长、周处长、黄行长：

据子洲县政府称，该县因受此次伤兵医院及边区一级机关之转

移，动员频繁，影响大理河大川土地，尚有许多不及下种。现芒种已过，耕种时间，稍纵即逝。为帮助当地群众及时抢种，本府规定所有边府一级各机关，一律不许动员群众牲口，所需之粮草柴炭，均须组织机关牲口自运。并有计划的尽量设法抽出一部分人力、畜力，商同区乡政府，帮助当地贫苦群众抢耕抢种。特此通知

敬礼

边区办公厅

一九四七年六月十五日

并抄送县、区、乡政府一份

陕甘宁边区政府命令

——通令嘉奖延安县大队副高善祥

【新胜字第二十号】

（一九四七年六月十五日）

各专员、县(市)长

各民兵游击队长：

查延安县大队副高善祥同志，在我军主动撤离延安之后。奉命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在短时期内，即将柳林、丰富两个区的游击队和各乡游击小组，普遍组织起来，掀起对敌斗争的高潮。使延河两岸，烧遍了人民武装的复仇火焰。仅在一个月内，击毙伤俘敌营长以下三十余名，缴获长短枪二十余支及其他军用品很多。特别值得赞扬的是，高善祥同志不仅善于运用灵活的游击战术，以少胜多，屡建奇功；而且能以坚决果断的行动，镇压群众所最痛恨的反革命分子，

摧毁和瓦解伪政权，使有些暂时被敌奴役利用的伪政权人员，纷纷向敌人辞职逃跑，或向我方悔过自首，以至敌人丧失残害人民的爪牙，大大便利于我游击队在广大敌后地区的活动，并减轻敌后人民的痛苦。如在柳林区某乡敌人强迫当地群众每日送粮送草送料，并限期抓送二十三个青年充当炮灰，经高善祥同志和他的游击队以机智巧妙的方法，坚决保护群众，使敌所勒派强索的粮草，由少送到完全不送，一个壮丁也未被敌抓走。因此，他们成了敌后人民所热烈爱戴的“靠山”，到处受到欢迎。根据高善祥同志不避艰险深入敌后所创建的种种辉煌成绩，他不仅是延安县，而且是全边区开展游击战争及敌占区群众工作的优良模范。为此，本府决定：通令表扬高善祥同志的英雄事迹，并奖给新民主主义奖章一枚；同时号召各级政府干部及各地民兵游击队学习他的模范行动，积极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和敌占区群众工作，以加速残暴敌人的灭亡，解除敌后同胞的痛苦。

此令

主　席　林伯渠

副主席　李鼎铭

刘景范

关于禁止机关部队使用白洋及敌币的通知

（一九四七年六月十六日）

兹据子洲县长李身修同志报称，“子洲金融过去较为稳定，白洋及敌币，市上不敢公开流通，市上一发现，即行没收或强制兑换。最近过往机关及军队使用白洋及敌币者很多，当地无法禁止，使这里金融发生混乱，边府禁用白洋及敌币法令不能贯彻。我们认为这一现

象应设法纠正，不能任其继续下去。”等语。请各系统各部门各旅团首长立即在所属进行清查，如有使用白洋敌币情事，不论任何机关部队，一律没收，其负责人并应受到处罚。

特此通知

林伯渠

王维舟

贾拓夫

陕甘宁边区政府关于粉碎敌军“清剿”的指示

【新胜字第24号】

（一九四七年六月二十一日）

各级政府：

敌军此次向志丹等地“清剿”，不仅到处烧杀抢奸，并把抢到的老百姓，不论男妇老幼，俘往延安，企图彻底摧毁我根据地，使我军失去生存条件。我们如能及早揭穿这种阴谋，组织群众进行反清剿，本可避免损失。但由于我各级政府对人民负责不够，未能及早认真总结敌军破坏暴行的教训，提出具体办法，组织领导群众进行反清剿斗争，以至此次敌到之处，人民遭受损失仍极严重。各级政府和干部，必须以严肃沉痛的态度，深刻检讨自己的缺点和错误，记取经验和教训，组织领导群众，坚决打击并粉碎敌军“清剿”。

已遭受敌军“清剿”蹂躏的地区，各级政府应及分派干部深入农村，召集群众回家，殷切慰问，号召互助互救，进行调剂，解决每家迫切困难问题，立即恢复生产，调剂籽种，赶种糜子、荞麦，组织

割麦藏麦。对敌军罪行进行调查登记与宣传解释，纠正群众中的悲观心理，激发复仇情绪，把悲痛变成力量，全体人民组织起来进行反清剿斗争。无论敌军已到或未到地区，均应立即建立民兵组织，严密分工，加强侦察敌情、盘查敌探及村与村、乡与乡间的瞭望哨和联系哨。大量发展游击队，经常袭击敌人并牵制敌军“清剿”时之行进，掩护群众转移。研究经验，根据敌情，在“清剿”时预先指定干部或群众信任的积极分子，领导组织老弱妇孺有计划的转移，壮年男子除随妇孺转移者外，其余最好随游击队行动，防止被敌捕获。坚壁工作均应重新检查，根据新的经验，另行缜密埋藏，不论公私物资，不得敷衍塞责。今后如因不负责任而造成之物资损失，当地政府及保管人员应受行政处分。敌军“清剿”撤退后的地区，并应即时检查坏分子，镇压反革命，进行审查干部，改造乡村政权，进一步提高群众认识，一心一意为战争服务，掀起参军热潮，坚决支援前线，以加速胜利的到来。

各级政府接此指示后，应即认真讨论，根据具体情况布置工作，并将号召情形随时报告本府。安塞、志丹、靖边等遭受敌军“清剿”地区，尤其将敌军暴行调查登记材料及经验教训之总结迅速整理寄来，以资介绍各地参考。

主　席　林伯渠

副主席　李鼎铭

刘景范

林伯渠关于做好收复区群众工作给唐洪澄的指示信

（一九四七年六月二十四日）

洪澄同志：

别后未见来信，不知到达子长后之工作近况何如？近据永坪一带来人称，我各级政府对于敌人骚扰蹂躏后地区之工作，做得十分不够。对于群众受害的苦处及生活上的迫切困难，很少负责去设法安慰救济。有些乡村干部甚至对这一方面的工作很少过问，仍只注重向群众要粮草、派担架等一方面的工作。这说明我们很多干部虽经过敌人暴行的残酷教训，但仍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缺乏为人民服务的观点。如不及时彻底纠正，接着再用强迫命令扩军借粮，会越使群众对我们不满，甚至发生逃脱抗拒等事件，造成很大的恶果。因之，希望你立即商同县府同志组织干部深入农村，到敌军过后的地区，必须从先安慰调剂解决被难群众困难问题做起，组织群众抢收抢种，从建立放哨、侦查、扩大游击队等工作配合进行扩军借粮等工作。兹寄上边府关于反清剿的指示一份，至请参照研究，并在实际工作中加以发展，取得经验，随时写来报告，以资总结经验教训，介绍各地参考。

我们于本月十二日移至马蹄沟，你暂时不急于去绥德，着重将子长及附近的永坪等地的工作深刻检查，并亲自参加，给予帮助以求改进。

敬礼

林伯渠

林伯渠给子长县苏县长的信

（一九四七年六月二十四日）

苏县长：

写给唐厅长的信，请即转给，并望本此信精神，共同研究，检查布置你县工作，并切保执行。几个月来，很少看到你们的工作报告和来信，今后务希将你县工作情形，随时函告我们！

敬礼

林伯渠

陕甘宁边区政府办公厅关于胡建民等人违反群众纪律问题给强自修同志函

（一九四七年六月二十六日）

强自修同志：

据绥德专署杨专员报告，延属专署所属自救商店经理胡建民、李怀珍及黄龙特委李政委（士彬）等携带物资到绥德附近七里铺村，住在一反革命分子马生枝（当敌占绥德时投敌，任伪县长的密查）家中，听信煽惑，诬赖该村村主任偷了他们的一桶颜料，拿出手枪威胁，并将人吊绑在树上毒打，诬称："已调查清楚你是特务，一定是你偷去了。"该村主任坚不承认，旋又危言恐吓要枪毙，后用铁锨打的不省人事始罢，结果是物在马弟生俊家中搜出，实与村主任无干。又当三

月底敌军进攻清涧时，商店由七里铺向吉镇区转移，他们无理强拉子长东三区四乡吴家河村吴学和等五六个老乡的毛驴共十八头。这些毛驴原系区乡动员给中央医院运送药品至七里铺才顶开，急欲回家，但是他们不由分说，硬要拉差。吴学和等几经要求无效，因环境紧张急于料理家事，咬牙切齿的丢了毛驴而去。尤甚痛恨者，胡等一行转移时，除将所有物资驮上外，并将特务分子马生枝的老婆、孩子也驮上一起行动。到吉镇后，给吴学和等捎回毛驴十二头（已收到），扣下六头好驴，说要自己骑用。使用了两个多月，正准备出卖间，吴学和等追来找寻，结果在七里铺找到一头，在吉镇碰到延属公裕商店营业员张宗孝拉着一头，当被追回。据现扣押者张宗孝称，其余四头毛驴被黄龙特委李士彬拉去山西，可能已出卖了。此外，他们住在吉镇时，任意挥霍，不多时即吃用公粮四石、公草一千多斤及马料甚多。经群众告发，绥署当将留住该处之张宗孝扣押，同时电请晋绥军区将李士彬转送到案。至胡建民、李怀珍两主要负责人，据张宗孝称，已返延属分区，大约住在鄜县一带黄龙特委。为此，我们日前曾致函延属专署李专员，请他们审问明白，从严惩办。李专员特派李经纶同志前来，我们当即转介绍到绥德专署协同商量处理。顷接杨专员来函称："关于延属地委营业人员胡建民等违反群众纪律事，日昨由刘景膺同志派地委副秘书长李经纶同志来此商量解决。现除将卖掉老百姓的四头驴子议价赔偿（经老百姓当面同意）外，并由经纶同志向七里铺挨打的村主任代为道歉，吃的公粮也由他们按实数补赔。至对胡本人，我们同意由延属地委交由当地司法机关予以处分。李怀章（珍）问题，请转知黄龙特委以同样手续予以处理之。"我们同意这个意见，希即对李士彬同志严予处分，以振政纪而做效尤。处理情形并希见复为荷！

敬礼

边区政府办公厅

陕甘宁边区政府命令

——加强各级政府对战时邮政工作之领导以保证邮路畅通

【新胜字第二十五号】

（一九四七年六月二十八日）

各专员县（市）长、各邮政局局长：

自本府关于加强战时邮政工作之命令颁布后，各级政府对该项工作之领导，确已开始注意转变。但有部分地方政府，对此项工作之重视，仍极不够，未能确实负责，同时邮政管理局亦没有根据战时的变化，及时想出办法，领导帮助各地工作，致使邮路因一时敌情紧张，遭受阻隔破坏，即不能迅速恢复接通，影响战争工作甚巨，今后必须更加改进，以保证邮路之畅通。为此，特有以下之规定：

各邮政分局对于所属之各县邮局，应切实负责领导，特别是在敌人进攻与“清剿”中，及时了解敌情变化，具体研究指导邮路交通，以保证各级之联系，不为敌人切断。

为了加强各级政府对邮路工作之领导，各邮政分局由各专署的民政秘书负责领导。过去无邮政县份，应将代办所一律改为邮局。各县邮局由各县一科长负责领导，在边区邮政管理局总的方针指示之下，进行具体的领导，经常督促检查各级邮局工作，并按期向民政厅作报告。

为求邮路便于衔接，县与县之间，如路程相距过远的地方，应予设立邮站，除规直隶县局之领导外，并须接受所在地方区乡政府领导与协助。敌人进犯与“清剿”时，邮站可随地方政府行动，而地方政府必须以游击队民兵掩护其通邮。因此各县与县之间或县与站之间在此种情况下可以相互发生联系，任何县局与邮站，均不得拒绝转送邮件公文。

完成上述任务所需之干部及必须增加的邮工，由各县就地选派熟悉当地情况及政治上可靠之人员充任，邮工也可在游击队或民兵中抽调。其具体人数及应设站地点，由邮管局统一计划，另行通知。

邮用经费仍照前令规定，邮政工作人员由各专署及各县政府负责，与其他工作人员同。邮政工人由各分区之财政分处照民财两厅规定之标准发给之。

以上各项希各级政府根据各地具体情形详加讨论，迅速布置执行。

此令

主　　席　林伯渠
副　主　席　李鼎铭
　　刘景范
民政厅兼代厅长　王子宜
副　厅　长　唐洪澄

陕甘宁边区政府关于注意放哨人员成分的指示（密）

【新胜字第27号】

（一九四七年六月二十九日）

各分区专员、各县县长

各保安分处处长、各保安科长：

目前各地民哨多采取按户轮流，地主、流氓、兵痞、叛徒亦在轮流之例。此类分子平时大多思想反动，对边区民主政权多取对立态度。在敌人进攻中，迎敌、投敌及进行反革命活动危害边区者已不乏其人。因此，吸收他们参加放哨，警戒敌人，是极为危险的。必须使群众认识：放哨盘查

是边区人民保卫革命家乡的光荣任务。在担负这一任务中，一方面可能耽误些生产劳动，但另一方面却保护了大多数人的切身利益。如果让那些坏人和不可靠分子参加进来，不仅不可能完成警戒任务，相反的，在紧急关头会耽误工作，甚至起内应作用，把敌人引进来。这是值得我们严重警惕的。希各地接此指示后，立即深入检查，严格纠正，坚决停止一切不可靠分子参加放哨，并防止以后再混进来。确定哨兵成分必须是好公民，而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干。并须责成各乡治安主任，加强查哨工作，奖励认真负责的人员，纠正形式支差、有名无实的现象。这样才能改进哨站工作，提高群众对敌斗争积极性，保证民哨的应有作用。

主　　席　林伯渠
副 主 席　李鼎铭
　　刘景范
保安处处长　周　兴
副 处 长　赵苍璧
　　李启明

陕甘宁边区政府对夏收夏耘紧急指示

【新胜字第26号】

（一九四七年七月一日）

麦子黄熟，秋田草长，正当夏收夏耘的紧急关头，敌军阴谋破坏，积极布置抢收新麦。因此动员组织群众进行抢收抢锄，乃是目前反清剿中紧要任务之一，掩护群众抢收并坚壁于安全地点，成为我地方政府和游击队的中心工作。为此：

配合反清剿斗争，武装保卫夏收夏锄。离敌较远地区应学习志

丹、新宁等地办法，加强盘查放哨和侦查警戒，建立战勤与支应过往军队的战时制度，使群众了解敌情，全力镇静收锄。敌人可能窜扰区域，更应随时准备应付敌人的“清剿”，学习子长南区、绥德杨道峪及合水五区经验：实行民兵警戒，游击队积极牵制与扰乱敌人，掩护群众抢收抢锄，快打快藏，敌情紧张时应事前坚壁粮食，疏散牲口，转移老弱妇女，组织壮年劳动力利用战争空闲不分昼夜抢收抢锄，直至敌人到村子附近才安全转移，敌人一去，马上回村继续生产。乡村干部尤须转移在后，回来在前，为领导群众坚持生产的表率。

组织劳动力，合理使用。据半年来的统计，全边区支前劳力约占全部劳力的十分之一。而因敌人骚扰荒废的劳动力则大大超过此数。因此在劳力使用上主要应避免劳力的荒废，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动员，预先组成流动的收锄班子。如敌人侵入本村时，可即转移至别村进行变工收锄；如敌人退走，应即回村，并邀别村老乡还工突击收锄。在劳动组织方面，除一般发动老汉妇女上山及大量组织变扎工外，尤应组织妇女支应零星差事，和在条件具备时实行全村各种劳力分工、统一使用的变工办法，发动所以人力，一齐动手，使战勤与抢收抢锄，两不相误。

“锄头下有三分雨”。目前天气亢旱，锄草是保持地里水分的最好办法。群众中等待天雨、不积极锄草现象，应即宣传解释，加以克服。尽一切可能多锄、细锄及挑水按种夏菜，预防旱灾。

机关、学校、部队应组织扎工队帮助驻地群众收锄。机关转移时应事前派人到沿途配合当地政府布置食、宿、草料及运输问题，严格约束本部队和机关人员遵守群众纪律，禁止随便拉差，以免耽误生产。

各级政府应将收锄工作的情形随时报告本府。

主　席　林伯渠
副主席　李鼎铭
　　刘景范

陕甘宁边区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镇川工作给榆横政委会副主任王恩惠函

（一九四七年七月二日）

王主任：

来函阅悉（注1），为了加强镇川工作，你兼该县县长仍为必要，至今后县府所需人员，应以工作需要，提出意见，函商民厅决定。

此致

敬礼

边府办公厅

注1：来函原件缺。

陕甘宁边区政府命令

——各机关不得包庇隐藏逃避兵役之青年

【新胜字第29号】

（一九四七年七月四日）

各专员、县（市）长

各机关、学校、团体：

正当边区各地普遍进行参军热潮中，发现有少数人逃到机关、学校，利用亲戚朋友关系找工作或闲住，而个别干部也有包庇隐藏现象。为此，本府特明令各级政府、各机关、学校、团体一律不准引用

逃避兵役之青年，务望各单位首长负责严格查究，切实遵行，以利扩兵工作之完成。

此令

主　席　林伯渠

副主席　李鼎铭

刘景范

林伯渠关于妥慎处理犯人问题给高等法院的复函

（一九四七年七月四日）

马、乔院长：

六月二十三日关于高院在九滩沟紧急处置犯人刘志杰等七人情形的报告阅悉。查在敌情非常紧迫之际，对于罪情重大复有企图逃跑行为的人犯权为紧急处决，自无不合。惟在此次紧急处决之七人中有二流子、盗窃犯、贪污犯或有特嫌而未判决者，虽有企图逃跑之迹象，亦竟处决，殊欠慎重。且在执行中未很好的注意机密，实太疏忽。今后对于人犯务宜妥慎处理，除在特别紧急情况及群众迫切要求之下，对于罪大恶极反革命分子得作非常之处置，并于处置后及时呈报本府外，一切死刑之宣告与执行，仍应请示本府核准。来函严于责己，精神可嘉，望更加注意教育干部，改进工作。此次赵耀先等率法院干部、家属及犯人仓促东移（赵一家八口随行），亦甚不当，且有违反群众利益与不遵手续支用粮草之处，尚希深入检查，切实纠正。兹附晋冀鲁豫边府通报一册（注1），内有该区对于战时司法工作的初步意见一文，尚有可供参考之处，希予研究，

以资改进工作为盼。

此致

敬礼

林伯渠

注1：晋冀鲁豫边府通报一册原缺。

陕甘宁边区政府命令

——公布《战时勤务动员暂行办法》

【新胜字第32号】

（一九四七年七月十日）

各专员、县（市）长：

兹制定《陕甘宁边区战时勤务动员暂行办法》公布之。仰各地接到后，缜密研讨，确实执行，并将执行中之疑难问题与好的经验随时迅速报告本府，俾资研究改进，以期保证支援自卫战争的供应。

此令！

主　席　林伯渠

副主席　李鼎铭

刘景范

陕甘宁边区战时勤务动员暂行办法

总　则

为了保证爱国自卫战争的供应，有计划的动员组织使用民力，合理负担，节省民力，尽量避免耽误生产，支持长期战争，争取最后胜利，特制定本办法。

凡直接参加前方随军的担架民夫和运输牲畜均称为前方勤务，又称定期随军担架队或运输队。凡在后方转运伤病员、荣誉军人、破砦（寨）、修路、转运弹药粮秣等均称后方勤务。站岗放哨，短途送信、带路及动员妇女炒干粮、做军鞋、拆洗伤兵衣服等均称为村内勤务。

凡边区人民年在十六岁以上，五十五岁以下身无残疾的男子，均有服战时前后方勤务的义务。凡能驮七十斤以上之牲畜及能载运之车辆船只，均按本办法服勤务。但随军运输牲口以能驮百斤以上的方为合格。

甲、十七岁至四十五岁的壮丁，不论前后方勤务或村内勤务，均需按班支应。

乙、十六岁及四十六岁至五十五岁者出后方勤务和村内勤务，不出前方勤务。

丙、凡能劳动的男女老少，皆有服村内勤务的义务。

战勤减免的条件：

甲、贫苦小贩、脚户及农村中的贫穷小户，可经村民大会决议酌量减免或免除其服勤务。

乙、脱离生产的工作人员，本人免服勤务，不脱离生产的乡村干部，一般的应照平常人服勤务，但在工作繁忙时得经村民大会酌量减

轻或免除其本人应负担的勤务。

丙、脱离生产的游击队员，本人免服勤务（中心区可以具体情况决定），不脱离生产的游击小组，一律照平常人服勤务。

丁、高小以上学校的教职员、学生，在授课期间，本人免服勤务，必要时可组织帮助村内战勤工作或带领担架队随军工作。

戊、有供给任务的公营工厂的职员和工人，本人免服勤务，公营商店除原机关部队派去之干部本人免服勤务外，其他人员均应担任勤务。为照顾其业务，在其服务时间先后上酌情调整配备或准其雇人替工。

己、壮丁确实有病及家中有婚丧大事者，可依本村群众意见准予免除或以后补服勤务。

动员和组织

县、区、乡政府应派员深入农村，广泛进行思想动员，用群众自己酝酿讨论的方式，使每个人都懂得为自卫战争服务的道理，互相鼓励，踊跃参战，预先编组，随调随到，出发之前讲清任务，说明服务期间，准备粮袜干粮，安置家事生产，干部带领勇往直前，争先立功，完成任务。

分区、县、区、乡、村皆须有专人负责管理人力的批拨、分配、调剂、统计，建立人、畜力账簿。

县、区、乡、村要把十六岁以上五十五岁以下和十七岁以上四十五岁以下男子，及能驮七十斤以上和一百斤以上的牲畜统一登记，分别组织，以备调用。

各地应以行政村或自然村为单位，将合格的男子分别编组，每十人设一副担架。担架出动时以每副五人为一组，三个至五个组为一小队，三个至五个小队为一中队，五个中队为一大队。组设组长一人，小中大队各设队长、指导员各一人。组长及各级队长由队员选举，指

导员由县、区、乡主要负责人或派得力干部担任之。

动员出发之运输队组织，以牲口十头为一班，三班为一小队，三小队为一中队，三中队为一大队，带队干部同前条担架配备。赶脚民夫一般规定一人赶牲口两头。每大队最好配备兽医一人，准备药材，随队服务。

调遣使用

凡大批人力畜力之动员，不论前后方勤务均由边区政府民政厅或前线动员委员会以命令行之。

定期担架随军服务，从到达部队之日算起，以三个月为期，使用于前线转运伤兵到野战医院，一般不作后方转运之用。临时担架使用于野战医院到后方医院或后方医院之间伤兵的转运，规定之任务完成后即应复员，必要时可作随军之用，但时间以一次战役终了为限，不得留作长期随军之用。

定期运输服务时间与定期担架同，用作随军或归兵站支配运输。临时运输用作短途转运，一次任务完成即应复员，不得继续扣留使用。

调遣人畜力之手续规定：

甲、定期随军担架民夫和运输牲畜，由民政厅或前线动员委员会统筹计划，划分地区，分配数目，拨给一定的部队或一定运输线的兵站，直接与指定地区的政府（一般为县政府）接洽，协同调用，按期替换，并保证规定的人畜力经常满员，直至奉命截止时为止。

乙、临时担架民夫或运输牲畜，由民政厅或前线动员委员会按需要决定调用区域、人畜数目、服务时间后，介绍部队或兵站向指定地的政府接洽调用之。

丙、凡设有兵站的地区，一切有关军事方面的人畜力调用，统一由兵站向政府接洽办理。无兵站的地区，部队方可直接向政府接洽调

用。

丁、凡特殊情况急需调用之人畜力，须有团或独立营（或单独行动之连）以上机关首长签名盖章的介绍信，经当地政府批准调用之。调用后须逐级报告民政厅，以便统计，注意调剂。

临时调用民夫带路不用“动员证”，调用条件：

甲、一个团或单独行动之营、连每次调用带路人不得超过两人。

乙、后方机关及下乡工作人员不准调用民夫带路。

丙、带路范围只限于带路人之本乡或其熟悉之路程。

凡下列情形，一律不准使用民夫牲畜：

甲、机关部队学校的一切生产事业，皆禁止使用民力，遇必要时可通过政府批准代雇。

乙、机关部队学校过往人员之代步、背行李、驮东西、接送眷属、机关搬家、挑水、拾柴、推磨、做饭等事，一律不准使用民力（正在战斗及不能行走的伤病员、荣誉军人例外）。

丙、后方机关部队需要之粮草一律自运，不准使用民力，但部队作战前后短期休整期间例外。

凡不按动员手续私向县、区、乡动员或不应使用而强行动员者，政府与群众均有权拒绝之。倘强迫索要，得报告上级机关按情节轻重依纪律惩处之。

部队机关应对民夫多加爱护。对随军服务民夫的食宿、患病、安全等方面尤须注意照顾，并随时给以教育，讲解时事，提高其政治认识。

民夫和牲畜的供给

凡调用服务之担架民夫与运输牲畜，不论定期与临时，一律自带三天或到达使用部队期间所需之粮食草料。到达使用部队后，即由部队按下列标准统一供给：

甲、民夫生活标准与战士同。完成任务回家途中，只给粮食，不

发菜金。

乙、牲口草料标准与机关牲口供给标准同。

定期随军民夫须自备鞋子和衣服。十分贫苦者由村乡设法调剂解决之。

计工算账

为战争服务是边区每个人民应尽的义务，必须以乡或行政村为单位，按照财劳共负与劳勤结合的原则，全乡或全村合理负担，实行全村算账，全村变工。

（注）财劳共负、劳勤结合的原则，另有专例说明。

随军定期担架民夫出发后，家中农活应由村中及时变工代耕代锄，不得有误农时，荒芜庄稼。

计工标准规定：

甲、战勤工、代耕工（系指为服务战勤的民夫家庭代耕而言）统一计算。

乙、随军服务之定期担架民夫，由到达使用部队时起至完成任务时止，每人每天均按一个半工计算，往返途中每人每天仍按一个工计算。后方勤务每人每天均按一个工计算。村内勤务不计工。

丙、不脱离生产的民兵游击小组，其因公出差误工在一天以上的，每人每天按一个工计算。

丁、参加运输之畜力，在服务期间，一律每头每天按一个工计算。大车运输一天按几个工计算，由各地自定之。跟牲畜的人应按其出差性质同样计工。随军运输人员每人每天按一个半工计算。

随军定期服务的民夫，必须携带有政府制发的“人民战勤服务证”（表式符后），服务期满后由使用部队填写应填各栏，签盖公章后带回，凭证记账。短期和临时服务时，由乡或行政村统一制发工票，服勤务一天发一工票，月终凭票记工算账。欠工以还工为原则，必要

时以工折价，工价由各县规定之。

各级政府须按月将动员情形及实有服勤务的民夫牲畜数目逐级报告民政厅，以便统计，给予调剂。

出差次序实行按组按班轮流，以出差最少的先出。后方勤务不顶前方勤务（随军定期勤务）。

奖励与抚恤

民夫每次服勤务终了，必须实行检查，由群众评功过，论奖惩，以提高其为自卫战争服务的自觉性和积极性。

奖励办法：

甲、大会表扬、登报表扬、记功劳簿。

乙、颁给奖章奖旗。

丙、选举模范（其政治地位与劳模同）。

丁、物质奖励。

惩罚办法：

甲、开会批评、斗争、记过。

乙、罚工。

丙、造谣惑众，组织与鼓动逃跑者，送政府法办。

民夫在服勤务中因公伤亡，经使用部队证明者，应与战士伤亡同等抚恤。

附　则

本办法自边区政府公布之日起有效。

本办法公布施行后，凡边区过去颁布有关民力动员条例与本办法相抵触者，概以本办法执行之。

本办法如有未尽事宜，由边区政府命令修改之。

附：战勤服务证格式

战勤服务证

姓　　名	县　　区　　乡
担任何种勤务	出发时间
服务时间　　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勤务工作的表现 （有何功或过）	
动 员 机 关 盖 章	使 用 机 关 盖 章

说明：

此表在动员定期勤务时使用。

此表“服务时间”“服务工作表现”“使用机关盖章”三项，由使用机关填写与盖章，其余各项由动员机关填写与盖章。

此表由动员与使用机关填写后即交服务民夫携带，乡村凭证付工算账。

陕甘宁边区政府命令

——代理延长县长董耀卿等撤职并究办

【新胜字第30号】

（一九四七年七月十日）

各专员、县（市）长：

查代理延长县县长董耀卿，于敌进犯前不作必要准备，借口粮食局无疏散指示，不将公粮疏散，迨敌至延长城时，马家河一处尚有公粮一千八百石未疏散。有人提出应立即疏散，反称："劳民伤财，叫丢去，"结果全部丢掉，致使该县公粮前后损失共达三千余石之多，引起干部、群众异常不满。又将军鞋四千六百双放在城郊村庄不坚壁，敌人路过时拿去大部分。对敌只知畏怯逃跑，不予反革命分子以应有之镇压，虽经有各方面提出意见，亦不采用，逐使敌焰嚣张，增加人民很大损失。据上事实，应予撤职处分。

代理清涧县长王士英，思想麻痹，以为敌人不会到来，逐不积极组织发动群众进行紧急备战工作，对于干部家属及公私物资俱不妥为疏散，以致县城临陷之时，大批干部群众不及转移出来，仅公粮一项损失达两千余石。对于恶霸反革命分子亦不作适当处理，使其得以为虎作伥，助纣为虐。在敌占清涧三阅月中，未能积极发动群众对敌斗争，坐视人民在暴敌统治之下被动应付，甚至有为敌所用的现象。据上事实，应予撤职处分。

绥德专署建设秘书张爱民，生活一贯腐化，铺张浪费，对工作不负责任。自去年九月至今闲住家中，久不到职。虽经专署屡次函促并

派专人去找，终不回署。且在闲居期间使用一两个通讯员、勤务员，任意开支，靡费公粮。在环境紧张时，银行与贸易公司物资托其代找妥人疏散保存，事后缺少很多，其中张爱民有贪污嫌疑。前此并有假公济私、私卖枪支之不法行为，未经处理。据上事实，除予撤职处分外，着交法院究办，以申政纪。

此令！

主　席　林伯渠
副主席　李鼎铭
　　刘景范

林伯渠关于王生明婚姻纠纷问题给三边专员函

（一九四七年七月十一日）

吴专员：

顷接晋绥野战军独五旅政治部来函略称：该部一团三营八连政指王生明同志原籍横山，于三五年参加革命队伍，此次随军过河，请假便道返里，发现其妻被靖边县府三科长张兴挑拨离间勾引结婚（张原有妻子），该县县区干部曾从中帮忙活动，结婚时并得县府负责同志批准，事前并不通知王生明家人，其妻离家时把全部衣物带走，王在四零、四一年两次写回家信均被县府扣押。因此请求本府转令你处帮助查究解决，将王妻退回有夫，并令张兴赔偿损失等情，希即确实查明，迅于适当解决，并以解决情形报告本府为盼。

此致

敬礼

林伯渠

陕甘宁边区政府命令

——边区税务总局副局长王世雄应予撤职查办

【新胜字第33号】

（一九四七年七月十五日）

各专员、县（市）长

各税务局（所）　长：

查边区税务总局副局长王世雄同志，去年十一月由本府派往陇东参加土地改革工作，原冀其在下层实际工作与群众运动中刻苦锻炼，不料他到陇东后，依然敷衍塞责，不求进步。调庆阳驿马关区工作时，遇敌进犯，充分表现惊慌失措，虽然当地负责同志剀切指示，须坚持原地工作，竟采消极对抗态度，借口三个月的任务已满要求返延，未得批准，即对庆阳县府提出要求至较安全地区，并带上税局武装稽查一人保护其安全。后在庆阳三十里铺区及华池温台区工作时，表现消极敷衍，毫无向群众学习并为群众真诚服务的精神。生活方面表现也很不好。去年在绥德结婚时铺张浪费，挪用公款三百余万（边币）。此次在陇东又利用自己地位，向驿马关税局借用券洋一百四十余万元，私购货物营利，事后始向总局通知说他赚钱为了治病，结果以营利所得买布一疋，除自用外并给陇东中心局局长梁世勋分布一丈六尺，不经组织批准私买短枪，同时对梁世勋私用公款布疋之不法行

为，不惟不予纠正，反而曲予（意）包庇，滥用职权，准予报销，并让梁予离职时带走手枪一支，违反制度。根据以上事实，应予撤职查办，以肃政纪。并望王世雄同志今后在下层实际工作中确实改正错误，锻炼和提高自己。

此令！

主　席　林伯渠
副主席　李鼎铭
　　刘景范

陕甘宁边区政府办公厅关于纠正第二后方医院私印粮票事给联卫苏部长函

（一九四七年七月十六日）

苏部长：

据粮食局报告，联司所属第二后方医院（即和平医院）私自印制粮票，在民间流行，违背本府五月所公布之由粮食局统一制发粮票之规定，破坏制度。请即查明纠正，严饬该院将所发行的种类和数量据实报告粮局，并将已发行之各种粮票、草票限期收回，以维粮政制度，而免损害群众利益。专此，即希查照，并以查究情形尽速见告（注1）为荷。

此致

敬礼！

边府办公厅

注1：未见联卫关于查究情况便函。

陕甘宁边区政府办公厅关于制止酿酒问题给联司函

（一九四七年七月十七日）

王司令员：

据粮食局报告，联司驻义合史家沟人员，不遵政府禁止酿酒的通令，已将曲制就，准备以粮酿酒，引起群众不满，纷谓："我们吃的都没粮，做酒太不应该。"当兹久旱不雨，粮荒堪虞之际，征借军粮已痛感困难，实不应浪费粮食作无一消耗之用。谨以上述情由奉达，至请迅予查明制止为荷！

此致

敬礼

边区政府办公厅

陕甘宁边区政府办公厅关于派人清理河边人员及牲口给绥德专署的函

（一九四七年七月十七日）

杨专员：

兹经本府与西北局、联司共同决定，特派联司后勤部部长方仲如同志为代表，赴河边清理该处边区一级党政军后方人员家属及牲口。凡人员中能参加工作者，应一律到工作岗位上去，所有牲口全部过河

运输布匹，以资缝制今冬军衣之用。嗣后遇有转移必要时，所有该处人员家属应一律作步行准备，其实属无法行走者，经当地政府临时动员牲口运送。请你处选派一人随方部长前往协助清理，并负今后管理该处后方人员之责，必要时帮助他们转移。特此，即希查照办理为荷！

此致

敬礼

边府办公厅

陕甘宁边区政府命令

——严禁粮食出境及用粮食蒸酒熬糖

【新胜字第35号】

（一九四七年七月十八日）

各专员、县（市）长：

关于禁止粮食出境及禁用粮食蒸酒熬糖事，本府曾三令五申公布在案。但近日发现仍有部分奸商，偷用粮食出境或用粮食蒸酒熬糖，耗费极大。倘不严格制止，势必影响边区人民食粮及自卫战争物资之供应。加之今年天旱缺雨，夏禾歉收，秋苗苦旱不长，在此灾荒严重威胁之下，凡我军民，对于粮食尤须格外爱惜珍贵。因此，本府特再严申禁令，务希各级政府确实严厉查禁，倘有故违，除粮食没收外，人送司法机关以法惩办，绝不宽贷。为激励边区军民注意稽查工作，特附查获出境粮食给奖办法如后，望即切实遵行为要。

此令！

主　席　林伯渠

副主席　李鼎铭

刘景范

附：查获出境粮食给奖办法

不论机关、部队、团体和群众查获出境之粮食时，应即将没收粮食和运粮人送当地乡区或县政府处理。当地政府除宣布粮食全部没收外，人依情节轻重，或教育释放，或送司法机关惩办。没收之粮食，以百分之三十奖励给缉私机关或群众。如经密告而辑获者，应分给密告团体或个人奖粮百分之十，辑获机关或群众得奖百分之二十。以百分之二十归当地政府，以百分之五十缴仓库作为公粮。

陕甘宁边区政府办公厅
关于购粮问题给佳县政府的复函

（一九四七年七月十八日）

杜、黑县长：

七月七日呈(注1)悉。据我们了解，晋绥今年缺粮亦甚严重，所请向该方交涉购粮三千石一节，事实上办不到，望另行设法根据具体情况组织副业运输易换粮食，以期保证借粮任务胜利完成。专此布复。

此致

敬礼

边区政府办公厅

注1：七月七日呈缺。

林伯渠主席关于我军人员违反纪律问题给联防军司令部函

（一九四七年七月十八日）

王司令员：

据延属专署报告，近在安塞七区发生我军人员身着敌军服装，携带武器，不带路条到处流窜，不服群众检查，破坏纪律事件多起，提出整饬意见数项，我们认为尚有可供采择之处。兹将原信附上（注1），至请考虑命令后方各部队遵照执行，并转告前方部队亦应注意。其处理情形，尚希见示，以便答复延属专署是荷！

此致

敬礼

林伯渠

注1：延属专署原信缺。

林伯渠关于严办申回子等犯兵给保安处的批答

（一九四七年七月二十日）

周处长并转保卫团政治处：

七月十八日呈（注1）悉。同意你们提出将你团五连屡次组织战士逃跑破坏部队的战士申回子送军法处判处死刑，再交你团执行枪决的意

见，以儆效尤，而达巩固部队之目的。同连犯兵杜良明可另给处罚，以资教育。又你团一连犯兵黄巨万素行恶劣，此次强奸十岁幼女，应即送军法处依法判处极刑。

此致

敬礼

林伯渠

注1：七月十八日呈缺。

林伯渠对延属专署工作的几点指示

（一九四七年七月二十二日）

李专员：

得七月八日来信及景膺同志来述，知你已由东三县及延安、安塞等县巡视回到专署，甚慰！边府同意你们提出加强专署工作的各项意见，一些具体问题，除已于景膺同志面商解决外，兹在专函答复如下：

延属高等法院分庭准予成立，业已电调周玉洁同志前来。

子长银行办事处及贸易分公司已商得财经办事处同意改为分区机构，由专署直辖。

延安县万余群众转移至子长，务望对其生活、生产、纪律各方面多加注意照顾与指导，一俟敌军大兵撤退，县政府应即领导游击队保护壮年男子回家生产，并组织群众开展各个方面的对敌斗争。

马定邦同志应调至专署附近地区工作，以便和你们经常联系，交换经验，对专署的帮助会更大一些。

关于我军少数人员着敌军服，不带路条，滋扰群众之事，我们接

到你们的报告后，当即联司同意通令各分区各兵团注意纠正矣。

你此次寄来的报告，有些还好，有些内容仍不具体，如安塞几个区的灾情损失调查，只有损失数，没有原有数，因之看不出损失的程度。鄜县土地改革的报告虽很简单，但已可看出他们工作中是有很大偏向的。如对地主清算斗争少，献地多。这样势必影响群众的发动。并有不少地区侵犯中农利益，更不妥当。请注意研究给予指示。

此致

敬礼

林伯渠

中央军委电[注1]

彭并告贺、习又西北局：

同意前委即以彭（德怀）、习（仲勋）、张（宗逊）、王（震）、刘（景范）五同志组成，彭为书记。西北野战兵团定名为西北人民野战军，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委；习（仲勋）为副政委。

军委

午　世

注1：这是7月31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西北野战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并告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贺龙和政治委员习仲勋及西北局的电报。

陕甘宁边区政府命令

——通令嘉奖杨鸿章、樊志杰等

【新胜字第39号】

（一九四七年八月一日）

各专员、县（市）长、各民兵游击队长：

查子长县完小校长杨鸿章同志，工作一贯积极，当胡匪进犯子长时，即自告奋勇，参加东一区游击队，因功晋升为指导员，教育队员，联系群众，很有办法。曾亲身参加战斗三十余次，俘虏敌人四十二名。常带少数队员深入敌后夺敌物资，捕杀敌人，阻击敌人抢粮，堪称公教人员投笔从戎的表率。据此，除传令嘉奖外，应奖给“新民主主义奖章”一枚。

子长东一区区长樊志杰同志，当敌人首次进攻杨家园子时，亲率少数干部及民兵一部，牵制敌人，动员群众，于一夜之间将公粮二百余石全部疏散，事后复掩护该处群众安全转移，随即领导本区游击队坚持原地斗争。亲自参加战斗四十余次，每次冲锋在前，果断杀敌。同时还领导本区各种战争动员工作，安定群众情绪，组织群众生产，实为地方干部坚持原地工作的模范。据此，除传令嘉奖外，应奖给“新民主主义奖章”一枚。

子长东一区神枪手李炳万同志，射击准确，作战勇敢。参加二十余次战斗，捉敌三十七名，每次战斗均以他为主要打手。在熟寺湾战斗中光荣负伤，爱惜民力，坚决不要动员牲口运送，提出十天后重上战场，结果不到十天又奋勇参战。据此，除传令嘉奖外，应奖给“民兵英雄奖章”一枚。

子洲县裴家湾区六乡指导员王振修同志，临危不惧，机智勇敢。敌犯绥德窜经该乡时，隐蔽山上捉敌便探二名。坚持岗位，不避烦劳。对我军过往部队，能在困难条件下适当保证各项供给，及时集中全乡牲口，完成运送伤员的紧急工作。据此，应予传令嘉奖。

子洲裴家湾区三乡公民张林清，在敌人进犯该乡时，设计营救被俘乡长脱险，具有舍身保护革命干部的高尚精神。据此，应予登报表扬。

此令！

主　席　林伯渠
副主席　李鼎铭
　　刘景范

陕甘宁边区政府通知

——残疾抚恤金及老年优待金减半发给

【新胜字第40号】
（一九四七年八月一日）

各专员、县（市）长
各机关、部队、学校：

为支援边区爱国自卫战争，本府决定，本年度（一九四七年度）残疾抚恤金及老年优待金一律按照去年标准减半发给。特此通知。

主　席　林伯渠
副主席　李鼎铭
　　刘景范

中共中央西北局
关于蒋管区工作的指示(初稿)

(一九四七年七月六日)

目前全国正处于新的革命高潮前夜，我全面大反攻即将展开，西北战局也将很快发生变化，而其发展又必然使消灭胡宗南收复边区解放西北的任务，紧密结合起来，任其功于一役。为此，蒋管区党的组织担负着光荣伟大的任务，应更加深组织广泛的反胡统一战线，开展人民的游击战争，以直接配合我军作战，在新解放地区积极发动与团结广大群众，组织民主政权，建立革命秩序等。各蒋区党在精神上与实际工作上，事先都应有充分的准备。

凡沿边及山岳地带，条件成熟地区，均应放手开展游击战争，必须深刻认识，蒋区工作的开展，去主力只能在消灭敌人正规军打开局面上给以推动，但我主力不会永远在一个地区行动，敌军在我主力走后，还会重来。故必须发动群众肃清反动，领导群众进行翻身斗争，坚持人民的游击战争，经过多次的反复斗争，游击根据地才能变成巩固的解放区。依赖主力打平天下，解决一切的想法是错误的，必须彻底克服。根据最近经验，对开展蒋区游击战争有如下几点意见：

各游击区应就地吸收劳动人民，壮大游击队，并应培养一个基干游击队，作为该地区游击主力，必要时配合其他游击队打击敌人，如完全分散隐蔽，不但群众不易发动，本身也难于立足。

现各地游击队中有特务、土匪、兵痞、流氓混入，成分复杂，动机各异，乱抢乱杀、破坏政策和纪律行为不断发生，极应整顿内部。坚持以劳动人民为基本成分，进行审查清洗，加强政治教育，选派坚

强的干部进去领导，单纯以军事观点（所谓胆子大、枪头好）选人是不对的，应该纠正。

游击队存在于壮大的主要条件，是与当地群众密切结合，我游击队欲与蒋区群众结合，须首先免除群众“三害”（壮丁、粮款、差役）。为此，除发动游击区群众抗丁、抗夫、抗粮、抗款外，更要彻底反复摧毁乡镇保公所及一切保甲机构（但对保甲人员中之进步、中间分子应进行争取工作），即沿边游击区的两面政权，对其机构也应摧毁，以便逐渐扩大边区，建立民主政权，不如此，群众“三害”无法避免，游击队也难于其中结合。

对于自卫队、保警队等地方部队，必须加强瓦解工作，消灭其最反动部分，以消除发展蒋区游击战争的障碍。对于勾结敌军、特务欺压人民之反动土、劣、地主，必须坚决打击，情况允许时交群众公审处置。对敌人公路、铁路、电线、仓库，应配合我军作战需要，即时予以应有之破坏，以断绝敌陆上交通运输，此应为蒋区游击队重要任务之一。

目前形势极有利于组织反胡统一战线，即特务也开始分化，某些地方官吏和军官也逐渐动摇。在我军胜利反攻情况下，这类事必更会增多，我应主动找这些关系，争取与我合作反胡，能拉开干的即鼓励拉开干。团结这些人的适当口号是“地方自治”。对于这些人必须有联合又有斗争，不要怕他们不来，斗走后碰了反动派压力又会回来的。必须认识，此类统战关系有两种前途，一种是走向进步，转变他自己出身的家庭社会封建关系；一种是现在与我们共同反蒋反胡，在土地改革时，又将转过来反对我们。因此，对于他们的起义应按下列三个原则处理：

有武器、有人员、有反胡行动，找我接洽，愿受我指挥领导，我能派人进去进行改造工作，将来能成为我们的力量者，可给以“人民解放军”名义，但必须有保障。

有武器、有人员、有反胡行动，但不愿受我约束者，则只能当做友军，当做反胡同盟军，不能给“人民解放军”名义，只能积极和其建立反胡的统一战线。

根本无人无枪，亦无反胡行动，想利用我军名义达到投机企图者，只能与之进行外交工作，鼓励其进行反胡工作。

对于内应力量使用，须依情况、对象提出不同要求。

条件成熟，举行起义。

条件未成熟，部分起义，部分保留，继续准备。

敌我反复争夺地区，条件不成熟，可逃跑或让出部分碉堡，以便我军占领要地。

条件不成熟，但可散布失败情绪，在我军进攻时，实行不抵抗，率部缴枪。

必须通知蒋区各地党的组织，凡我军新到之处，各该地党应指定党员主动秘密与我军政治机关联系，以便报告情况，动员群众协助我军。

除沿边及山岳地带，条件成熟地区放手开展游击战争外，其他地区应积极发展隐蔽的武装力量，加紧准备，以便随时配合我军反攻，但应防止过早的暴露。各个地区的党员并应加强群众工作，领导群众进行各种斗争，如逃丁、逃夫、躲粮、躲款，以至抗丁、抗夫、抗粮、抗款等，应依据不同地区的具体情况（如敌统制力量的强弱）和群众的切身利害，提出适当口号，发动斗争，如条件成熟，形势有利，敌已无力镇压时，即可引导群众走向“民变”，以便更有利的配合我军反攻。

为了配合我军攻势，便利蒋区工作开展，必须加强宣传工作。各地委、工委应印制大量短小精悍的宣传品，交由游击队、武工队或其他一切可能方法，向蒋区散发。应根据“七一”社论所提出要点，利用最近一年来新的重大发展与变化进行广泛的宣传，特别着重于西北

人民切身利益出发的反胡宣传，各工委更应针对不同的地区对象和情况进行具体宣传。对敌之欺骗宣传应进行研究，适当的予以揭穿与驳斥。最近以来瓦解敌军工作，收效甚微，各工委应即检查这一工作，并注意加强。

为了胜利的担负解放西北的伟大任务，各蒋区党必须积极的放手发展党员，以充实党的力量，增进党与蒋区群众的密切联系，使党能更普遍更有力的领导蒋区群众斗争，特别是蒋管游击区域，以及党员很少的重要地带，更应放手大量发展。为此，必须克服束手束脚不敢发展的关门现象。必须充分认识，蒋区群众绝大多数是好的，他们在蒋胡残酷暴虐的黑暗统治下，普遍的增长着不满与反抗的情绪，渴望着解放与翻身，只有极少数的地主富农等，才对蒋胡还存在着幻想，只要我们能大胆而又慎重地选择吸收，特别在群众斗争中，是可以做到大量发展的。同时也必须认识，敌人特务机关是无时无刻不想派遣特务奸细打入我党，进行破坏的。因此，必须在发展中提高警觉，严防特务奸细及其他异己分子混进党来。对现有党员也应进行审查，清洗异己分子，以求党的巩固。但这丝毫不能影响积极放手发展党的方针。

各地党应在蒋区各重要据点指定专人经常搜集军事情报，并在边境周围设立若干情报收集站，派出内外联络人员收集情报，此在XXX作战中颇著成效。

此指示收到后，各工委口头向下传达布置，并将执行情况随时反映上来。

三、文章择录

为支援前线立功

（新华社西北六月二十七日电）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顷以“为支援前线立功”为题，在边区群众报撰文称：在保卫边区、解放大西北的伟大人民自卫战争中，每次战斗的胜利，都涌现出成千成万的战斗英雄。为人民解放的革命事业立下了永垂不朽的功劳。在后方为了保证前方胜利，边区人民对担架、运输、救护伤兵、供应粮草、反特锄奸以及生产节约、土地改革等战时工作，也开始涌现出一些模范事迹和英雄人物。但与前方主力部队的作战功迹相较，则仍有逊色。甚至赶不上战争的需要，落在战争发展的后面。须知战争是全面的、长期的、艰苦的，要彻底消灭蒋胡贼军达到最后胜利，就必须动员所有人力、物力，一切为着战争，一切为着前线，人人立功，事事立功。不论党、政、军、民，不论前方后方，不论男女老幼在一切岗位上为大众，为自由，为保卫边区，为解放大西北建立功劳。把立功运动扩展成为群众性的热潮，为继续劳模运动，组织与动员干部及人民在对敌斗争中，发挥积极性创造性。要根据不同工作不同对象，经过群众路线具体组织他们，在参军参战扩大主力涌上前线中立功，在服务战勤担架运输中立功，在为作战部队烧水做饭缝衣做鞋中立功，在增产粮食厉行生产保证供给中立功，在实行战时土地改革中立功，在响应政府一切号召和完成一切任务中立功，掀起群众性的立功热潮，使全边区人民的雄伟力量，在立功运动中以排山倒海之势支援前

线，一直到最后消灭敌人。

原载1947年6月28日《人民日报》

西北局召集边区一级党员大会，号召做好支前工作

（新华社7月3日电）中共中央西北局召集陕甘宁边区一级党员大会，庆祝“七一”。会上马明芳副书记号召每个党员必须切实做好支援前线工作；边府林伯渠主席号召每个党员必须严格遵守党的纲领、政策、决议和发扬艰苦奋斗的传统作风；联防军副司令员王维舟则号召每个党员成为遵守群众纪律的模范。

原载1947年7月3日《人民日报》

加速解放大西北　陕甘宁干部参军

（新华社陕北12日电）陕甘宁边区各级干部中正掀起参军热潮。响应“消灭胡宗南，解放大西北”的口号，自中共西北局中央书记习仲勋，组织部长马文瑞、边府副主席刘景范及西北党校学员等六十六人出发参加前线工作后，西北局边府各机关有二百三十六人报名请求参军，经各该领导机关慎重审查结果，其中已有七十三人荣获批准。绥德分区也有一百余干部要求入伍，其中包括绥德县委宣传部副部长郝志福、县府四科长刘国荣、米脂县副县长宋荣华、县委宣传部长石如山、清涧县委书记刘书亭及吴堡县委书记吴子玉等人。区乡干部更热烈要求从军，绥德义合区有十九名干部，子洲县（绥西）十个区在一周内有三十四名干部报名参军。子洲双湖峪区三乡乡长李牛荣报名参军，批准后，他的妻子兴奋地说：“你去，现在军队工作重要，革命

要你那达去你就那达去！”

原载1947年7月13日《人民日报》

壮大主力军　消灭胡宗南　陕甘宁党员带头参军

（新华社西北一日电）“壮大主力军　消灭胡宗南”陕甘宁各地共产党员踊跃带头参军。绥德义合区在党员田举华、田秉汾报名影响下，截至七月十日已有一百四十名青年参军。县青年干事贺汉德从军后，回家劝说其外甥赵国柱、刘双儿及邻居十名青年参军，该十人又各动员一个亲友，一次即集合二十名青年涌入主力。一乡党员李富儿和二乡党员刘明光的参军，推动了三十余个农民自动报名。子长县游击队员八人，亦在队长郭善堂率领下，争先参军正规军。

原载1947年8月3日《人民日报》

发刊词——林伯渠

陕甘宁边区，在十年相对和平时期中，曾经在各种建设方面，获得良好的成绩，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和成绩，是值得我们宝贵和重视的。但经数月来战争环境的考验，又证明我们过去工作中还遗留下不少的弱点与缺点，在由十年和平转入战争的时候，暴露出我们在思想上和政治上不能完全适应战争中变化了的形势，暴露出我们部分工作还赶不上甚至远远落后于客观的需要。我们部分机构和制度不能适应新的环境，且未及时调整，我们干部工作作风、方式、方法存在着强迫命令脱离群众的严重现象。因此，要使我们全部工作的方向、机构、制度、作风、方式、方法，以至生活习惯，都须适应战争

需要转向一个新的道路，就是说不能满足已有的经验，不能只看到自己的成绩，而应当在新的斗争形势与人民新的要求下，虚心地纠正错误，改进工作，打破骄傲自满，故步自封和墨守成规的思想观点，每个干部必须面向群众深入实际，以创造的战斗精神与学习新的事件和经验，努力学习，加强自己，以适应客观需要并指导实际工作。

事实已经证明，凡是能了解群众实际生活和要求，研究上级指示，总结新的经验，在战争中必有新的创造，工作也有很大转变和发展；反之则工作无进展，甚至使人民受到很大损失。

《边区政报》就是适应这一情况和需要出版的：

一、《边区政报》必须适应迅速转变的客观情况，抓住以战争为中心而产生与发展的各种新事物，如在前线上，在后勤中，在战争、生产、土地改革及各地游击战争、反“清剿”中，它应成为上下左右交流经验，提示教训，帮助各级政府和政府工作人员加强学习，提高能力，推进工作，在战争中开展立功运动的一个武器。

二、为着达到上述目的，必须本着“大家办大家看”的方针，成为各级政府和政府工作人员大家的刊物。因此，给政报写稿，把政报当做经常学习文件，组织讨论，随时提出意见，充实改进政报的内容，应是每个工作人员的责任，各级政府的领导同志更应组织领导进行。此外，政报应广泛搜集和听取各方面的批评和建议，来不断地加以改进，使其真正能够和每一时期的实际相结合，以不断改进自己来推动边区政权工作有力的前进。

原载1947年7月15日《边区政报》第一期

转战陕北

蒋介石破坏停战协定，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经过八个月

作战，被歼灭六十七个旅，七十万余人，为了挽救其失败的命运，一九四七年春又向我山东解放区和陕甘宁边区发动了所谓“重点进攻”。指使在陕甘宁边区南线的胡宗南，西线的马鸿逵、马步芳，北线的邓宝珊，共二十多个旅二十多万兵力，同时向陕甘宁边区大举进攻。三月十三日，胡宗南部整编第一军军长董钊、整编第二十九军军长刘戡指挥十五个旅约十四万人，由洛川、宜川一线向延安进犯，并出动飞机五十余架次，对延安进行狂轰滥炸。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考虑到敌我态势与各战场情况，为了诱敌深入，寻找有利时机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决定主动撤出延安。

在撤离前夕，林伯渠告诉大家说：“撤离延安是暂时的，撤离正是为了保卫。将来不仅要收复延安，我们还要打出去，解放西安、南京、北平，解放全中国。延安的天时地利都对敌人不利，蒋介石进攻延安之日，也是他走向彻底失败之时，我们要有这个信心。只要我们搞好坚壁清野，发动人民打好游击战、运动战，敌人就会陷在陕北的山区里，被我们消灭掉。”他对战争充满着必胜的信心。

三月十三日，林伯渠和中共中央西北局、边区政府机关离开延安。中共中央于三月十八日撤离延安。十九日清晨，彭德怀亦随我守城部队最后撤出延安。当时中共中央决定，党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仍继续留在陕北，由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主持领导和指挥全国作战。另外，由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等组成中央工委，前往华北地区进行中央所委托的工作；以叶剑英（为书记）、杨尚昆（为后方支队司令员）等组成中央后方委员会，带领部分中央机关、学校转移到晋西北地区。

在中共中央撤离延安后的四十多天里，彭德怀在毛泽东的亲自领导下，在各解放区战场的配合和边区居民的支持下，运用毛泽东制定的“蘑菇”战术，指挥西北人民解放军，很快取得了青化砭、羊马河、蟠龙战役的重大胜利，歼敌一万五千多人。对此，林伯渠十分高兴，立即拨款六亿元，送致西北人民解放军，并派出劳军慰问团去前

线慰问。五月十四日，陕甘宁边区五万军民在真武洞（安塞）举行祝捷大会，林伯渠因病未能参加，他特意致函彭德怀、习仲勋并转全体指战员表示祝贺。函称："敌胡宗南倾巢犯边区，我西北人民解放军在英明指挥下英勇战斗，于青化砭、于羊马河、于蟠龙，连战皆捷，不仅挫敌锐气，丧敌鼠胆，而且奠定了发展边区，解放大西北的胜利基础。值兹祝捷大会，本拟亲来参加，借致敬慰之忱。乃以痔疮久发，便后出血，至今未愈，医生嘱咐不能远出，以此行而未果，实觉歉疚！"他还表示，今后一定要更加充分发动陕甘宁边区一百五十万人民，"竭尽全力，并作长期打算，支援前线，争取最后胜利。"当时，林伯渠的痔疾十分严重，甚至坐褥常被脓血所染，为此，边区政府办公厅提议，又把林伯渠夫人朱明从晋绥解放区调回陕北，以便照料。

为了便于统一军事指挥，做好后勤支援，五月十九日，林伯渠在西北局召开的后委会议上提出，地方兵团和游击队统由前委指挥，后委管理粮草、衣服、支前、财经等工作；把行知中学变成战时医院，调有工作能力的学生作战争动员和支前的工作。他还提出，马上解决二十万人的吃粮问题，尽快筹备六万石粮食；搞内部市场，发展贸易，调剂货币流通，解决财政问题。在这次会议上还决定成立后委党组，由林伯渠、贾拓夫、王维舟、马锡五、常黎夫、惠中权、王子宜、周兴、范子文、江隆基、唐洪澄等十一人组成。

六月十一日，林伯渠率边区政府由白庙岔转移到绥德县（编者注：应该是子洲县）马蹄沟，在这里住了五十天。这时，胡宗南军队虽遭到西北野战军的重创，但仍气焰嚣张，急于寻找我军主力决战。为鼓舞士气，帮助同志们认识战争形势，在七月一日庆祝党成立二十六周年纪念会上，林伯渠向大家讲述了中央苏区五次反"围剿"和长征的情况，说："现在我们的条件比起那时是好多了，陕北地形对我军作战有利，群众支持我们，其他解放区战场捷报频传，对西北战场也是个有力的支援。""更有利的条件，就是我们在党中央毛主席的直接领导下，牵

着敌人的鼻子转。最近，我军又甩开敌人主力，突袭陇东，挥师三边，搞得敌人晕头转向，摸不着头脑，这就是毛主席的蘑菇战术。这些条件加在一起，消灭胡宗南军队是完全有把握的。”“我虽然年纪大了，能和大家一起战斗，感到很快乐。同志们朝气蓬勃，对我是个很大的鼓舞。”同志们看到林老已白发苍苍，还和大家一起爬山越岭，同甘共苦，而且是那样乐观和充满信心，也都更加坚定了战争必胜的信心。

在转战陕北期间，为使政府工作适应战争环境，更好地为战争服务，帮助各级政府工作人员加强学习，上下左右交流经验，林伯渠领导边区政府创办了《边区政报》。他在《发刊词》中说：经数月来战争环境的考验，证明我们过去工作中还遗留下不少的弱点和缺点，在由十年和平转入战争的时候，暴露出我们部分工作还赶不上、甚至远远落后于客观的需要。因此，要使我们全部工作的方向、机构、制度、作风、方式、方法，以至生活习惯，都适应战争需要转向一个新的道路，就是说不能满足已有的经验，不能只看到自己的成绩，而应当在新的斗争形势与人民新的要求下，虚心的纠正错误，改进工作，打破骄傲自满、故步自封和墨守成规的思想观点，每个干部必须面向群众，深入实际，以创造的战斗精神接受与学习新的事件和经验，努力学习，加强自己，以适应客观需要并指导实际工作。

撤出延安时，中共中央、边区政府一部分机关和工作人员转移到晋西北，后来，两个解放区的联系也愈来愈密切。一九四七年八月中旬至十月下旬，为了商讨两个解放区的财政统一问题，林伯渠东渡黄河到了晋绥解放区。这时正遇上他辛亥革命时的老友、晋绥行政公署主任续范亭不幸病逝。林伯渠回忆续范亭当年率部反清、反袁，在寇深祸亟之时，为反对南京政府腼颜事仇，竟不惜在南京中山陵前剖腹自杀，以激起全国人民共同抗日；看到续范亭在病入膏肓、处于弥留之际，仍至诚地留下遗书，请求中共中央严格审查他的历史，追认他为中共党员不觉潸然泪下，写挽诗一首：

一柱撑西北，范亭自始终。
覆清摧帝孽，倒袁奏奇功。

长恨法西斯，不惯客里空。
睿思早入党，人民爱如兄。

品概清泉洁，言行万众宗。
如何病不起，老泪洒秋风。

原载林伯渠传编写组撰写，红旗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林伯渠传》第462—467页。

心系前线

习仲勋曾说：由于小河会议确定组成西北野战军前委，决定西北局回后方主持工作，会后，我即和彭总分开，与贺龙同志一起前往绥德，统筹后方工作，全力支援野战军作战。

七月二十四日，即小河会议结束后第二天，习仲勋同彭德怀一起由小河村进至石湾以西十五里的一个村庄，二十六日回到米脂县背坬西北野战军总部。二十九日，习仲勋和贺龙参加了彭德怀在马蹄沟主持召开的野战军第一、二纵队旅以上，新四旅、教导旅团以上干部会议，通报了各战略区情况，及晋绥与陕甘宁统一和榆林战役等问题。在彭德怀、贺龙讲话后，因为要离开前线，习仲勋着重对即将发起的榆林战役发表了意见。他分析介绍说，榆林是国民党军晋陕绥边区总部所在地。其西与宁马集团、南与胡宗南集团形成掎角之势，北与绥远傅作义集团相依，为国民党军在陕北的重要据点。榆林城西侧有榆

溪河，西北面均为广阔沙漠，东南是丘陵与沟壑，城墙坚固，易守难攻。我们必须充分了解和高度重视敌军特点，坚决执行中央军委的战略部署和彭总的战役决心，诱敌深入，拖住胡宗南主力深入榆林，以利于陈赓纵队南进和发展，也利于我西北野战军今后行动。八月三日，习仲勋在已移至小理河口枣林坪的西北野战军总部，同彭德怀、贺龙再次研究了攻打榆林的部署，统筹安排了前方和后方的工作后，即离开了作战前线。

习仲勋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撤离延安之际，临危受命，协同彭德怀指挥西北人民解放军驰骋陕甘宁广大地区，在四个多月时间内历经较大战役、战斗八次，歼灭国民党军四个旅部，十三个团及两个保安队，毙伤敌一万一千余人，俘敌一万五千余人，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和粮食物资，初步改变了西北战场形势。尽管时间不长，却是习仲勋革命经历中具有重要意义的时期，是他作为党和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优秀领导人担负起参与指挥战略区域作战重任，并取得卓越胜利的时期。据不完全统计，四个月中，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名义发给彭德怀、习仲勋，和彭德怀、习仲勋发给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电报达九十六份之多。这些电文起始称谓或文尾署名，皆以彭习并列。毛泽东还在电文中称西北人民解放军为“彭习军”。正当西北解放战争正在深入向前推进之时，习仲勋奉命离开前线，回后方主持工作。他的心情颇不平静。

在四个多月戎马倥偬中，他同年长自己十五岁的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废寝忘食，殚精竭虑，商讨战局，筹谋军机，爬山越岭，栉风沐雨，行军打仗，风餐露宿，度过一百多个日日夜夜，常常因为环境所限挤在一个土炕上睡觉，他们在硝烟战火和枪林弹雨中结下了深厚情谊。他们密切配合，相得益彰；他们相互尊重，真诚相待；他们正确指挥，出奇制胜，带动了全野战军紧密团结，通力歼敌，也在广大指战员中传为佳话。时任野战军副参谋长的王政柱将军五十年后

回忆彭、习在西北战场往事时曾说：转战陕北开始时，党中央任命西北局书记习仲勋为西北野战军副政治委员，任命边区政府副主席刘景范为野战军后勤司令员。彭总对他们十分尊重，从不称呼他们“副政委”、“后勤司令”等军队兼职职务，总是以“习书记”、“刘副主席”称之。我经常看到，彭总制订的作战计划，在交付讨论之前，总要先同仲勋交换意见；彭总草拟的命令、指示，在送电台发出之前，总要让仲勋再作推敲和修改；收到中央重要文电，彭总看后立即同仲勋一起商量贯彻意见。彭总不但自己尊重、关心仲勋和景范同志，而且经常对我们说，要向地方党政领导同志学习。在战场上许多次危险时刻，他们互相关心，争先向前的情景更是感人至深。有时，敌机狂轰滥炸，流弹横飞，彭德怀为了准确无误地实施指挥，总是不顾个人安危，冲出阵地，察看地形和敌情。当习仲勋等劝他注意安全，甚至强行将他拉下阵地时，彭总说：不到前面去，光靠电话和地图是打不了胜仗的。但是当习仲勋等要靠前指挥时，他却说：还是让我去，你不要冒险，何必多付出牺牲呢？革命还是多留下一些人好嘛！他们不畏牺牲，争先走向炮火激烈的方，使前线官兵受到巨大鼓舞，从而产生了无敌的力量。

习仲勋对陕北前线四个月战斗生活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尤其是对和彭德怀“共同闯过无数艰难险阻，也共同分享过无数次胜利的欢乐，在陕北千山万水的行军途中，在长城内外的宿营地里，在战火纷飞的生死搏斗的战场上，战斗的情谊更加深厚而难忘”。以至到了一九八〇年初，刚刚从长达十六年政治劫难中走出的习仲勋，就饱含深情地写下了题为《彭总在西北战场》的纪念文章。文章一开头就写道：“每当想起彭德怀元帅艰苦征战的一生，我便心潮起伏，百感交集。”文章以较长篇幅记述了指挥西北野战军转战陕北的艰苦岁月。他称彭德怀是“国内外享有盛名的军事家，是中华民族引以为荣的杰出将帅，是为中国革命战争史写下极其光辉篇章、创造了‘威武战争

奇观’的英雄，是具有崇高品质的学习楷模，是自己的良师益友”。他在文中还写道：在整个西北解放战争期间，有时候我追随彭总在前方打仗，有时候和贺龙元帅一道组织晋绥、陕甘宁边区的人力、物力支援部队。在恢复延安，解放西安、兰州和祖国西北边疆的一系列战斗中，在肃清敌人残余势力和建立西北各省人民政权的日日夜夜里，作为严师益友的彭总，给了我深刻的教育和巨大鼓舞。这位叱咤风云的一代英雄，对党、对人民、对共产主义事业无限忠诚的崇高品德，永远铭记在我的心中。

一九八八年四月，为纪念党中央转战陕北四十周年，习仲勋又专门撰写了《英明的决策，伟大的胜利》一文，对彭总由衷的怀念和敬重仰慕之情，跃然纸上。文章写道：作为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的彭德怀同志，以对革命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忠心耿耿，竭诚尽智，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思想和作战原则。他深入前线，掌握敌情，运筹帷幄，呕心沥血，机动灵活地进行指挥，为夺取转战陕北的胜利立下了卓著功勋，在边区人民心目中筑起了一座流芳千古的丰碑。

习仲勋是怀着对陕北战场高度关注和对前线将士的深厚感情回后方主持西北局工作的。此时，他是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委员，又是西北野战军副政治委员和中共西野前委委员。尽管后方党、政、军、民、财政、经济、土改、支前等方面的工作极为复杂而繁重，但他仍心系前线，参与西北野战军军机大事、重要决策。此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发来电报的形式也有了一些变化。通常以“贺习”并称或冠以“彭并转贺习”，有关后方工作的电文也以“贺习”或“贺林习”（林指林伯渠）署名报出。彭德怀仍将西北野战军重要活动的一些文电在上报中央军委同时转送贺龙、习仲勋。

原载习仲勋传编委会贾巨川撰，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8月出版的《习仲勋传》（上册）第十五章

在战争中大量发展党员

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集团以30万大军围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挑起了全面内战。到1947年2月的8个月中，人民解放军共歼灭进攻解放区的国民党正规军54万人、杂牌军17万人。由于国民党军队已无力进行全面进攻，便改变战术，纠集其总兵力的43%，即94个旅重点进攻中共领导的山东解放区和中共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1947年2月28日，蒋介石偕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飞抵西安，督导胡宗南进攻延安。到3月10日，国民党在西北地区已集结25万兵力，94架飞机，准备分左右两翼向延安闪击。扬言“三天内攻下延安”，“三个月至六个月解决中共”。当时，驻守陕甘宁边区的人民解放军仅2.6万人。面对强敌，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审时度势，做出了“暂时放弃延安，诱敌深入，分而歼之”的战略决策，并在3月16日作出决定，以陕甘宁边区和晋绥解放区的第一、二纵队，新四旅、教导旅等为骨干力量，组成西北野战兵团。任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委，习仲勋为副政委。为了适应战争形势，西北局一分为二，组成以彭德怀、习仲勋、马文瑞、刘景范、张德生等为领导集体的前方委员会(简称前委)和以马明方、林伯渠、贾拓夫、曹力如、王子宜等为领导集体的后方委员会(简称后委)，分别领导陕甘宁边区前线和后方党的工作。

1947年3月18日，也就是胡宗南军队侵占延安的前一天傍晚，彭德怀、习仲勋、马文瑞、刘景范等西北局前委领导同志到王家坪看望毛泽东主席。他们此行要向主席汇报西北局和边区政府各机关的疏散、撤离情况，野战兵团的战斗部署，更主要的是非常担心毛泽东和中央机关的安全，敦促主席和党中央尽快离开即将成为一座“空城”的延安，转移到安全地带。当他们来到毛泽东的住处，不禁十分诧

异：这里丝毫没有大敌压境的紧张与匆忙，毛泽东对远处敌军的炮声充耳不闻，仍在平心静气地伏案工作。当彭德怀、习仲勋等汇报了军队的部署、党政机关的撤退情况，以及干部、群众中普遍存在对拱手让出延安“舍不得”、“想不通”的思想情绪时，毛泽东说：“敌人要来了，我们准备给他们打扫房子。我军打仗不在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在于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敌人进延安是握着拳头的，他到了延安，就要把指头伸开，这样就便于我们一个一个地切掉它。要告诉同志们，少则一年，多则二年，我们就要回来，我们要以一个延安换取全中国！”彭德怀、习仲勋、马文瑞等西北党政军领导者，从毛泽东这位具有远见卓识、大无畏英雄气概的人民领袖身上，吸取了无尽的力量。

参战，必须轻装。马文瑞忍痛把许多生活用品都舍弃了，但把当年在抗大学过的毛泽东讲授的《辩证唯物论提纲》(油印本)和几本马克思列宁的著作珍爱地打在背包中。这些，就是武器，是须臾不能离开身边的。

随西北野战兵团一起行动的马文瑞，按照“一切服从战争，一切为前线服务”的方针，和习仲勋、刘景范、张德生等同志一起，连夜赶到布防在延安东北青化砭的西北野战兵团司令部，协助彭德怀司令员筹划抵御敌军进攻。他们这一阶段的工作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动员地方干部和群众参战，二是保障参战部队的后勤供给。

这次国民党军队对陕甘宁边区的“重点进攻”，采用了比侵华日军“扫荡”更残酷的“拉网”、“篦梳”战术。据战后统计，全边区27个县的一千几百个乡，仅有13个乡敌人没有到过。整个边区都成了战场。西北局动员大批群众和地方干部参加正规部队或地方部队(自1947年2月至1948年12月底，陕甘宁边区即有50705人参军入伍)，拿起枪杆与进犯的敌军作战。同时，西北局号召留在地方的广大干部“乡不离乡，村不离村”，组织游击队和民兵就地带领群众与敌人开展斗争。留

在本地的县、区、乡、村干部，群众基础深厚，地形熟，占“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他们带领民兵和游击队与入侵的敌人周旋。敌人来了，他们转移到别处，坚持流动工作；敌人走了，他们又回原地恢复政权。“白天是敌，夜间是我”。表面上，敌人占领了边区的土地，实际上，民心所向，一切主动权仍掌握在共产党的手里。敌军所到之处，找不到粮食，找不到水井，得不到情报，甚至抓不到一个带路的向导，像又聋又瞎又瘸的疯牛，在人民战争的铜墙铁壁面前碰得头破血流。

保证部队的后勤供应是西北局和边区政府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因为战火将燃遍整个陕甘宁边区，面临的形势极其严峻。后勤工作仅靠原联防军后勤部的力量很难完成。因此，在撤出延安之前，毛泽东代表中央任命刘景范为西北野战兵团后勤司令兼政委。因为刘景范不仅是西北局委员，还是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边区总动员委员会主任。任命他为后勤司令，旨在动员全边区的人力、物力、财力打赢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西北局前委和后委这一阶段的工作中心，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与刘景范“后勤司令”的工作相辅相成的。

马文瑞和西北局前委领导成员们，在行军、作战间隙，向部队和群众宣传暂时放弃延安，是为了大量消灭敌军有生力量的伟大战略意义，要求部队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爱护和依靠人民群众。揭露敌军表面气势汹汹，实则外强中干的虚弱本质。鼓励战士们发扬敢打敢拼，不怕流血牺牲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为保卫边区、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建立功勋。随军转战途中，马文瑞和西北局前委成员们以总动员委员会的名义发动当地干部群众踊跃支前，筹集军粮、军草、军鞋，组织担架队、运输队，救护转运伤病员，运送弹药和军需物资。同时，揭露敌人谣言，稳定民众情绪，掩护群众转移，安排参战和支前人员家庭生活和生产。对于个别部队和地方干部中出现的忽视群众纪律，随便征用民工、民畜及强迫命令作风，马文瑞及时提出批评，予以纠正。在召开军事会议时，彭德怀司令员也认真征

求和听取马文瑞等西北局前委成员的意见和建议。

西北野战兵团在党中央、毛泽东的领导下，在彭德怀的指挥下，牵着敌军鼻子“大游行”。按照毛泽东所说，“这种办法叫‘蘑菇’战术，将敌磨得精疲力竭，然后消灭之”。3月25日，西北野战兵团第一、二纵队和教导旅在延安东北青化砭地区设伏，全歼胡宗南部整编二十七师之三十一旅旅部和一个团共二千九百余人，生俘敌旅长李纪云、副旅长周贵昌、参谋长熊宗继。解放军仅有百余人伤亡。这是解放军撤出延安后的第一次大胜利。给来犯之敌狠狠一击后，马文瑞等西北局前委成员随部队迅速撤离战场，避开大路，翻山越岭牵着敌军北进，寻找歼敌良机。在行军途中和夜间宿营时，马文瑞和后勤司令员刘景范不顾疲劳，和当地干部一起动员群众支前。在寒冷的陕北仲春时节，他们宁肯光脚穿着磨破的布鞋也舍不得动用那堆积如山的军鞋军袜，宁可自己饥肠辘辘，也要把一驮驮炒面、干粮送到战士手中。常常是忙了整夜，还没顾上休息，就天已破晓，又该出发了。指战员们感动地说：“刘主席、马部长比我们还辛苦。”4月14日，西北野战兵团第二纵队和新四旅又在瓦窑堡西南的羊马河设伏，全歼国民党军整编十一师之一三五旅四千七百余人，生俘敌代旅长麦宗禹，开创了全歼敌一个整旅的范例。5月2日，西北野战兵团一、二纵队及新四旅强攻敌军重要补给基地蟠龙镇，全歼敌整编一六七旅及一个保安总队共计6700余人，俘敌旅长李昆岗、副旅长涂建，缴获军衣4万套、面粉1.2万袋、骡马1000余匹和大量武器弹药。这3次重大胜利，成为陕北解放战争初期著名的“三战三捷”。

在连战皆胜的鼓舞下，西北局于5月7日发出《关于敌占区农村干部和党员的工作任务及活动方式的指示》，要求已公开身份的党员和干部分别参加县、区游击队或民兵游击小组进行武装斗争，尚未暴露身份的党员应留在敌占区坚持秘密活动。同时指示各级党委立即对农村干部和党员的战时表现进行一次审查。5月19日，西北局又发出《目

前边区战争形势与党的任务的指示》，列举了敌必败、我必胜的诸多主客观因素，号召全边区党员行动起来，完成“壮大主力兵团，发展民兵游击队，大量消灭敌人”，“发动群众镇压反动，巩固治安”，“改善战勤动员，加强后方工作，全力支援前线”，“突击春耕，加紧生产，厉行节约，恢复贸易，稳定金融，准备长期战争”，“加紧土地改革，消灭封建残余，进一步发动群众支援战争”和“整党整政，大量发展党员，转变工作作风”等六大任务。这六大任务的确定，为推动自卫战争走向胜利起了重大作用。关于“大量发展党员”这一条，马文瑞在戎马倥偬的前线，商请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同意，于5月21日以习、马两人的名义，专门给后方主持工作的副书记马明方发了一封电报，强调其迫切性和重要性。电报说：“边区农村党员，数年来很少发展，甚至未发展。以致党员多为年老的，后起的积极青年被拒在党门之外。支部工作显得很弱。为了完成党的对敌斗争任务，加强党在群众中的联系和领导作用，亟须发展一大批新党员，壮大党的基层组织。我们提议，在六、七、八、九的几个月中，与发展地方武装、扩大新兵、开展游击战争等联系起来，同时进行这一工作。发展数量大体等于原党员之一倍。而以各种对敌斗争中、游击战争中、扩兵中的积极青年为主要对象。动员所有支部的老党员和下乡工作的党员干部进行这一工作。你们认为如何？如同意，请专作一决定发下，并当作主要工作之一，多进行督促检查。”

主持西北局后委工作的马明方接到电报后，认为习仲勋、马文瑞提出的建议非常及时、重要。迅速在6月17日作出《西北局关于发展党员的决定》。《决定》在检讨“十年和平建设时期，党员发展几乎陷于停顿状态，地方党员仅占边区人口的3%，不仅数量少而且思想、政治水平偏低”的现状之后，指出边区在各个运动，特别是去年的土改和今年的自卫战争中涌现大批积极分子，使大量发展党员不仅必要而且完全可能。西北局决定在年内发展党员4.6万人左右，争取党员人

数占到全人口的5%至6%。《决定》要求发展党员必须在自卫战争、参军运动、战勤工作和土改中进行，必须坚持以贫雇农为主的阶级路线，特别注意吸收青年积极分子入党。《决定》强调，发展党员应严格按《党章》要求，保证质量，并坚持个别吸收，严禁“拉伕凑数”和“集体入党”。

在西北局《决定》的号召鼓舞下，一大批英勇参战、踊跃支前、努力生产的青年积极分子和先进人物加入了党的队伍，给党增添了生气和活力，有力地推动战争向胜利发展。

蟠龙大捷后，为了突破敌军的包围，习仲勋、马文瑞、张德生等又随彭德怀率部转战三边。接着掉头南下，穿过森林蔽日、人迹罕见的子午岭，进军陇东。马文瑞在陇东担任书记将近七年，对这里的一切十分熟悉。彭德怀很注意向他了解情况，征求意见。在行军途中和作战间隙，两人还多次就部队干部和地方干部的情况交换意见。在三边和陇东作战中，西北野战兵团先后收复了定边、安边、环县，歼灭青海马步芳、宁夏马鸿逵部二千四百余人。

为了在战略上钳制敌人，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组成的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不顾危险，坚持在陕北转战。在“最小的司令部”里，指挥着“最大的人民解放战争”。另由刘少奇、朱德等组成的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和叶剑英、杨尚昆等组成的中共中央后方工作委员会，分别到华北和晋西北开辟工作。

自1947年3月18日中共中央主动撤出延安，到6月底的三个半月里，西北野战兵团、地方部队和游击队共歼敌2.86万名，收复绥德、志丹等6座县城，击落敌机5架，缴获炮132门，机枪550挺，长短枪8000余支，电台15部，汽车14辆，骡马2900余匹。全国其他解放区共歼敌112万人，国民党军队从内战前的430万人锐减为373万人；人民解放军则由当时的110万人壮大为195万人。在这样有利的形势下，党中央和毛泽东考虑把“内线”作战引向“外线”作战，由防御转为进

攻，打到国民党统治区去。

7月21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靖边县小河村召开前委扩大会议，研究部署各解放区协同作战和新老解放区土改等问题。决定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陈(赓)谢(富治)三路大军相互配合，两翼牵制，夺取中原。关于土改，毛泽东说，为了支持长期战争，必须抓紧土地改革。不搞土改，就会失去农民的支持，失去农民的支持，就失去了战争的胜利。

会上，中央决定晋绥、陕甘宁合并，任命贺龙为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习仲勋为政委，负责陕甘宁和晋绥两个边区合并后的后方工作。7月31日，中央军委正式将西北野战兵团定名为西北野战军，彭德怀仍担任司令员兼政委。此时，西北局前方委员会已完成历史使命。中央为了加强党的地方工作，决定习仲勋、马文瑞等离开部队，回后方工作；西北局委员刘景范、张德生等仍继续随军担负部队后勤和政治工作重任。

马文瑞告别所在的二纵队司令员王震，离开部队，回到西北局驻地子洲县马蹄沟。月余后，又随西北局机关转移到绥德县义合一带。1947年8月12日，贺龙、习仲勋突然接到中央电报，紧急通报敌整编二十九军军长刘戡正指挥5个整编旅向义合、葭县方向推进。为避免损失，中央命令绥、葭一带的中共党政机关，立即东渡黄河，转移到晋绥解放区去。

原载马文瑞传编写组撰，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年7月出版的《马文瑞传》第十章第二节

校部转战陕北（1947.3—1948.1）（节选）

学校除改编为第四后方医院的师生外，其余师生仍然保持行知中

学建制，按照边区政府统一番号，编为第六大队，改名“工学团”（即一边工作、一边学习），跟随边区政府转战陕北。

1946年底，胡宗南进犯延安风声日紧，学校曾转移到延安东丰富川的窑子沟。解放军在山东打了大胜仗，过年时又搬回延安桥儿沟。

1947年3月15日，胡宗南飞机轰炸延安，16日学校又转移到窑子沟。18日当晚，学校在转移到距窑子沟15公里的寺儿沟（当时第四后方医院在吊儿沟）。19日，胡宗南占领延安，学校又从寺儿沟出发向东转移。24日接紧急命令，当晚撤离象家沟，天明到达李家岔，晚上住在石家坪。26日天麻麻亮离开石家坪，一路经子长倪家沟、十里铺、安定旧城，晚上住窑台村。28日由窑台出发，晚上住涧峪岔区的吴家湾。

4月1日，因时局有变化，学校由涧峪岔的吴家湾出发向西由原路返回，沿秀延河北岸经张家岔又回到安塞县化子坪，在这里又碰到第四后方医院。

4月8日，在化子坪对面沟里全体师生听了卢勤良院长作时事报告。由于敌机空袭，当晚转移到张家岔。4月14日又搬到张家坪村，在这里学校组织形式有所变更。学校按照边区政府统一番号编为第六大队，下设事务、宣教两股，分别负责运输供应，对外宣传，对内教育等事宜。另外，还成立了联络侦察小组。

4月18日得到消息，敌人离张家坪只有15多公里，部队命令当晚转移，途径张家岔、杨庄科、寇家嘤，于4月22日经子房坪到保安二区侯家河湾（今侯市）。侯家河湾位于志丹县杏河镇下川。此村有三大姓，素有“杨一山，牛一川，侯家住下一河湾”的说法。侯家河湾则由此得村名。在这里，学校一面组织师生学习，上课；一面开展宣传群众工作；同时也组织师生上山打柴，挖野菜，开荒种菜种粮食。宣教股六个人开了二亩多地，种上了谷子。在这里一直住到6月6日离开，计45天。

在这里听到蟠龙大捷的喜讯，以及真武洞召开万人祝捷大会，周恩来出席的消息。5月4日青年节，全校师生在山坡上举行了“五四”纪念大会，听马济川校长讲话。

蟠龙战役后，胡宗南改变战术，企图把我军赶过黄河。为迷惑敌人，上级指示部分机构过河。6月6日，学校由侯家河湾出发，绕道靖边、横山、子洲等县向东转移。为了摆脱敌人的袭击，领导上决定这次通夜行军，8日鸡未叫就动身，天下着大雨，大家顾不得雨水冲刷，道路泥泞，只顾默默赶路，到胶泥湾听说敌人离此地只有5公里多，情况突然紧张起来，大家都拼命赶路，中午到申家园则吃饭，结果传来消息说，敌人已经很近了，形势更紧张了起来，领导上急速组织大家转移，当时有的同学饭还未吃完，过河时许多同学不挽裤腿就跑了过去。这一天出现紧张情况三四次，翻了好几架山，跑了几十公里路，两腿跑得木棍似的，歇一阵，痛一阵。特别是国文教师李星华（李大钊女儿）经过这一次激烈行军，两腿肿的特别厉害，但她一声不吭，跟着大队继续前进。

9日，半夜就继续行军，中午到达畔沟休息、吃饭。原计划饭后从畔沟出发，到梁家坪住宿。结果刚出村就传来紧急情况，叫向后转，马上找路上山，说前面遇到了敌人，已听见枪声。霎时弄的相当混乱。尤其是学生没有经过战争，一听此消息，一下子涌上山去，牲口驮的东西未绑紧，脱掉了，也顾不得拾。这一天是最紧张的一天。

一连几天都是黑天半夜行军，先是翻山到大理河流域发源地，后又翻山到小理河发源地，顺着小理河向东走。小理河才涨过水，路上尽是泥，一不小心就掉进泥坑里。

13日下午，学校由赵寨子出发，经马蹄沟到薛家崖，在这里见到边区政府（这里有误，当时边区政府在马蹄沟—编者）。由于这里条件差，三天后学校又搬到霍家渠住下。至此，从侯家河出发，经过十多天的急行军，这段紧张的生活总算告一段落。

霍家渠是个比较偏僻的村子，属子洲县，是地主霍云瑞的庄院。这里有窑洞二十余孔，房子十余间。学校6月16日在这里住下，8月3日离开，在这里过了五十多天相对平静的日子。这期间，学校组织师生进行集中学习和整顿，同时动员年轻力壮的学生去参军。8月2日，马济川校长从教育厅开会回来说，教育厅决定：行中和子中合并；让地干班离校，跟随延属地委行进。

8月3日，学校撤离霍家渠，经米脂杜家石沟到米脂城出东门，经乌龙堡到佳县的高家畔。这时，陕甘宁边区教育厅在佳县木头峪召开几所学校负责人会议，决定将子长中学并入行知中学；米中、绥师、行中部分师生组成延大附中，并让延大；地干班分出单独行动，归延属分区直接领导。并决定师生中身体强的，思想好的，留陕北坚持斗争；身体弱、年龄小的过黄河。

原载陕西延安中学校志编纂委员会编，2008年8月内部印刷的《陕西延安中学校志》第127—128页

流动政府的廉政建设经受了战争的考验

全面内战爆发后，在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下，边区军民奋起自卫，经过8个多月歼敌71万余人，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全面进攻。就是在这样战火纷飞的环境中，边区政府始终没有放松自身的建设和对干部的教育。1946年10月30日至11月5日，陕甘宁边区第二次政府委员会决议指出：“为使各项工作迅速彻底执行，干部作风必须适应战争环境，厉行艰苦紧张的作风，反对疲沓拖延现象，干部要随时准备背着包袱到农村去，和群众一起工作，坚持游击战争，坚持农村工作，在任何情况下，使我们的政令在广大的农村畅行无阻。”边区政府特别强调“发扬民主精神，严格纠正官僚主义倾向，打破政府或干部和

群众间存在的一切隔阂。提倡钻研精神，及深入具体的领导作风，纠正‘风一阵雨一阵’的不经常不实际的冷热病。”认为作风的改变，对于战争的胜败是有决定作用的，实践也证明了这个看法是正确的。同时，边府又于同年12月28日发出了指示信，要求彻底克服干部和群众中的惊慌和苟安心理，并防止产生骄傲和侥幸胜利的情绪，纠正各级政府和各级干部中的命令主义与脱离群众，不从实际出发，一般化的领导作风，反对“战争来了不要民主，只是强迫命令”的错误思想。在战时应更加发扬民主，贯彻群众路线，随时改正工作中存在的缺点，加强工作效能，以争取自卫战争的胜利。正是这样严格要求，才赢得了战争的胜利。

全国各解放区在粉碎国民党反动派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后，国民党反动派被迫改变战略方针，由全面进攻改变为重点进攻，于1947年3月，集中兵力进攻山东和陕甘宁边区。在这样的形势下，整个边区被迫进入全面战争状态。中共中央决定，为了诱敌深入，暂时放弃延安，集中兵力，在运动中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在党中央撤离延安之前，边区政府于3月8日便成立了“边区战时后方办事处”，马锡五为主任，史唯然、习仲棋、高登榜为成员，并于当日转赴安塞县真武洞办公。战时后方办事处的总任务是统一指挥党政军机关向后方迁移中有关事宜，具体有三项：(1)统一党政军机关的迁移行动和划定后方驻地；(2)整纪除奸，凡迁移后方的各机关一切警卫及除奸等问题，由该办事处统一计划与领导；(3)计划、领导和检查各后方机关的生产和学习事宜。战时后方办事处成立后，各党政军机关（包括中央和中央军委）开始作撤离延安的准备工作。实际上，该办事处在战争开始时成为一个比较有权威的监督机构，对保证机关的转移起到安排，督促作用。

在各种准备工作就绪之后，1947年3月19日，陕甘宁边区政府随党中央撤离延安，转战陕北。党中央在撤离延安以后，作出决定：(1)必

须用坚决战斗精神保卫和发展陕甘宁边区和西北解放区；(2)党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必须继续留在陕甘宁边区；(3)为着工作便利，以刘少奇为书记，组织中央工作委员会，前往晋西北或其他适当地点进行中央委托之工作。因此，在撤离延安后，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以及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同志一直留在陕甘宁边区，转战陕北，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和直接领导西北的解放战争。从1947年3月19日撤离延安起，到1948年3月23日东渡黄河离开陕甘宁边区，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等同志在陕北转战了一年零三天，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先后出入12个县，宿营过37个村镇，行程2100里，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等同志留在陕北，极大地鼓舞了边区军民的战斗意志和增强了边区军民战胜敌人的信心。

3月19日，边区政府撤离延安后，迁到安塞县真武洞李家渠。不久，边区政府又撤离李家渠，从此进入了战时流动状态。

1．适应战争的需要，改造政府机构

撤离延安以后，边区政府为适应战争的需要，政府机关负责人进行了重新分工，副主席刘景范和秘书长兼民政厅厅长王子宜赴前线，刘景范任西北野战军后勤司令员，王子宜仍以边区总动员委员会的名义工作。边府主席林伯渠、财政厅代厅长范子文、民政厅副厅长唐洪澄到后方，组织党政军联合处，处理边府日常工作，并由林伯渠、王子宜、惠中权、周兴、曹力如、马锡五等7人组成后方委员会（后又改为西北局后委，人员也有所调整），统一领导后方事宜。后方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支援前线、自卫、整顿群众纪律，改善军民关系。

1947年4月间，边区政府由真武洞李家渠先后转移到白家坪、白庙岔。为了自卫的需要，根据西北野战军的命令，边区政府机关统一组编为第6大队，由范子文任队长，唐洪澄为政委。边区政府机关作了调整和精简，抽调了一批工作人员下乡，参加游击队。边府机关，包括秘书处和民政、财政、建设、教育各厅，由原来的255人（不包括

附属机构）减为70人。5月，边区政府转移至瓦窑堡、榆树峁、牡丹川等地。为了加强战时粮食工作的领导，边府于5月23日决定将原属于民政厅管辖的粮食局升格为边府的直属局，由薛兰斌、冯绍绪为正副局长。5月25日，边府又组织了战时农业生产委员会和合作指导委员会，分别由惠中权、白如冰负责，以加强战时农业生产和合作事业的领导。

边区政府于6月进驻子洲县马蹄沟以后，对政府机构本身作了重大调整，撤销了一些与战时关系不大的机构，如审计处、教材社、陈列馆、工程处、光华农场、中医训练班、医专、学生疗养院等，并紧缩了其他机构。如办公厅改为秘书处，机构由原办公厅的7科3室缩到两个科1个室；民政厅也由原来的3个科1室整编为两个科1个室。这次整编，机关工作人员由原编制的8784名，缩编为3746名，缩编57.4%。6月3日，边府撤销边区总动员委员会，战时动员工作归民政厅统一领导。同时加强兵站部的工作，由兵站部负责筹划转运工作。

边区政府机关于8月16日东渡黄河驻碛口附近的高家坪。为了解决边区的财政困难，商讨边区与晋绥解放区的财政统一问题，边府在这里进行了第二次整编，机关工作人员由3746人，精简为2848人，又缩减了24%，只有原编制8784人的32.4%。10月中旬，边区和晋绥解放区的部分领导人在兴县蔡家崖举行联席会议，集中讨论两个地区财政经济的统一问题。会议决定，首先将两区的贸易公司合并为西北贸易公司，两区的银行合并为西北农民银行，以便统一金融贸易组织，扩大对外贸易，加强经济战线上的对敌斗争，更有力地支持战争。同时指出："贯彻精简，整顿队伍，恢复生产，支援前线，是当前的主要任务"。

随着西北战场上战争形势的变化，边区被国民党侵占的地区逐步恢复。边区政府为了更好的领导边区各级政权的恢复和发展，于10月20日从晋绥解放区西渡黄河回到绥德，驻雷家沟。总之，政府

在流动的过程中做到了纪律严明、行动迅速、保守秘密，使党员和干部经历了残酷斗争的考验。战争本身要求他们必须时刻注意保持自身清正廉洁的作风。当时，不仅在组织上进行了整顿和缩编，而且在思想上更加坚定了信念，只有与人民同甘共苦，才能赢得战争的胜利。

原载李忠全、马广荣、马朝琦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6月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延安时期廉政建设史论》之第二章《延安时期党的廉政建设述论》

西北局 陕北解放区的中共组织及正规部队（节选）

一、西北局（节选）

全面抗战爆发后，陕甘宁特区党委报请中共中央批准，撤销陕北省委，分别成立陕北东分区和西分区党委。东分区党委（书记张达志）驻延长县城，辖固临、延川、延长、延水（1937年8月并入延川县）等4个县委、36个区委和绥德、清涧、吴堡、佳县、米脂等县秘密组织，党员约1.2万名。西分区党委（书记马文瑞）先后辖延安、富县、甘泉、子长、秀延、志丹、安塞、横山、新城、靖边等10个县委、41个区委，党员9118名。原归陕北省委管辖的神府特委，改由陕甘宁特区党委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后，1937年9月6日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经中共中央批准，陕甘宁特区党委也随之改称陕甘宁边区党委。同时，边区党委决定，撤销陕北东分区党委和西分区党委，其所属县委由边区党委直接管辖；撤销陕甘宁省委，成立庆环分区党委（书记马文瑞）。1937年10月，在庆环分区党委所辖的定边中心县委的基础上，成立三边特委（书记白如冰）；1937年9月，陕西省委所辖的关中特委改由边区党委领导。10月，改关中特委为关中分区党委。此

后，边区党委还在八路军驻防的绥德警备区和边区南部的洛川一带，分别成立秘密的绥德特委和洛川工委（不久改为特委）。1938年4月，党中央决定，高岗接替郭洪涛任陕甘宁边区党委书记。同年冬，边区党委辖关中、神府、三边、绥德、洛川、庆环、陇东等7个分（特）委，以及清涧、安塞、子长等十余个县委，党员3.8万余人。

1939年11月，边区召开第二次党代会，176人出席。毛泽东作了政治报告，指出边区党的各级组织要“提高自己，帮助别人”，再次号召要把边区建设成为全国的抗日民主模范区。高岗、陈云分别作了《关于抗战新阶段中陕甘宁边区的任务》的报告、《关于干部队伍建设的几个问题》的报告。大会号召各级党组织进行一次深入而普遍的学习动员，并通过八项决议，强调全力提高党员尤其是干部的马列主义水平，是巩固党组织和提高其战斗力的关键。大会重新选举产生了边区党委，高岗为书记，王观澜为副书记。这次大会对加强党的建设，推动各项工作的发展，把边区建设成抗日民主的模范区具有重要意义。

中共陕甘宁边区第二次代表大会后，边区党组织由以发展党员为主逐步转入以巩固为主的阶段。1940年10月，根据党中央9月11日的决定，在边区党委的基础上，成立陕甘宁边区中央局，书记高岗，副书记谢觉哉。鉴于西北国统区的政治形势不断恶化，西北工委领导的陕甘宁三省的秘密机关陆续迁入陕甘宁边区。1941年5月，党中央决定西北工委与边区中央局合并，成立西北中央局，高岗、王世泰、张邦英、林伯渠、谢觉哉、陈正人、萧劲光为委员，贾拓夫、李卓然为候补委员，高岗为书记，谢觉哉为副书记，统管西北地区的工作。1943年1月，党中央批准高岗、林伯渠、贺龙、陈正人、贾拓夫为西北中央局常委。1944年3月，中央政治局决定陈云任西北中央局委员。1945年10月以后，高岗调东北工作，习仲勋任西北中央局书记。

西北中央局成立后，撤销庆环分委，成立陇东分区特委。1941年

11月，洛川特委并入富县县委。1942年底，西北中央局决定将陕西省委与关中分委合并，成立关中地委，隶属西北局，统一领导关中分区和陕西国统区的党组织。这一时期，西北中央局对边区党组织的机构和职能进行了调整：陇东、三边分委分别改为陇东、三边地委，成立延属地委；各地委书记都兼任警备司令部或军分区的政委。

截至1941年春，边区各县都成立了党委，基层党组织遍布乡镇、机关、企业和事业单位。直属县（市）委包括延安、延长、延川、固临、甘泉、富县、安塞、保安、安定、靖边、延安。关中分委辖赤水、淳耀、新正、新宁等县委。三边分委辖定边、盐池等县委。绥德区委辖绥德、米脂、吴堡、佳县、清涧等县委。另有神府分委、洛川特委、伊盟工委，201个区委，1326个支部（不包括军队）。当时，党员总数为5.4万余人。1942年高干会后，西北局下属关中、绥德、三边、延属、陇东等五个地委。

解放战争时期，高岗、习仲勋、贺龙、彭德怀等先后担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的主要领导职务。中共中央西北局工作机构开始设有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社会部、职工运动委员会(后改为职工工作委员会)、青年运动委员会(后改为青年工作委员会)、妇女运动委员会(后改为妇女工作委员会)。后随着斗争形势的发展和实际工作的需要，增设了城工部、党务委员会、监察委员会、边区民众工作委员会、前敌委员会、后方工作委员会、敌军工作委员会、西北财经委员会等工作部门，此外还设有西北党校、《边区群众报》(1948年1月10日，改名为《群众日报》)。

1947年3月，蒋介石纠集胡宗南、马步芳、马鸿逵集团共25万兵力，向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发动重点进攻。中共中央机关撤离延安。中共中央西北局机关先后迁至安塞县白庙岔、子洲县马蹄沟、山西临县及绥德义合等地。1948年4月21日延安光复后，回驻延安，西安解放后，进驻西安。

中共中央西北局下辖组织随形势发展和需要不断加强。先后组建和领导了陕西省工委、西安市委、宁夏省委、甘肃省委、青海省委、新疆分局、晋绥分局、陕北区党委、陕南区党委、伊蒙工委、晋西工委、晋南工委等党组织；并直辖陕甘宁解放区陕西境内的绥德地委、三边地委、关中地委、榆横特委、榆林地委、洛川工委、黄龙特委、黄龙地委、西府地委、宝鸡地委、彬县地委、东府工委、大荔地委、渭南地委、三原地委、咸阳地委等党的组织。

二、西北局下辖地委组织（部分）

1.中共延属地方委员会

在解放战争期间，延属地委归中央西北局领导，地委机关驻延安城，地委下辖延安、子长、延川、延长、志丹、安塞、甘泉、富县、固临九个县委和延安市委。1947年3月，胡宗南部队侵占延安，延属地委机关活动于安塞、子长、延川等地。为适应战争环境，便利指导各县配合西北野战军主力作战，延属地委决定在延属分区东、西部分设东地、西地两个工委。东地工委驻延长，白清江任书记，下辖延川、延长、固临、南泥湾垦区等四个县(区)委。西地工委驻富县，张育民任书记，辖志丹、富县、甘泉等三个县委。1948年4月21日，延安收复，东、西地工委先后撤销，延属地委机关迁回延安，驻新市场沟。1948年7月，固临县委和南泥湾垦区区委合并，成立临镇县委，1949年1月撤销。1949年3月，撤销延安市建制，并入延安县，将富县划归黄龙地委管辖。1949年5月，中共陕北区委成立，延属地委随之撤销，其所辖延安、甘泉、志丹、安塞、子长、延川、延长等七个县委归陕北区党委直属。

中共延属地委书记先后为李景膺、白清江。

同时设有同级的政权组织延属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先后辖九县一市，后撤并为延安、延长、延川、子长、安塞、志丹、甘泉等七个县政府。专员先后为曹力如、李景林。

2.中共绥德地方委员会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绥德地委仍负责领导绥德警备区党的工作。地委归中央西北局领导，下辖绥德、米脂、佳县、吴堡、清涧、子洲等六个县委。地委机关先设在绥德县城九贞观内。1947年3月，迁到韭园沟一带。

1947年8月和11月西北野战军发动了两次榆林战役之后，驻榆林的国民党二十二军困守孤城。12月，为了加强对该军的统战工作，促使其接受改编，和平解放榆林，中央西北局决定在榆林的镇川建立中共榆林工作委员会，受中央西北局和绥德地委双重领导。

1947年底，中共榆横特委撤销，其所辖的镇川和横山两县委划归绥德地委管辖。此时，绥德地委下辖绥德、米脂、佳县、吴堡、清涧、子洲、镇川、横山八个县委和榆林工委。

1949年3月，镇川、横山两县划归榆林地委管辖。5月，陕北区党委成立，绥德地委隶属陕北区党委领导，下辖绥德、米脂、佳县、吴堡、清涧、子洲六个县委。机关驻绥德城内九贞观。

中共绥德地委书记先后为李井泉(代理)、白治民、张邦英(代理)、杨和亭、杨彩霦。

同时建有绥德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先后为杨和亭、霍祝山。先后下辖绥德、米脂、佳县、吴堡、清涧、子洲及横山、镇川两县政府。

3.中共三边地方委员会

全国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三边地委归中共中央西北局直属，地委机关驻定边城内。地委开始辖定边、靖边、吴旗三个县委和宁夏的盐池县委。1945年10月25日，经三边地委做工作，当地国民党驻军十一旅起义，解放了安边城。12月，成立了安边县委。1946年5月20日，为加强宁夏工作，西北局常委会决定成立宁夏工作委员会，高峰兼工委书记，孙殿才任副书记，安边县委和宁夏工委均归三边地委管辖。

1947年3月，蒋介石命令马鸿逵配合胡宗南部队进犯陕甘宁边区。马鸿逵部队乘三边西线、北线空虚，接连侵占盐池、定边、安边等县。6月，彭德怀司令员率西北野战军于陇东战役之后转战三边，至7月7日，安边、定边、盐池相继收复。8月13日，西北野战军东进，定边二次失守。此时，三边地委撤至吴旗，继续领导三边人民进行游击战争。1949年8月，定边县光复。三边地委迁回县城原址。1949年5月陕北区党委成立后，三边地委归陕北区党委领导。下辖盐池、定边、靖边、安边、吴旗五个县委。机关驻吴旗镇。1949年9月27日，三边地委撤销，所辖的盐池县划归宁夏管辖，安边、吴旗县制撤销，定边、靖边两个县划归陕北区党委直辖。

中共三边地委书记先后为高峰、郭炳坤、朱敏。

同时设有三边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先后为吴志渊、陈思恭。先后下辖定边、盐池、靖边、吴旗、安边五个县政府。

4.中共关中地方委员会

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关中地委领导陕甘宁解放区关中分区及陕西省国统区党的组织，它隶属中央西北局领导，机关驻新正县马栏镇。1945年9月27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决定调高锦纯为关中地委书记，汪锋为副书记。当时关中地委以边区工作为主，下辖陕甘宁解放区关中分区的新正、新宁、赤水、淳耀四个县委和双龙镇中心区委。地委所管辖的国民党统治区党组织还没有从隐蔽状态下恢复、发展起来。

1946年初，为了进一步恢复和加强陕西国民党统治区党的组织，中共中央西北局决定抽调原在陕西省委工作过的关中地委领导干部汪锋、赵伯平等，成立中共陕西省工作委员会，专做国民党统治区党的工作。

1947年春，国民党军队对陕甘宁边区发动重点进攻，2月19日，关中地委和陕西省工委机关所在地马栏失守。为了统一领导关中的军事力量，以适应关中游击战争和国统区党的工作的开展，中央西北局于3

月7日决定，将关中地委与陕西省工委合并；关中地委设国统区工作委员会，专做国统区工作。合并后的关中地委先后驻高尧子、金盆、庙湾和宁县五亭子等地，1947年8月24日，关中分区重镇马栏收复，地委机关又迁回马栏。合并后的关中地委除辖新正、新宁、赤水、淳耀、双龙镇中心区等县(区)委外，还领导国统区原陕西省工委所辖的党组织。1949年4月4日，中共关中地委改为中共三原地委。

中共关中地委书记先后为张德生、高锦纯、赵伯平、杨伯伦(代理)。

同时关中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先后为张仲良、张鹏图、杨玉亭。先后下辖新正、新宁、赤水、淳耀、旬邑、淳化、中宜、三原、彬县、白水、耀县等县政府和双龙镇中心区。

三、正规部队

在陕西战场，国民党胡宗南部、青海马步芳部、宁夏马鸿逵部是国民党的主要军事力量。在军队的数量和装备上都占有绝对的优势。相反，初期陕甘宁解放区只有两万余人的野战部队。国共两党的军队在陕西战场上进行了激烈的较量，有的地方几经易手，但人民军队最终赢得了胜利。

1.陕甘宁解放区陕西地区的军事组织

1）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西北军区

抗日战争胜利后，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形成两个前线，分为两个战略区。晋绥前线称晋绥军区，下辖晋绥军区和晋绥野战军所属部队，归中共中央军委、中共中央西北局直接指挥和领导；陕甘宁前线仍沿用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的番号。联防军司令部驻延安市。在贺龙司令员赴晋绥前线指挥作战后，由王世泰代理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高岗代理政委(关向应因病不能坚持工作)。高岗、谭政、徐向前先后调东北和晋冀鲁豫军区工作后，中共中央军委即任命王世泰为司令员，习仲勋为政委。下辖教导第一旅、教导第二旅、新编第四旅、警备第一

旅兼关中军分区、警备第三旅兼三边军分区、第三八五旅兼陇东军分区、延属军分区、绥德军分区。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总兵力3.2万余人，担负保卫陕甘宁边区的任务。1946年3月至4月间，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根据中共中央军委指示精神，进行精简和整编，先后裁减了10个团、12个营、67个连，复员2700人。调整部队序列，合并领导机构，将教导第一旅旅部与教导第二旅旅部合并，改称教导旅；将三八五旅并入警备第三旅。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整编后为五个旅：警备第一旅、警备第三旅、新编第四旅、新编第十一旅、教导旅。这次调整缩编后，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共有2.8万余人。当时，国民党军不断对边区进行侵扰。陕甘宁晋绥联防军部队在陕甘宁边区人民和地方武装的配合下，从1945年9月至1946年6月，共粉碎国民党军队向陕甘宁边区200余次的袭扰和进攻。1947年7月，中共中央军委决定将晋绥军区再度划归陕甘宁晋绥联防军(1948年3月，改称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建制，仍由贺龙任司令员，习仲勋兼任政委。下辖晋绥军区及直属关中军分区(警备第一旅兼)、绥德军分区、延属军分区、三边军分区(新编第十一旅兼)、陇东军分区、警备第三旅和骑兵第六师。1949年2月，中共中央军委决定将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改称为西北军区，贺龙任司令员，习仲勋任政委。先后下辖晋绥军区、晋南军区和西北军区军事政治大学以及延属、绥德、三边、榆林、陇东、关中、黄龙、西府、彬县、宝鸡、三原、咸阳、大荔、渭南等14个直属军分区。1949年4月，晋绥军区所属的绥蒙军区划归华北军区建制。5月，晋南军区并入晋绥军区，另成立晋西北军区、陕北军区。陕北军区下辖榆林、黄龙、三边三个军分区和延安等七个县武装部或大队，司令员先后为张达志(未到职)、吴岱峰、牛书申(代理)，政委李合邦。西安解放后，西北军区司令部由延安迁到西安。7月，将警备第二旅改编为西北军区独立第一师。8月，西北军区司令部迁至甘肃省兰州市。根据中共中央军委指示将起义的国民党二十二军第八十六师改编为西北军区独立第二师。晋绥军区所辖

军区及军分区划归华北军区建制。

2）陕甘宁野战集团军、西北野战兵团、西北人民解放军野战军、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

1947年2月，为了统一指挥和提高作战能力，中共中央军委决定：以进驻陕甘宁边区的晋绥军区第一纵队及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所辖新编第四旅、教导旅、警备第一旅、警备第三旅等部，组成陕甘宁野战集团军，任命张宗逊为司令员，习仲勋为政委。集团军司令部机关驻延安市。全军共6个旅，2.8万余人。集团军建立时，中共中央军委确定的基本作战方针是：诱敌深入，与敌在延安东北的山区周旋，使敌陷入疲惫、缺粮之困境，然后抓住有利时机，集中兵力在运动中逐批加以歼灭，以粉碎敌人的进攻。同时决定调晋绥军区第二纵队西渡黄河加入陕甘宁野战集团军序列。1947年3月13日，集中在西北的国民党军队34个旅23万余人，分由南、西、北三面向陕甘宁解放区发动进攻。3月16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所有陕甘宁解放区的野战部队和地方武装，统归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彭德怀和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兼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委习仲勋指挥，成立西北野战兵团，撤销陕甘宁野战集团军番号。在中共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彭德怀直接指挥下，西北野战兵团从3月25日至5月4日，在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三战三捷，歼敌1.4万余人，给胡宗南集团以沉重打击，稳定了陕北的战局。1947年7月31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西北野战兵团正式定名为西北人民解放军野战军(简称西北野战军)，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张宗逊任副司令员(翌年2月，中共中央军委任命赵寿山为西北野战军第二副司令员)，习仲勋任副政委。在此之前，即7月23日，经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同意，成立了中共西北野战军前线委员会，书记彭德怀。西北野战军下辖：第一纵队、第二纵队、第三纵队(原晋绥军区第三纵队，8月调归西北野战军建制)及教导旅、新编第四旅和骑兵第六师，全军约5万人。西北野战军于8月6日至9月16日进行了榆林战役、沙家

店战役、关庄、岔道口战役，共歼敌3.1万余人，由防御转入进攻。趁此时机，西北野战军在所属各部队中进行了以“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为主要内容的新式整军运动和群众练兵运动，为转入战略反攻进行充分的思想准备与战术技术准备。1948年2月，西北野战军转入外线作战，先后取得宜川、瓦子街战役和西府、陇东等战役的重大胜利，创造以相等兵力进行歼灭战并一次歼敌五个旅的范例。

原载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陕西省人民出版社2002年11月出版的《陕西省志·中国共产党志》（上）第一编第三篇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共组织及其活动之第四章陕甘宁边区的新民主主义建设第一节党的建设；第四编解放战争时期的中共组织及其活动之第一章中共组织与进步团体第一节中共中央西北局和陕北解放区的中共组织；第三章军事组织的第一节正规部队。

陕甘宁边区

（1937年9月—1950年1月）

陕甘宁边区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特定的区域设置的一个行政建置。它既不是国家的边境地区，也不是按照山川形势规划的行政区域，而是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陕甘宁地区的劳苦大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土地革命，实行革命的武装割据所形成的。

陕甘宁边区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两个历史时期，各个时期的性质、辖区、建置和区划都不相同。

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合作，国民政府承认它是一个特殊的地方行政建置，直属于行政院。边区政府相当于省级建制，辖区跨有陕西、甘肃、宁夏三省，东起黄河，北越长城，西到宁夏东部，南达渭北台

原，纵横均及千里。面积12万平方公里，人口约160万。边区内部有一套完善的政权组织和民主的行政制度，实行边区、县（市）、区、乡4级行政制度；在县之上设有分区专员公署，代表边区政府督察指挥各县行政。边区各级政府由人民或人民代表选举产生，政府人员结构实行“三三制”，即共产党员、党外进步分子和中间分子（开明绅士）各占三分之一。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国共合作破裂，陕甘宁边区政府脱离国民政府。随着解放战争的发展，边区不断扩大，到1949年，边区政府实际上已成为陕甘宁青新五省及山西省西半部、绥远省西南部的行政机关，起着西北行政区政府的作用。1950年1月19日，西北军政委员会成立，陕甘宁边区政府完成历史使命，宣告结束。

（1937年9月—1945年8月）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陕甘地区的劳苦大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举行了清涧、渭华、栒邑和耀县等数次武装起义，组织工农红军，进行游击战争，开展土地革命，先后创建了陕甘边和陕北两块革命根据地。1933年4月5日，中共陕甘边特委在照金薛家寨成立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临时政权），10月照金根据地失陷。

1934年2月25日，在南梁革命根据地的四合台（今属华池县南梁镇）召开群众大会，重新成立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11月7日又在荔园堡（今名南梁镇）召开军民大会，正式成立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政府机关驻寨子湾。1935年4月下旬，陕甘边苏维埃政府迁驻安塞县阎家沟（今属甘泉县桥镇乡），9月迁驻义子沟（今属甘泉县下寺湾乡），辖有华池、庆北、赤安、定边、安边、靖边、安塞、肤施、红泉、宜川、鄜县、中宜、永红、新正、宁县、赤水、淳耀等17县。

1935年1月29日，中共陕北特委在白庙岔（今属安塞县坪桥乡）召开陕北革命根据地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成立陕北省苏维埃政府。政府机关驻周家峪（今属子长县李家岔乡），7月3日迁驻永坪镇（今属

延川县），10月5日迁驻瓦窑堡（今属子长县），辖瓦窑堡市及赤源、子长、秀延、延川、延水、延长、延安、绥德、米西、靖边、葭县、吴堡、清涧等13县。

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工农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到达陕北，为了统一和加强西北各省苏维埃运动的领导，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瓦窑堡设立了驻西北办事处（以下简称西北办事处，1936年7月迁驻志丹县），将陕甘边和陕北两个苏区划分为陕甘、陕北两个省和关中、神府、三边三个特区（由于形势变化，三边特区苏维埃政府未成立）。陕甘省苏维埃政府驻下寺湾，辖甘洛、赤安、安塞、华池、庆北、定边、安边、红泉、宜川、肤施、鄜县、中宜12县。1936年5月，为配合红军西征，开辟陕甘宁三省交界新苏区，西北办事处决定将陕甘省改设为陕甘宁省，省苏维埃政府初驻赤安县刘渠子（今属吴旗县洛源乡），7月迁驻环县河连湾，12月又迁驻曲子镇（今属甘肃省环县）。1937年春，辖曲子、环县、定环、定边、安边、盐池、赤安、赤庆、华池、固北、合水、预海12县。陕北省苏维埃政府初驻瓦窑堡，1936年7月迁驻子长县谭家营（今属安塞县），1937年1月又迁驻蟠龙镇（今属延安市），辖蟠龙直属区及安定、秀延、子长、安塞、志丹、横山、靖边、新城、延川、延水、延长、延安、清涧、绥德、吴堡、甘洛、红泉、宜川、肤施、鄜县、中宜21县。关中特区苏维埃政府驻新正县马家堡（今属旬邑县职田镇），辖新正、宁县、永红、赤水、淳耀5县；神府特区苏维埃政府初驻神木县杨家沟（今属贺家川镇），1937年1月迁驻温家川（亦属贺家川镇），辖神木、府谷、葭芦、葭北、榆林、赤绥6县及神城区。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和帮助下，蒋介石接受了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条件，事变和平解决，国共第二次合作，全国出现了一个抗日新高潮。1937年2月，为了进一步团结全国各族各阶层人民共同抗日，促成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

战线的建立，中共中央正式宣布取消两个政权的对峙局面，并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国民党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改善人民生活；迅速完成抗日准备，共同抗日救国的五项要求和共产党保证在全国范围内停止使用武力推翻国民政府的政策；将工农民主共和国政府改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将工农红军改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和军事委员会指导；将苏维埃民主制改为抗日民主制，实行普选的民主政治，在特区内停止没收地主的土地等四项保证。3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驻西北办事处正式宣布改苏维埃民主制为抗日民主制，并改名陕甘宁特区政府，5月又改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公布了《陕甘宁边区议会及行政组织纲要》和《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7月15日，以周恩来、博古、林伯渠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和以蒋介白、张冲、邵力子为代表的国民党代表团在庐山举行会议，会上国民党承认陕甘宁边区。是月，边区内普遍开展了民主选举，建立各县区抗日民主政府。9月6日，陕甘宁边区政府正式成立。10月12日，国民政府行政院第333次行政会通过决议，确认陕甘宁边区为行政院直属行政区。

为了行政方便，陕甘宁边区政府先后将陕甘宁、陕北两省及神府、关中两特区撤销，设立庆环、三边、关中3个分区，分区专署辖9县，边区政府直辖1市11县，共21县市。1945年，边区政府共辖5个分区，31县（市、区）。

（1945年9月—1950年1月）

1945年9月6日，日本宣布投降，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但是，国民党反动派又发动内战，调集80万军队进攻解放区，于是陕甘宁边区政府脱离国民政府，各县抗日民主政府均改名县政府。1947年2月中旬，蒋介石从陕南、豫西、山西等地调集胡宗南等部7个旅13个团进攻陕甘宁边区；3月18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总部及陕甘宁边区等党政机关撤离延安，转战陕北；8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1948年4

月22日收复延安，陕甘宁边区政府又迁回延安城。

1946年到1949年，榆横、神府及关中地区相继解放。1949年2月下旬增设黄龙分区，3月增设榆林、大荔2分区，将晋绥边区行政公署撤销，另设晋南和晋西北（后并入晋南行政区）2个行政公署，来隶陕甘宁边区政府；4月增设西府分区（后改名邠县分区）；5月又增设渭南、咸阳、宝鸡3分区及西安市，并撤销延属分区，设立陕北行政公署；6月14日边区政府迁驻西安新城；7月增领伊盟自治区；8月增领甘肃行政区；9月增领宁夏、新疆、青海3省；10月中原临时人民政府所辖之陕南行政区来属。1950年1月1日晋南行政区往属山西省，伊盟自治区往属绥远省；1月8日甘肃行政区改为甘肃省，成立省政府；1月10日成立陕西省人民政府；1月19日西北军政委员会成立，陕甘宁边区政府完成使命，宣告结束。

1949年12月，陕甘宁边区辖地约为今陕、甘、宁、青、新5省区全部，山西省西半部，湖北省郧阳地区，内蒙古自治区河套及套西地区。边区政府驻西安市，辖1个直辖市，6个直属分区，4个行政区，1个自治区及3个省；共有1个省级市，4个省会市，24个分区，355个县（包括县级市、镇、旗、设治局）。治所在今陕西省境内的有西安市，陕北、陕南2行政区及6个直属分区。

原载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三秦出版社1992年10月出版的《陕西省志·行政建制志》第四章历代行政区划之第十八节陕甘宁边区（节选）

马蹄沟

马蹄沟镇位于子洲县中部，距县城 13 公里，东连双湖峪镇，南接苗家坪镇、驼巷乡、砖庙镇，西靠周硷镇、电市镇，北依瓜则湾乡、

三川口镇。

据资料记载，马蹄沟境内在新石器时期就有人居住。西汉年起，人口开始增多，由于各民族杂居不分，宋以前归属多变。元起，本境属米脂管辖。明嘉靖年起，本境成军屯之地，外来人口迁来不少。清朝末年，绥德设三川军户，本境属其中的西川管理。民国初年，废州设县，沿用清制，本境分由米脂、绥德、横山三县管理。当时除马蹄沟、水浇湾由绥、米两县共管外，属横山的有清水沟、张家砭、吴家湾、巡检司，属米脂的有党家峁、杜家河、梁家沟、吉利坪、赵家坪、后曹峁、前曹峁、芦草峁、瓦窑峁、高家沟、老庄沟、王家砭、姜家沟、石湖峪、姜家崖，其余的满堂沟、徐家沟、碾盘沟、四旗里、五旋沟、三皇峁、柴家圪崂、庙沟、吴家沟、阎家沟、袁家砭、李家坬、薛家崖、栗家沟、李家砭、三眼泉、楼砭、王家坪、冯甫渠、丰富庄、高家园则、刘家坪、上姜家沟、小沟则、光裕沟、叶家圪崂、段家湾、郭家坟、阳坬属绥德管辖。1928 年，国民政府废里川制，本境属绥德县西区的三皇峁区和周家硷区。1935 年至 1936 年，本境部分属秀延县和米西苏维埃政权，其余属周家硷联保、三皇峁联保、姜家崖联保和驼耳巷联保。1938 年，本境大部分属三皇峁联保。1940 年，本境全部解放，行政区划延用保甲制，大部分属周家硷联保。1941 年，绥米清办事处成立，本境划入属之。1942 年，改联保为区，陕甘宁边区政府设立了马蹄沟区公所。先属西川办事处，后改属绥西办事处。1944 年，子洲县人民政府成立后归子洲。1950 年改称子洲县第六区公所。1952 年 10 月调整为子洲县第七区公所。1956 年 2 月称马蹄沟区公所，1958 年 8 月称乡人民委员会，1958 年 9 月改作跃进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1958 年年底并入绥德大县成马蹄沟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1961 年大县撤销后仍属子洲。1968 年改称公社革命委员会，1980 年恢复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1984 年称为马蹄沟镇至今，2002 年原三眼泉乡全部并入，使马蹄沟镇成为计辖 53 个村民委员会、2 个居民委员会、3 个盐业大队，有

学校31所，地段医院1所，还有供销社、邮电所、工商管理所、税务所、农行营业所、信用社、法庭、派出所、电影放映站、县种猪厂、子洲渠管理处、粮站等单位，总面积144平方公里，总人口34563人（2003年统计数字）的子洲县人口最多的乡镇。

人民政府1942年初在马蹄沟街上张荣升院内建立后，先后曾在水浇湾村中栾家大院、马蹄沟娘娘庙旁张家大院、水浇湾前村王家大院、马蹄沟娘娘庙里办公。1971年在集镇街道东头，307国道南修了新的驻地，1996年又修了西边新院。2003年镇政府办公大楼改造之后，各方面条件有了很大改善，院内楼舍整洁，花艳草绿，松青柏翠，杨柳成荫，环境优雅。

马蹄沟镇位于东经109°46′42″～109°59′38″，北纬37°31′26″～37°40′15″之间，地形西高东低，分黄土梁峁丘陵区和黄土川道区两大地貌。丘陵区沟壑横纵、支离破碎、梁峁起伏、山头圆立，最高点在大阎山顶峰，海拔1218.8米。川道区土地平坦，川面较宽，土壤肥沃，海拔较低，最低点在李家砭村，海拔917.97米。无定河最大支流大理河从镇中缓缓东流，流程约20公里；小理河在本境巡检司村汇入大理河，合二为一；国道307线从境内东西穿越，交通便利；十里盐湾盛产小盐、卤冰，宋朝有名；其他矿藏还有煤、石英石、料姜石、天然气、磷矿等。自古就一直流传有“绥德州出斗金，马蹄沟捞八升”之说。就连代代相传的信天游，也一直唱道：

绥德州，三道川，

西川就数马蹄沟宽。

马蹄沟，米粮川，

上下十里刮金板。

这就是马蹄沟，一个宋时修台筑城；明末举寨起义；毛泽东路过居住；张闻天率团调研；“鲁艺工作团”集体采风；边区政府临时驻扎的地方。

原载2006年《子洲县文史资料》第七辑由栾世宏编著的《马蹄沟史话》一书中“概述”，录入时有所增减。

拜　庙

子洲县马蹄沟镇水浇湾前村的山峁上，有一座龙王庙。传说，是为感恩玉皇大帝的外甥——西耶黑龙常给本地三分私雨而修建。虽然规模不大，但香火旺盛，每年农历三月十八、七月十五庙会期间，四方香客纷纷前往，一时间好不热闹。

丁亥年五月，我因事前往游览，当绕过百年老槐，攀上弯转石级，顺着土坡来到宽敞的庙院后，只见巨大的龙王像前，香烟缭绕，一位满头银发的老者，正跪在那儿不知念叨着什么，看穿着打扮不像本地人，正要上前，突见他往功德箱里投了一张百元钞票，虔诚地磕过头后站了起来，又注目不动。我忍不住走去相问：“老人家，陕北人有崇尚神灵的习俗，您不像本地人，也相信龙王能显灵降雨？”老人笑着说：“我也是陕北人，但我不是拜神，而是拜庙。”

“拜庙？”我不解地问了一句，老人便对我讲了起来：“那还要从我少年时说起。1947年夏天，中共中央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政府从安塞白庙岔来到了马蹄沟，边区政府住张圪崂，西北局就住在这沟对面不远的王家大院。每逢有什么要事，林伯渠主席和习仲勋书记便来到这庙中，在不算大的正殿中进行商讨。我那时才刚刚加入民兵不久，每次为首长在这山峁上站岗放哨，庙里的住持大叔，也就自觉地走出庙院，同我们一起观察四方。那时，咱们边区虽然经过大生产运动，经济情况较前好转，但国共两党的拉锯战还在进行，饥饿有时还是难免的。每次庙里的住持大叔来陪我们时，总要拿点庙上善男信女们供奉的果品让我们解馋。近两个月时间啊，不知有多少次都是

这样度过。后来，我随陕甘宁边区政府转移，沙家店战役之后，我成了边区警备第二旅的一员，全国解放之后，就在新疆安家落户。几十年过去了，可我怎么也忘不了这龙王庙，怎么也忘不了那战火纷飞的年代。这次有幸回来，我怎能不拜拜庙，思念已经逝去的首长、战友呢？”

听着老人回味无穷的过去，望着老人严肃的神情，我不禁为刚才冒失的问话感到后悔。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有多少中华儿女为了民族的利益，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老人的追忆，不正是告诉我们不能忘记艰难的过去？庙，不就是人吗。　　（作者　栾世宏）

原载2007年7月13日《榆林日报》第六版

马蹄沟行

马蹄沟，子洲县第一大镇，毛泽东“宁丢延安，不丢盐湾”所指的地方。1947年，这里曾经是陕甘宁边区政府、中共中央西北局、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西北野战兵团的临时驻地。建国六十周年前夕，笔者又一次马蹄沟行。

之一

这是张姓地主的一组院落，坐落在一山沟的中部。上院十二孔窑洞，呈不对称三角，与大多传统院落不同的是，东北面正中的窑洞，门洞大开，成通往垴畔的入口，是转移逃生的通道。下院十孔窑洞，正面六孔，侧面两层四孔，顶部刚好与上院的院子相平，也就使得上院更加宽敞。院子里，高大的槐树遮挡着远来的阳光，前院碾子后院磨的格局依然没有打破。窑洞里没有华丽的打扮，没有舒适的装饰，一盘土坑，两扇窑门，老式门箱，低矮炕桌，不知已经多少年了，主人依然还是这么的生活。公元1947年6月11日，陕甘宁边区政府从白庙

岔来到了这里，林伯渠主席、李鼎铭副主席率领边区政府在张圪崂村的这个地方生活工作了50天。

在这里，边区政府举行了政务会议，决定撤销一批与战争关系不大的组织机构，紧缩各厅局办事人员。撤销总动员委员会，将战时动员工作划归民政厅统一管理。大力加强兵站部工作，由其统筹安排和实施战时转运供给。待6月底整编工作结束后，边区政府后方党政机关总人数为3746人，较1946年减少5038人。

在这里，林伯渠主席和夫人朱明，于7月9日亲切接见了出席子洲县教师会议的全体人员，勉励全体老师要教好孩子，不要被眼前的困难所吓倒，要支持正义，要相信胜利和光明就在眼前。

在这里，林伯渠主席领导边区政府创办了《边区政报》，在7月15日的创刊号上，林伯渠主席发表了感人至深的“发刊词”。

在这里，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以“为支援前线立功”为题，在6月下旬为《边区群众报》撰文，《人民日报》于27日全文刊登。

之二

山坡上有一处石窑组成的院落，山坡下是一块宽阔平展的川地，山坡上的院落穿过后门是四孔古老的土窑，山坡下的平川跨过小溪有一棵高大的老槐，山坡上的窑洞是王姓人在民国初修建，山坡下的老槐是张姓人在清朝末栽，山坡上的窑洞现在已经破烂不堪，山坡下的老槐却生长的更加枝繁叶茂。山坡上的院落留下了当年的辉煌，山坡下的老槐见证了逝去的历史。

1947年，陕甘宁边区政府来到马蹄沟之后，中共中央西北局也来到了水浇湾村的这个院落，在这里生活工作了一个多月。习仲勋书记，马明芳副书记和西北局后委党组成员林伯渠、贾拓夫、王维舟、马锡五、常黎夫、惠中权、王子宜、周兴、范子文、江隆基、唐洪澄等都在此留下了自己的足迹。

1947年7月1日，就在山坡下的这棵大槐树前，中共中央西北局召

开了陕甘宁边区一级党员和群众大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26周年。当时在马蹄沟的中共中央西北局、陕甘宁边区政府、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的所有领导参加了大会。大会由中共中央西北局副书记马明芳主持，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首先讲话。林伯渠主席向大家讲述了中央苏区五次反“围剿”和长征的情况，说：“现在我们的条件比起那时是好多了，陕北地形对我军作战有利，群众支持我们，其他解放区战场捷报频传，对西北战场也是个有力的支援。”“更有利的条件，就是我们在党中央毛主席的直接领导下，牵着敌人的鼻子转。最近，我军又甩开敌人主力，突袭陇东，挥师三边，搞得敌人晕头转向，摸不着头脑，这就是毛主席的蘑菇战术。这些条件加在一起，消灭胡宗南军队是完全有把握的。”“我虽然年纪大了，能和大家一起战斗，感到很快乐。同志们朝气蓬勃，对我是个很大的鼓舞。”并且号召每个党员必须严格遵守党的纲领、政策、决议和发扬艰苦奋斗的传统作风，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实现我们宏伟的目的。接着，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司令员王维舟讲了话，王副司令员从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打退了国民党政府蒋介石的数百万军队的进攻，刘伯承、邓小平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4个纵队13万人，对敌军从山东到陕北大哑铃形阵势实行中央突破，在鲁西南张秋镇至临濮集间强渡黄河，揭开了人民解放军的战略进攻的序幕，使我们从防御转入进攻说起，号召每个党员成为遵守群众纪律的模范。号召每个党员必须切实做好支援前线工作。

之三

一处十五孔窑洞的院落，三面靠山，一面对川；一孔不算太大的窑洞，沙石砌成，黄土裹面。坐落在古老的马蹄寨墙下，原是20世纪30年代修筑的新民寨三城。1940年，马蹄沟全境解放，人民政府接管了马蹄沟小学之后，这里便成了儿童的天堂，每日书声琅琅，每日人来人往。1947年4月下旬，国民党政府军占领了绥德之后不久，为了避

免不必要的损失，学校临时停课，学生放假回家，教师分组支前。7月29日，聚集在大理河与小理河流域的西北野战兵团，在这里召开了旅以上干部会议，会议在彭德怀司令员的主持下，听取了侦察人员的敌情通报和各纵队的情况介绍，就落实“小河会议”精神，如何进攻榆林，吸引胡宗南主力北上，配合陈赓、谢富治集团南下，作了详细地研究部署。

会议时间虽然不长，但意义重大，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了深深的一页。就参加人员而言，我们现在所知，就有14位开国元帅、将领和国家领导人，他们分别是：

彭德怀，时任西北野战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后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

张宗逊，时任西北野战兵团副司令员，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习仲勋，时任西北野战兵团副政治委员，后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张文舟，时任西北野战兵团参谋长，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副司令员兼装甲兵学院院长。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徐立清，时任西北野战兵团政治部主任，后任成都军区第一政治委员、军区党委第一书记。1955年9月被授予中将军衔。

王政柱，时任西北野战兵团副参谋长，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廖汉生，时任西北野战兵团第一纵队政治委员，后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防部副部长。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王震，时任西北野战兵团第二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后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罗元发，时任西北野战兵团教导旅旅长，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

军副司令员兼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张贤约，时任西北野战兵团新四旅旅长，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王绍南，时任西北野战兵团第一纵队参谋长，后任汉口高级步兵学校校长，中国人民解放军防化学兵部副主任。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冼恒汉，时任西北野战兵团第一纵队政治部主任，后任兰州军区第一政治委员，中共甘肃省委第一书记。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张希钦，时任西北野战兵团第二纵队参谋长，后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王恩茂，时任西北野战兵团第二纵队政治部主任，后任全国政协第六届、七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1955年9月被授予中将军衔。

故人已去，典范永存，六十多年过去了，虽然几处遗址已经破旧，其他的地方也旧貌换了新颜，但前辈们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着我们，那一处处窑洞中发生的事情，将永远留在光辉的史册。

（作者　栾世宏）

原载2009年11月8日《榆林日报》第二版

一九四七，马蹄沟的夏季

1947年，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或者是在中国革命史上，都占有特殊重要的位置。这一年，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陕北世界上最小的指挥所里，领导了世界上最大的人民解放战争，使全党和解放区军民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陕甘宁边区政府、中共中央西北局、陕甘

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边区群众报等机构，夏季在马蹄沟，度过了一个个不眠之夜。

6月11日，林伯渠主席、李鼎铭副主席率边区政府来到了马蹄沟区张圪劳村。与此同时，中共中央西北局来到了水浇湾村，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驻在了张圪台村，边区群众报社驻在了柴家圪劳村，边区政府随军医院驻在了清水沟村，边区政府被服厂到了吴家沟村，再加上转战陕北的随行人员与警卫部队，马蹄沟区一时成为陕甘宁边区的指挥中心、服务中心。

6月13日，《边区群众报》将四开四版的油印报，正式改为八开四版的铅印报。此时的边区群众报社，已经拥有了石印机、铅印机和六副排字架。虽然由于当时铅字不多也不全，临时雕刻又赶不上用，有时候只得用其他字号的字或同音字代替，使印出来的报纸大小字都有，有时还夹带着个别缺字的黑空。但这毕竟是我们在战争中自己建立起来的印刷厂印刷的报纸，模样不太好，可深受读者的喜欢，宣传的意义非同小可。

6月中旬后期，林伯渠主席主持边区政府召开了政务会议，对政府机关进行了大规模的精简整编。撤销了一批与战争关系不大的组织机构，紧缩了各厅局办事人员；撤销了总动员委员会，将战时动员工作划归民政厅统一管理。同时，大力加强兵站部工作，由其统筹安排和实施战时转运供给。待月底整编工作结束后，边区政府后方党政机关总人数为3746人，较1946年减少5038人。

6月27日，林伯渠主席撰写的“为前线立功”在《边区群众报》上发表。文中说：“在保卫边区、解放大西北的伟大人民自卫战争中，每次战斗的胜利，都涌现出成千上万的战斗英雄，为人民解放的革命事业立下了永垂不朽的功劳。在后方，为了保证前方胜利，边区人民开展运输、救护伤兵、供应粮草、反特锄奸以及生产节约、土地改革等战时工作，也开始涌现出一些模范事迹和英雄人物。但与前方主力

部队的作战功绩相比较，则仍有逊色，甚至赶不上战争的需要，落在战争发展的后面。须知战争是全面的、长期的、艰苦的，要彻底消灭蒋胡贼军达到最后胜利，就必须动员所有人力、物力，一切为着战争，一切为着前线，人人立功，事事立功。不论党、政、军、民，不论前方后方，不论男女老幼，在一切岗位上为大众、为自由、为保卫边区、为解放大西北建立功劳。把立功运动扩展成为群众性的热潮，为继续劳模运动，组织与动员干部及人民在对敌斗争中，发挥积极性、创造性。要根据不同工作、不同对象，经过群众路线具体组织他们，在参军参战扩大主力涌上前线中立功，在服务战勤担架运输中立功，在为作战部队烧水做饭、缝衣做鞋中立功，在增产粮食厉行生产保证供给中立功，在实行战时土地改革中立功，在响应政府一切号召和完成一切任务中立功，掀起群众性的立功热潮，使全边区人民的雄伟力量，在立功运动中以排山倒海之势支援前线，一直到最后消灭敌人。”

近两个月的时间里，习仲勋、马明芳和西北局党组及后委党组成员林伯渠、贾拓夫、王维舟、马锡五、常黎夫、惠中权、王子宜、周兴、范子文、江隆基、唐洪澄，边区政府李鼎铭、刘景范、霍子乐、霍维德、贺连成，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贺龙、阎揆要、张仲良、张经武与《边区群众报》杜桴生、胡绩伟、曹国兴等，都在马蹄沟区留下了自己的足迹。

7月1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在马蹄沟区水浇湾村驻地山坡下的大槐树前，召开陕甘宁边区一级党员大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26周年。会议由马明芳副书记主持，林伯渠主席向大家讲述了中央苏区五次反“围剿”和长征的情况后说，陕北地形对我军作战有利，群众支持我们，其他解放区战场捷报频传，对西北战场也是个有力的支援。更有利的条件，就是我们在党中央毛主席的直接领导下，牵着敌人的鼻子转。我军突袭陇东，挥师三边，搞得敌人晕头转向，这就是毛主席的

“蘑菇”战术。这些条件加在一起，消灭胡宗南军队是完全有把握的。最后号召全体党员要严格遵守党的纲领、政策、决议和发扬艰苦奋斗的传统作风，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司令员王维舟，在讲话中从党与群众的关系讲起，号召每个党员都要成为遵守群众纪律的模范。

7月9日，林伯渠主席和夫人朱明在马蹄沟临时驻地，亲切接见了出席子洲县人民政府召开的教师会议的全体人员，勉励全体教师要坚守岗位教好孩子，不要被眼前的困难所吓倒，要支持正义宣传革命，要相信胜利和光明就在眼前。会后不久，全体教师分组支前。

7月15日，边区政府创办了《边区政报》，创刊号上，林伯渠主席在“发刊词”中写道：“经过数月来战争环境的考验，证明我们过去工作中还遗留下不少的弱点和缺点，在由十年和平转入战争的时候，暴露出我们部分工作还赶不上，甚至远远落后于客观的需要。因此，要使我们全部工作的方向、机构、制度、作风、方式、方法，以至生活习惯，都应适应战争需要，转向一个新的道路。就是说不能满足已有的经验，不能只看到自己的成绩，而应当在新的斗争形势与人民新的要求下，虚心纠正错误，改进工作，打破骄傲自满、故步自封和墨守成规的思想观点，面向群众深入实际，以创造的战斗精神接受战争的考验。《边区政报》必须本着‘大家办大家看’的方针，成为各级政府和政府工作人员大家的刊物。”

据时任边区政府办公厅行政处处长、后任民政部副部长的岳嵩在回忆录中记载：在马蹄沟，边区政府办公厅行政处就驻在陕甘宁边区政府机关对面的半山坡下面临川道的院落里。当时编在老人队的有常驻议会议员刘培基、参议会议员“老蒙古”旗海田等，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常驻议会副议长谢觉哉、尚在绥德的副议长安文钦，参议会常委贺连成、霍子乐、霍祝三、杨明轩和晋绥边区的续范亭先生(临时来延安开会)等同志，虽未编进队伍，但也由边区政府行

政处负责转移和疏散工作。家属队里还有边区政府副主席刘景范的夫人李建彤、副秘书长曹力如的夫人田兴，民政厅厅长王子宜的夫人王劲、副厅长唐洪澄的夫人霍其洪，江隆基同志的夫人宋超和刘志丹将军的夫人同桂荣以及他们的子女、老人，共有老幼妇孺近百人。

7月下旬，正在马蹄沟的警卫连接到新华社总社来电，要求把坚壁在延川县冯家岔的印刷机器和设备，运输到山西碛口，准备出报。警卫连请示上级后立即出发，圆满完成任务。

7月29日，在彭德怀司令员的主持下，西北野战兵团在子洲县马蹄沟位于新民寨三城的小学校里，召开了西北野战兵团第一、二纵队旅以上，新四旅、教导旅团以上干部会议，彭德怀、贺龙、张宗逊、习仲勋、张文舟、徐立清、王政柱、廖汉生、王震、罗元发、张贤约、黄振堂、黄新庭、余秋里、王尚荣、朱辉照、顿星云、杨秀山、郭鹏、李铨、王邵南、洗恒汉、张希钦、王恩茂等参加了会议。

会议首先听取了敌情通报和各纵队的情况介绍及各战略区情况、晋绥与陕甘宁统一等情况介绍，就落实“小河会议”精神，如何进攻榆林，吸引胡宗南主力北上，配合陈赓、谢富治集团南下作了详细研究部署。在彭德怀、贺龙讲话之后，习仲勋着重对即将发起的榆林战役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他说：“榆林是国民党军晋陕绥边区总部所在地，其西与宁马集团、南与胡宗南集团形成掎角之势，北与绥远傅作义集团相依，为国民党在陕北的重要据点。榆林城西有榆溪河，西北面均为广阔沙漠，东南是丘陵与沟壑，城墙坚固，易守难攻，我们必须充分了解和高度重视敌军特点，坚决执行中央军委的战略部署和彭总的战略决心，诱敌深入，拖住胡宗南主力深入榆林，以利于陈赓纵队南进和发展，也有利于西北野战军今后发展。”彭德怀司令员在总结时又特别指出：“榆林战役的主要任务是诱敌深入，是配合刘伯承、邓小平及陈赓纵队南渡黄河，打烂敌人的整体部署。我们拖住了胡宗南的主力深入榆林，就有利于陈赓纵队在陇海线上站住脚和发

展。”

8月1日开始，为配合西北野战军转入内线进攻，陕甘宁边区政府机关、中共中央西北局等单位，相继离开马蹄沟，经过绥德等地东渡黄河，前往山西碛口高家坪。（作者　栾世宏）

原载2012年7月21日《榆林日报》第六版

四、人物回忆

汤洛：《延安游击队纪实》（节选）

1947年

6月6日

霏霏细雨，时断时续。转移的人流浩浩荡荡。

从延安撤退出的市民、机关干部、职工家属以及从子长、安塞等延属东北地区的部分农民，扶老携幼、拖儿带女，混杂一起，朝大理河下游向东转移着。蜿蜒在大理河北岸的宽阔马路上，塞满驮着行李家什、幼儿老弱的骡马、毛驴、黄牛和身背铺盖卷、肩挑筐箩担的青壮年及拄拐棍的老人、妇女，前不见首，后不见尾。细碎的雨点洒湿人们的帽子头巾，衣襟裤膝。晶莹闪光的雨珠，从女孩子乌黑的发梢上簌簌滴落，像苦涩的泪珠，落在我的心灵。

战争在妇女、儿童、老弱病残身上显示出的罪恶，更鲜明更昭著。那些躺卧在毛驴驮篓里的幼儿，被尘土染成土黄色的嫩细的小脸上那天真幼气的神情，那双灵活明亮的眼睛，无所思虑的望着飞云如流、细雨如丝的天空，小小嘴角，挂着好奇的憨笑的时候，我的心向铁爪狠抓似的。当畜背驮篓里的幼儿们，被饥饿和颠簸折腾的扬起阵阵哭声的时候，我向铁针穿心。痛苦、爱怜、仇恨和愤怒在我的心底凝结成的钢铁誓言再一次出现：

“让战争在我们这一代手里绝种！”

这浩大的人流，像无声的江河，水势汹涌，气氛严峻。那些身

负重荷的青年、中年、老年男性的艰难脚步，像要将这块被独夫民贼染遍灾难的大地踩翻似的落在大路上，沉默的走着。他们那铁青色的面孔上严峻的神情里时时掠过愤怒。短短的三个月里，十年的辛勤劳动建筑起的生活之塔倾倒了。这仅仅是开始。未来等待他们的又是什么？更深重的灾难。

临近正午时，雨停了，残云开始向南逸散。川道越来越宽广。道路两旁田野，庄稼长势良好。翠绿的禾苗衬着湿润的黄土大地，自然界一派欣欣景象。

我走进一个叫白郎池的村庄。在村道上与大哥树森相遇。“他乡遇亲人”喜出望外，欢欣若狂。在这慌乱年月，能与亲人邂逅相逢，百感交集。大哥将我领进一个石块围绕的石窑院。二叔母、大嫂和侄子侄女战娃、百团、随战，正在一户农家石窑的炕上坐着，一面休息，一面烘干湿衣。

年已五十开外的二叔母和善良贤惠的大嫂一见我，悲喜交集，热泪横流。幼小的侄儿们惊异地瞪着小眼。大哥忙从一个白布袋里给我取来他们带的干粮，从灶台锅里盛了一碗他们刚烧好的开水，让我吃喝。

我讲述着父亲逝世情形和母亲、妹、弟都被敌人从疏散地区俘回延安的情况，叔母和大嫂放声痛哭起来。

“家仇，阶级恨！……要报……！”大哥激动的脸色铁青，语言颤抖。

大哥是一个性格正直、刚强的共产党员。一九三五年在尧山中学读书时，曾因对校方政治黑暗不满参与闹学潮而被开除。一九三六年“双十二”事变后，他自动参加西北军扼守潼关，抗击国民党军向西安进犯。三七年初，中共中央迁驻延安，他返回延安进入抗大学习。毕业后被分配到八路军印刷厂当印刷机摇把工人，手摇印刷机八年多。战争爆发后，印刷厂疏散，他带着二婶、大嫂和孩子们随家属队疏散到志丹县。现在，他们要转移去黄河东岸的晋绥边区。

我匆匆吃喝完，向大哥告别，二叔母声泪俱下，哀痛地说：

“今生能不能再见上你，唉，这年头.....”

“收复了延安，就能见上了。”我这种无力的安慰，能给他老人家带来一线希望与一丝欢乐吗？

二叔母、大哥、大嫂，将我送出大门，送到大路。二叔母颤抖的双手紧拉着我的左手，老泪直流，泣不成声，只语难吐。大嫂拉着我的右膀，千叮咛万嘱咐。

大哥一直将我送到村前三里处，分别时，语重心长地说：

“咱们弟兄五个，有四个参加了革命。加上在东北的五叔，咱们田家有五个革命者。要对得起革命！不能做出对不起党，对不起家庭的事情。”

“家仇！”我们家与国民党反动派是势不两立。十年前二叔父在宜川地区被国民党军队杀害；三个月前，父亲又在国民党飞机狂轰滥炸的震耳声中含恨长逝.....

在一个山角拐弯处，我停步转身望去，大哥仍然站在那里纹丝不动地向我凝望。战争中的生离包含着十之八九的死别。

6月7日

东方发白，我独自动身前往马蹄沟一带为报社机关选择驻地。我军主力西进陇东，敌军被吸引西向。延安以北的绥德分区处在安定状态。西北局和边区一级机关单位确定在大理河川的马蹄沟一带驻扎下来。

晨阳洒满山川，我已赶过二十里路程，到达马蹄沟东约五里的老庄沟村。

这个村庄紧挨大路，坐落在一个小沟口山腰。三十多户人家。整齐洁净的窑洞院落，窑内有条不紊的农家陈设，花纹斑斓的民间风格装饰和中青年妇女们衣着色调淡雅、格调朴素、款式大方，显示出生活美的光华在大理河川的绚丽。

村农会主任李保金领着我挨家串户到各个窑院“号房子”。有的腾出他们的住窑，有的打扫他们的仓窑。并淘米洗菜做饭，迎接即将到来的我们这支新闻队伍。

一切准备就绪，我与李保金攀谈起来。究根刨底询问对方祖宗三代、家门世事的新闻记者的癖性，有时也会使人厌烦。可是，那些一个小时不说话便会生病的健谈家和饶舌妇，反而会使希望记者厌烦。李保金即不是健谈家，也不是哪种三棒打不出半句话的榆木疙瘩人。他是一个性格开朗、待人热忱的陕北农村青年。

他今年三十岁，当农会主任才三个月，从小就是务庄稼，没有进过校门，只读过两年冬学。如今文化程度是能读《边区群众报》。全村只有两个上完小的学生。政治先进，经济发展，文化却十分落后，这是老庄沟村的特点，也是整个陕甘宁边区的特征。我问他人们为什么不愿送自己的子女进学，他说：

“老脑筋，怕当公家人。”

当谈起对这场战争的看法时，他信心百倍，坚定地说：

“胡宗南不会长久。他是打进来了，可是要出去就由不了他。”

他对毛主席、党中央留在陕北一事，兴奋地说：

“只要党中央和毛主席没有过黄河，我们的心就踏实多了。”

战前，我每到一地，与我的采访对象交谈，是谈庄稼、谈牛羊、谈互助合作、谈发家致富。如今，谈的是支前、打仗、形势、胜利。战争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内容、生活方式和生活语言。

6月8日

报社在老庄沟定居下来开始工作。

今天上午召开全体干部会议，杜桴生宣布：即刻开始出报。由于石印机坚壁在朱寨河，改为油印。除每周出刊一期报纸外，同时编辑出版《新闻简报》和《今日新闻》。

我暂作本地区采访，待机返回延安游击队。

霍一禾由写石印版字，改为刻油印蜡纸了。

6月9日

嘉猷自延西支队来信。信是五月二十八日所写，途中走了十天。

他在信中告诉我，王生秀已被正法。这个忘恩负义，叛变投敌、作恶多端的反革命分子终究不能逃脱恢恢法网。快哉！

王生秀，一九三四年间携家带口逃荒落脚延安。一九三五年在枣园乡磨家湾分得土地和窑洞。一九四六年冬延安郊区进行土改补课时，他又是磨家湾村贫农会会长。由于他是贫农，一贯表现还很积极，备战时枣园机关聘请他指导挖了一个极其秘密的坚壁山洞。这个山洞分为三层，第一层和第二层埋藏着粮食和笨重物资，第三层是一批暂时无法运走的中央机关重要文件和资料。敌军侵占延安后，王生秀叛变告密。并且与敌达成协议：挖开山洞，粮食和物资归他，文件资料归敌。敌人挖开山洞劫走文件资料达三辆卡车。

四月初一天深夜，二大队队长刘青山和政委卢加谋亲率一班人马，越过敌军防线。插进枣园，从磨家湾将王生秀捉拿归案。经审讯，王生秀对其罪行供认不讳。经支队研究决定：为了打击反革命分子的嚣张气焰，将王生秀枪决在枣园村前，以达到杀一儆百之效。

高尚贤和我草拟了布告草稿，鱼化鹏用他那工整楷书写就布告。下款“延安市市长兼人民法院院长姚安吉”，盖上“延安市人民政府”的红色大印，由一大队派出一个班去执行。

第二天上午，这个执行班的队员们垂头丧气的回来。原来，由于他们在执行时惊恐慌乱，使王生秀从枪口下逃掉了。

事情经过是这样的，这个班押着王生秀越过敌军防线，到了枣园村前的西河滩，将王生秀押在一块石前。三个人在河岸警戒枣园村敌军，一个去巨石前贴布告，两个捉押的队员将王生秀按倒跪下即匆

匆后退，那个执枪的队员向王生秀开了一枪。在夜色朦胧中只见王生秀应声倒地。全班急急撤回，转身就走，而未查验现场，当他们回到裴庄时，班长突然想起没有检查现场，疑惑的问执行队员："打死了没有？"执行队员说："我看见倒下啦。"班长说："咱们得回去看看，是不是打死了。"他们又转回河滩巨石前，一看，不见尸体……

隔了几天，王生秀领着敌突击队约千余人向我游击队驻地大举进攻。迫使我们不得不暂时撤离楼儿坪一带，钻进梢林，退到洛河川。

此事，在全支队反响十分强烈。使曾经于撤离延安二十天后在索家崖首捷的第一大队信誉猛降。有的怒骂，有的讥讽，有的还向支队部提出，要求审查执行队员。

王生秀二次如何捕获，嘉猷信中没有详叙。我想，俘获一定富有戏剧性。待转回游击队后详作采访。

6月10日

据传，敌军在延安四周开始大"清剿"。我怀念着那里的战友，更迫切的是早日归去参加反"清剿"斗争。听别人打仗，真憋得慌；庆祝别人创建的胜利，总是觉得有点遗憾。

坐享其成是可悲的。

6月11日

这一带是绥德分区子洲县马蹄沟区三皇峁乡。

我去乡政府采访，乡长、指导员、文书全到各行政村忙战勤动员工作，只有驻这个乡帮助工作的县府一科科员刘竞在料理乡政府日常工作。他向我介绍了最近乡政府日常工作情况：主要是动员人力、畜力、物力，招待和转送过往的转移人员，据粗略统计，自六月一日以来，十天内从这里经过的延安撤出的干部、工人、家属和关中、陇东两个分区的家属约五千多人，现基本上过往完毕。在

接待转移人员中，子洲县的群众是积极热情的，发扬了“革命一家人”的共产主义风格。每家每户都腾出自己的住窑作为招待窑，柴炭由村里统一筹备。每村选有招待员和招待组，使转移人员食宿方便，休息舒坦。

听了刘竞的介绍，我在想：

战争焕发起人们同舟共济的感情。在生死与共面前，人们相依为命。同生死共患难的相交亲如手足。这就是战斗友谊。

6月12日

夕阳撒在翠绿的山野。人们仍在田间耕作劳动。

我和闻捷并坐在大理河中流一块光滑的巨石上。我谈着两个月的游击生活，他颇感兴趣。我眉飞色舞，滔滔不绝地讲完后，他说：“你终于走进战争这个神圣的境地，也许这是一生中最大的幸运。当你举枪瞄准着敌军放出第一枪的时候，才感到走进了战争；当敌军阵地射过来的子弹，在你头顶飞鸣，或擦耳而过，或落在你的脚前，这时，你才能体会到“生死搏斗”四个字的含义。战争本身是灾难，是破坏，一些生命在战争中死亡。同时，战争又为人类开辟新的生活。”

一个人在激烈的社会活动里，往往像与惊涛骇浪奋勇搏击的泳者，只顾翻越眼前的浪谷涛峰，很少去思考自己行为的意义与价值。那些站在岸边高地宏观全貌的观察家，才能清晰看到你在这场奋游中的意义、作用与价值。

闻捷用观察家的目光，发表他的战略观。

“我们对战争，了解得很多，也了解得很少。了解的多，是因为我们在祖国大地上连年不断的战争礼炮声中呱呱落地。我们又是在悲壮的战争进行曲中步步成长。我们受的是战争教育，我们过的是战争生活。我们培养起战争思想、观念、道德。但是，在战前，我们还

没有直接投身过血火纷飞，对战争的直接感受很少。比如，射击、冲锋、拼刺和被包围、被追击，有利与不利，变幻莫测等等各种情况下的各种心情，只能在亲身参加工作战斗中才能体会。”

侃侃健谈，情感丰富，一种诗人气质正在孕育的闻捷，那深邃的洞察力，令我敬佩。我只能朴素的叙述事物始末，而不会深掘其内涵核，这种缺点，表现在我的采访活动，浮光掠影，蜻蜓点水；反映在我所写的新闻通讯，肤浅与感染力不强。

夜幕降临，村落里灯光闪烁。天上繁星映进巨石四周河水，我和闻捷犹如身历星空灿烂的宁静世界。

闻捷继续说：

“战争结束后，那碉堡会被夷平，那弹坑会被填没，那激战过的战场，会被田禾与野草掩盖无迹。唯一能将这场伟大战争遗留千古的就是你手中那支笔。你想，是这样吗？”

6月13日

这一带盛产食盐和煤炭，真是白与黑的世界。

我独自去号称“十里盐湾”的盐滩。我走进盐工老吴的草棚，他刚下工，正在准备做晚饭。这是我第四次访问他的草棚。他是个熬盐看火多年的老工人，年龄四十开外，体质瘦弱，身材瘦小，面容焦悴，脸色黑黄，显然由于辛劳过度和营养不良所致。但是，他的性格却开朗豁达，对任何事物开怀评论，畅所欲言。是一个记者采访的理想对象。他家住据此十多里的老庄沟后沟，老婆孩子在家务农。这种农工之家在这附近乡村很多他们农忙回家务田，农闲再来熬盐。由于战争影响，食盐销路锐减，每天只能赚到二合小米（约一斤多）的工资，够吃一顿饭。

盐工生活习惯与农民相同，掌灯时分才用晚餐。老吴点起瓷壶麻油灯，蹲在灶前吃着饭。我借着豆大的灯光，向他念着今天刚出版

的《边区群众报》。不一会，周围几个草棚里的盐工也相继来了。小小的窝棚被塞的满严严。有的端着饭碗，有的吸着旱烟，有的席地而坐，有的蹲在灯前。我读一段报纸上的新闻与评论，便停下来与他们议论一阵子。我们的议论题材杂乱而广泛：从战争到土改，从闹火到抗日，从盐工困难到某些区、乡干部的恶劣作风。探秘以信赖与乐观观察着战争带来的种种困难。

只有劳动人民在困难面前最能理解一切。他们心目中有一个坚定不移的信念：

“有共产党……”

6月14日

三皇峁镇今日逢集，周围四乡的庄稼人驴驮人背地带着农副产品，远道商贾带着货物，云集在这条窄长街道进行交易。

自战争以来，我第一次参加这样盛大的贸易集会，从集市的热闹繁荣盛况来看，使你不会想到陕北大地上正在进行着一场血的战争。

街头的粮食市上，排满装有小米、玉米、荞麦、豌豆、黄豆、黑豆、绿豆和少许麦子的敞开黑羊毛袋和褡裢。这些五颜六色的谷物，是集市交易的重点，人们在那些粮袋前讨价还价，争议纷纷。

牲畜市上有猪羊、牛、马、骡子和毛驴。经纪人拖着袖筒和卖主摆摆价码，又和买主去捏合捏合，最后拍板叫价，你争他嚷，争执不休，好似打架。

长约二百公尺宽十五公尺的街道两侧，百货摊、铁器摊、编织摊和小五金摊铺设在路边地上，还有食家小吃：烩豆腐、炸油糕、调凉粉、荞面馏饨和荞面饸饹摊杂在其间。这些都是从附近农村赶来经营的。那些坐地的杂货、布匹、糕点、饮食店铺里，顾客进进出出，显得十分兴隆。小篮里装着鸡蛋，怀抱着鸡只的小姑娘、老太太在人流里走来走去，她们既不高声叫卖，也不停立街头，而是在串游中相遇

顾主。

赶集的人按照自己的所需，在不同的交易场所活动着……

乡镇集市贸易具有一种质朴美。人们彼此交易，以心为称，公平合理。

我于一禾游转在集市摊点，一禾在战前是延安市城市采访记者，对商贸领域较我熟悉，今天他成为采访主角，我却成了他的助手。

6月15日

“一人参军，全村光荣”已蔚为当今社会风尚。

这个村的两个青年被批准参加正规军，村里举办喜庆活动。连日来，家家设宴为出征之弟饯行。这两个青年向新郎似的穿着崭新的衣裳。这家宴席未毕，那家请客已在恭候。

今天，他俩要前往县府集中。早饭后，我带着毛巾、肥皂、铅笔和学习本代表报社机关去到他家送行。走进他家窑院大门，在院子、窑门口和窑里，早已挤满了送行的男女老幼。

乡长和区长也带着礼品来了。参军青年的父母们像娶媳妇嫁闺女般的满面春风地招待着送行的人。院子里放着两张八仙大桌，上面摆设着瓜子、花生、香烟和油炸麦面花叶。窑里大炕上放着朱漆炕桌，上边也摆了茶点。村里的老者、区乡干部与出征青年的父母盘腿而坐。此时，最忙碌的是农会主任李保金，他像办理自家的喜庆，忙前忙后，心喜难抑。

区长告诉我，全区五个乡报名参军青年二百多人，这批只批准了三十名。他说：

“就凭这一点，蒋介石和胡宗南也非倒不可。”

上午八时多，参军青年由区长和乡长陪同离村，前往县府报到。村里人一直送到村外公路上。

6月16日

印刷的困难使报纸版面小了又小，纸张的困难使印数锐减。大家为此而焦虑不安。负责印刷的同志，返回朱寨河取坚壁的石印机，争取下一期能恢复石印。编辑部除照常出油印报纸《新闻简报》、《参考消息》外，加强了对新华总社的发稿。因此，要求稿件短而精。一个字一个字的推敲、删减。简直是在写电报文稿。这苦煞了我们记者。无论你写什么稿子，编辑一接，先拿起红笔。我们骂编辑："编辑的红笔，刽子手的刀——血淋淋，残酷无情。"

6月17日

助民锄草。编辑、记者、行政人员全体出动。

6月18日

采访在子洲县委所召开的区长、区书会议。会期八天，今天是第一天。县委组织部长作了党委工作报告后，随即开始讨论。从各区汇报情况看，各区委对党的建设工作做得很差；土改斗争中涌现出了许多优秀的积极分子，但没有很好地去发展他们。同时有些落后的党员被狡猾的地主"诉苦"所感动，而放弃了自己的立场。党在土地改革中作用到底如何呢？从汇报中很难看出。而在扩兵和支前中，却有少数干部还向后退缩，包庇自己的亲朋等人。

6月19日

继续参加子洲县区长会议举行采访。今天议题是支前工作。

6月20日

白发苍苍，年已六十七岁的林老比在延安时消瘦多了。但他仍是那样精神矍铄。今天下午他在子洲县区书区长会议上给基层党政干

部作了长达四个多小时的报告。报告场地是在县委石窑院露天下。他那白发在西斜的炎阳下闪烁着耀目的银光。延安撤退后，他和我们一样，坚持在边区领导一百二十万人民群众进行斗争。

在人民心目中，他不仅是陕甘宁边区政府的主席，而且是一位虚怀若谷、恭谦勤奋、慈祥和蔼令人肃然起敬的老人。战前，无论在什么地方，什么场所看到他，都在我们心里激发起崇敬之情，亲切之感。可是，在当今，战火燃烧的时日，看到他，心里激起的却是无比的怜爱："战争不应属于他们呀！"

今天，他是讲话内容十分广泛：第一部分是我军为什么要撤退延安和当前的战争形势与任务。第二部分是目前各项工作：土改、参军、支前以及领导生产问题。第三部分是如何转变各级干部工作作风以便适应长期战争需要，等等。

6月21日

在我积极的要求下，批准二十五日动身返回延安游击队。

上午，去边区保安处与李启明同志商谈，通过他们在延安周围活动的武工队电台发新闻的事情。

在报社驻地川道对西村庄的土窑里，我见到了他。

李启明年约三十岁左右，长一副篮球健将的身躯体魄。假如用一套质地优美、款式合身的高级服装，换下他现在身上陈旧的灰色延安服，便成为一个国际舞台上风度翩翩的外交人物。偏分型浓发乌黑发亮，长圆的脸面白白净净，浓眉大眼，端直鼻梁，是一个漂亮的男性青年形象。战前，在延安的舞台上我经常看到他。在欢舞的人的漩涡里，他是比较显眼的人。

我走进山坡土窑，他正坐在一张农家小桌前翻阅一手书报告。因为，战前我曾是保安侦察科一名科员，为了进行本职工作方便，而来报社担任新闻记者。我们彼此相识。

他离座前来于我紧握。礼让道：

“坐！”

窑内只有一个方凳，有客无主，有主无客。我没有坐。我们站着交谈起来。他那洪亮而浓重的晋中口音，显出性格豪爽。当我开门见山的提出我的要求时，他爽快答应：

“行，没有问题。你可带你们一名译电员去，用报社的新闻密码。”

我告诉他，当前报社还没有一个记者带一个译电员的条件。他沉思片刻，说：

“那就用我们的密码，现在延安周围活动的武工队，还没有达到每个队一台电台。我们争取在短时期内能达到。”

他刚从延安东部地区武工队里回来四天。他说：“延安四周武工队活动仅仅刚刚开始，和当地游击队配合行动。敌区工作目前主要是摧毁保甲，打击那些死心塌地为敌效忠的反革命。”

当我将王生秀投敌叛变罪行和被镇压经过告诉他后，他说：

“叛徒对革命带来的危害，有时比敌人还严重。”

6月22日

我的工作交给冯森龄，由他担任附近乡镇的采访工作。

同冯森龄霍一禾去盐滩观赏火塔奇观。

明天是端阳节，这里的风俗除包粽子外，异于别地的是燃火塔敬盐神。所有盐场都用煤块垒起了煤塔，有的高达五公尺，有的低矮咫尺。傍晚。开始点燃煤塔，顿时十里盐滩乌烟升腾，宛如黑色云海，波翻浪卷；入夜，熊熊火塔布满平川，好似万朵芙蓉，绚丽斑斓。火塔前，有的盐工烧纸焚香，有的盐工燃放爆竹烟花。

我们穿行在塔林烟海之间。一面观赏这种奇异夜景，一边与盐工交谈。直到夜深方归。

6月23日

前线消息：主力一部对侵占陇东分区的蒋马军进行反击，取得辉煌胜利。收复华夏、曲子、环县等乡城镇，蒋军马鸿宾部第十一师与骑兵第二旅土崩瓦解，陇东东西四百里，南北三百里的广大地区，除庆阳一角几个据点外，已全告广复。

我军主力一部在陇东大胜的时候，胡宗南的嫡系主力则在东延安、安塞、志丹和靖边县的东南角青阳岔、卧牛城地区作了一次武装游行。这次游行用了八个旅之众。从6月4日起至6月15日止，对和平人民大逞淫威。

6月24日

与胡绩伟、谭吐话别。交谈关于游击队与游击区的报道问题。谭说：

“我们仅仅只能提出要求。对那里情况我们是不了解的，这主要靠你从实际出发了。”

自1946年3月被分配到报社一年零三个月里。从一个学行政司法的人转到新闻工作，困难重重啊。

明天动身，今天唯一的准备工作是擦枪。下午我坐在街畔前擦着枪。一禾刻写蜡纸完毕与我话别。我俩谈起了往事。他从他参加学生运动到奔赴延安，从在延大教育系学习到当小学教员。虽然这些经历以往他曾片片段段向我谈过，但今天谈起，却有另外一种难以言状的心绪。

我们这一代的经历只有两个字才能准确的概括：

动荡！

6月25日

天麻麻亮，人们还处在甜蜜的沉睡中，我起程了。

一禾与闻捷送我走向村前大路。我们默默地并肩而行，彼此没有祝愿与鼓励的只言片语。

沉默地分别，心情并不沉默：依恋、惜别、祝愿、忧伤，多种感情错纵交织，情翻意卷。

到了路边，我们就要分手。平日谈笑风生的闻捷，此刻一言不发，他那明晶的大眼睛里像升起朝露，湿润了。一禾瞧着我口吃地说了一句："延安见……"便垂下脸睑。

"你们请回。"我此刻能脱口的致谢词只是这四个字了，其他的话都被激动梗塞在喉咙。我连手都无力伸出去与他俩握别，转身拔步就走。可这两条腿似被一条粗壮的皮筋系在他俩身上，感到特别沉重……战争中的别离心情，真是难以言状

我独自一个人在黎明前黑暗笼罩下的空寂大道上行进。无尽头的前程，在脚下伸向遥远；两侧巍蜒重叠的山峦剪影，紧贴在铅色天幕。我的足音，此刻是这条宽坦川道里唯一响声。穿过沉睡未醒的村庄，那路边窑洞里传出的香甜鼾声，使我想起被敌人掠去的弟妹、母亲临终时的形影……

原载《延安文史资料》第五辑173—194页

（作者 汤洛（1925—2006）原名田树基，曾用笔名田冷、东方红，陕西延安人。1938年就读于陕甘宁边区中学、师范，1945年又入延安大学行政系学习，历任售货员、图书馆员、教师、乡政府文书、保安侦察员、报纸文艺副刊编辑、战地记者、新华通讯社一野和朝鲜前线记者、新华社西北总分社特派记者、政法文教采访组组长、《延河》第一任副主编、西安作家协会专业作家、陕西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特邀研究员。著有长篇报告文学《黎坪之路》，报告文学《毛主席万岁》，中篇小说《解仇合密》、《尕海滩》，长篇小说《延安之歌》等。）

王诤：《周副主席主持召开通信保密会议》

1948年1月下旬，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同志，在陕北米脂杨家沟村主持召开了一次通信保密会议，并在会上作了重要指示。我们俩当时在西北野战军司令部任通信科正副科长，参加了这次会议。时间虽然过去40余年了，但会议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周副主席的指示犹在耳边。

这次会议，是在我西北野战军经过十个月的艰苦奋斗，相继取得了青化砭、羊马河、蟠龙三战三捷和沙家店战役辉煌胜利的情况下召开的。当时，我军正处于由内线作战转入外线作战的历史转折时期。但是，由于对无线电通信保密工作重视不够，机要通信工作未能及时跟上形势发展的需要，出现了一些失泄密现象。特别是敌人对我军进行无线电测向侦察，更加暴露了我们在无线电通信保密方面存在的问题。如1947年10月（编者注：应该为7月），我西北野战军指挥机关进驻子洲县马蹄沟村的第二天下午，领导同志正在开会，突然敌机袭来，往村子里投弹轰炸，弹着点落在彭德怀司令员的住处和电台的大院内，把天线炸断，彭司令员的窑洞里的大锅也震动了。虽然没有造成损失，但引起了彭司令员的高度重视。他把刘东克同志找去说：敌人是想摧毁我们的指挥机关和通信枢纽，可不能马虎呀！接着他又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敌人的飞机跟得那么紧，盯得那么准呢？这里面一定有什么原因，你们要认真研究一下。不久，我们在清涧战斗中缴获了敌人一部无线电测向台，还俘虏了测向员。三科立即派参谋向明华审讯了俘虏。据该测向员供认：从敌人向我陕北重点进攻以来，就千方百计对我军电台进行测向侦察。3纵队由晋绥来陕北参战，每天的行军路线、所到的具体位置均被敌测获。这次，他们发现我军在马蹄沟方向的电台活动频繁，判断我

军可能在开高级军事会议，便派飞机轰炸。我们把这个情况分别向参谋长张文舟和彭司令员作了汇报，彭司令员指示我们，马上把俘虏的敌测向员及缴获的测向台送交党中央。

党中央对此十分重视，就在中共中央前委扩大会议结束不久，周恩来副主席于1948年1月下旬，在米脂杨家沟村他住的窑洞里，亲自主持开会研究如何搞好通信保密工作。参加会议的有军委三局局长王诤、机要局局长李质忠、三局副局长王子纲，中央支队第一大队负责人崔伦、西北野战军参谋长张文舟，通信科科长刘克东和副科长朱仕朴。

正准备开会时，毛泽东主席来了，周副主席高兴地站起来说："毛主席来看我们了！"到会的同志也不约而同地站了起来。

"你们开会呢？"毛主席问。

"快要开始了。"周副主席答。

"好。"毛主席笑容满面地说："我来看看同志们。"大家热烈鼓掌。

毛主席进来时，同与会的同志亲切地一一握手说道："你们辛苦了！搞好通信保密工作很重要，三局的工作做好了，中共中央的耳目就灵通了.周副主席召集大家开会，有什么问题你们好好研究解决" 这亲切的问候，使我们不知怎样回答才好，眼里闪着激动的泪花，内心里感到十分惭愧。我们身为通信工作干部，没有把工作做好，而叫毛主席、周副主席操这么大的心。

大家鼓掌目送毛主席离开了会场，座谈会就开始了。

周副主席说：机要通信工作在战争中十分重要，通信保密工作最近出现的一些问题，大家都已知道，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摆脱敌人的侦察，变被动为主动，办法还是要大家想。然后周副主席请张文舟参谋长通报了敌人重点进攻陕北以来对我电台进行测向和侦察的情况。接着，与会同志分别发了言，列举了无线电通信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比如党政军电台混杂，互相牵扯；密码、频率、呼号老一套；机器信

号声和手法老调子，一听便知道是我军电台；有的报务人员不遵守通信纪律等，并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一些改进的措施。

周副主席很注意听每个同志的发言，有时在本子上记，有时点点头，有时插上一两句话，有时凝神思考，有时提出个问题让大家研究回答，始终全神贯注，使会议开得既严肃认真，又十分活跃。

座谈会结束前，周副主席作了小结。这个小结，既高度概括，又生动具体，抓住了要害。他把小结的内容概括成四言八句："划清系统，调整人员；改装机器，变换手法；模仿敌人，多种呼波；严守纪律，加强保密"。他说：加强保密这一句是中心思想，是总的要求，其他七句是具体措施，还逐句地作了解释。

在讲到调整人员这一句时，周副主席说：报务员要调台，使敌人抓不住规律。说到这里，他又派人把野战军政治部主任甘泗淇同志请来，当面交代说，有个牵扯到干部的问题，政治部要关心通信工作人员的 政治情况，帮助通信部门把通信队伍建设好。

周副主席在小结的最后说：我们常说要千方百计，就是要想尽一切办法，摆脱敌人，大家在这次会议上想出了很多办法。但情况是在不断变化的，我们不能一劳永逸，要不断发现新问题，积极动脑子，吸收群众的智慧，解决新问题。要搞好通信保密工作，首先通信部门必须重视，特别是领导更要重视。毛主席很关心这项工作，我相信同志们一定能够把它搞好。

杨家沟会议一结束，我西北野战军立即在绥德的吕家沟村召开了旅以上单位通信科长会议，具体研究贯彻落实周副主席召开的通信保密会议精神。会议由张文舟参谋长主持，王诤、李质忠局长、王子纲副局长都到会作了指示。

正当会议在热烈讨论时，彭司令员也临时决定参加我们的会议。他在讲话中强调了通信工作要迅速、准确和保密，要贯彻到战役、战斗的全过程，保证指挥的不间断性和稳定性。还指出，要做到迅速、

准确、保密，通信人员负有重要责任，指挥员也有一定的责任，尤其是保密工作，有的必须指挥员下决心才能做好。彭司令员根据以往的作战实践，从指挥员的角度提出了一些保密措施，如在战斗打响之前，一律不使用无线电通信。

会议根据周副主席的指示和彭司令员的讲话精神，对我们过去的工作进行了全面检查，总结了经验教训，制定了今后通信工作的组织原则和保密规定。

杨家沟通信保密会议的精神在部队传达贯彻之后，极大地鼓舞和教育了我们全体通信工作人员，并在以后的通信工作中坚持和贯彻了会议精神，努力把保密工作做好，保障了战役战斗的顺利进行。

原载中红网《王诤同志纪实回忆录》之二

（作者 王诤，（1909—1978）原名吴人鉴，字凤岗，号雨峰，曾用名王铮。江苏武进县人。1928年，考入黄埔军校第六期通信科，1930年12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4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中央苏区第二、第三、第四、第五次反围剿和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他是毛主席、朱总司令亲自任命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个无线电台的队长，继而出任红军无线电大队大队长、红军无线电总队总队长、军委总司令部第四局（通信联络局）局长等。全国解放后，历任中央军委第三局局长（后改为通信部部长）兼国家电信总局局长，邮电部党组书记、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兵主任兼军事电子科学研究院院长，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副院长，第四机械工业部部长、党组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总参谋部四部部长等。1955年授中将军衔。是第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七、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十、十一届中央委员。）

王铭慈：《一名报务员的回忆》（节选）

1947年至1948年一年多的时间，我以一名报务员的身份跟随领导机关转战陕北，这段经历让我终生难忘。

奔赴新的学习岗位

1945年9月，陕甘宁联防军司令部（简称联司）通信科（三科）派参谋崔伦到抗大七分校为联司通信训练队招生，学无线电报务技术。女生队有10个名额，大家自愿报名。结果，王杰、王铭慈、张清欣、张英华、邢志华、黎锦、彭秀文、詹志卿、信书志、李连敬被选中；此外，还在二大队招了几十个男生。

我们就要奔赴新的学习岗位了，队上开了欢送会，还为我们做了丰盛的饭菜。在欢送会上，我们唱起了毕业歌和鞭策、鼓舞我一生的抗大校歌。我们抱着努力上进的心愿，含着留恋的热泪，告别了在一起学习、行军、生产、生活过的同学和培育我们成长的母校，再次奔赴革命圣地延安。

联司通信训练队的驻地在延安飞机场边一个山沟的半山腰上，那里有块半圆形的平地，挖了十多孔土窑洞，像一个三面有房的院落。教室也设在土窑洞内，内有土台、木板搭成的桌凳，桌上摆着一排学练发报的锄头和能听到声音的发声器。

同年10月开学，我们是联司通信训练队第二期学员。队长是严成钦，政治协理员是林彬（朱仕朴），党支部书记是向明华，收发报教员是汤汉章、李映潭，机务教员是黄达。学员约120余人，一区队主要来自抗大七分校，其中还有从重庆送来的1名学生，区队长是张俊生；二区队是从陕甘宁地区各中学招来的，区队长是许国祯。

经过半年的学习，我们于1946年4月毕业。除完成学习任务外，还参加过几次重大的政治活动，如毛主席重庆谈判结束回延安，我们全队到机场欢迎；朱总司令60寿辰，我们全队抬着自做的寿桃去祝寿；叶挺军长等乘飞机遇难，“四八”烈士的16个红色担架，我们队参加了接运，并参加了隆重的追悼会。此外，还参加过几次迎接外宾的活动。在这些活动中，我们见到了很多中央首长，聆听了他们的讲话，很受教育。

毕业时，我们同来的10个女生，除李连敬因故未能毕业外，詹志卿和王杰分配到了清凉山上的新闻台，其他7人（我在其中）分配到了联司电台的20分队和21分队见习。

学习结束时，我取得了收发报全优的成绩，并在队上选中了一个意中人。

爱上报务工作

1946年4月，我被分配到联司电台21分队，分队长是黎辉宝，报务主任是冀守廉。我们每人都由一位老报务员带班上岗，分配我跟梁立波（汤老师的爱人）见习。她对我要求很严，教得也很尽心，下班后我也常帮她做点家务，师徒关系处得非常好。她大胆放手看着我收发报，我也认真、细心地跟她学，见习三个月我就能独立工作了。经考核转正为报务员，可以正式排班上机了。

虽然我们报务员只能看到电码，不知内容，但可以看到报头上的等级，如平报“A”，急报“AA”，万万火急“AAA”。有时情况紧急，报务主任，甚至队长都来上机，有时司令部的参谋，三科的领导也来电台传达首长的指示，我们深深感到这工作的重要和责任。

每次上机一点也不能分心，要把发来的报准确地收过来，把发出的报清楚、准确地发出去。我发报平稳、清楚、好抄，为此我曾负责值过发“全台报”的班，如有比较重要的电报，我都要呼叫点名。当

时有9家电台每天有固定的收发报时间，开始一个台一个台叫到，发后再一个台一个台问收得怎样？抄不上我给重复，抄完整他们就给收据，这样9家电台逐个完成。遇天气情况好，发后一问，各家都抄得完整，给了收据，真痛快！对方“再见”时，也多发来鼓励友好的术语，我感到无比愉快，我真爱上了报务工作。

毛主席的英明决策

1947年3月，当时毛主席和党中央、解放军总部都住在王家坪，这里是毛主席在延安最后住的一个地方。这时，蒋、胡匪帮集中25万全部美式装备的兵力，重点进攻延安；当时驻守陕甘宁边区的小米加步枪的解放军只有二万五千人，为此党中央决定主动撤离延安。中央和总部首长召集边区部队负责同志传达，但指战员纷纷表示要坚决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哪怕是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也不能叫敌人占领延安。大家说：“一枪不放把延安让给敌人实在不甘心。”毛主席耐心地说服带兵的人，让他们了解中央这一决策，回去动员全军，说服满腔热血誓死保卫延安的指战员们。毛主席说：“延安在全中国、全世界都很有名，但作战的目的是为了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而不是以保卫一城一地为主要目标。只要我们把敌人的有生力量消灭了，就有可能收复失地，发展边区。有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蒋介石进攻延安兵力和武器装备上占优势，但我们要看到陕北地势险要，群众基础好，我们一定能取得胜利。蒋介石进攻延安，不能说明他的强大和胜利，只能说明他的失败，他背上了一个大包袱，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有的同志认为一枪不放地离开延安不甘心，你们可以放吗！朝天放吗！表示我们对运输大队长的欢迎。你们回去对指战员们说：我们离开延安一年，至多两年，我们会回来的，将来延安将永远属于人民。”

1947年3月12日，驻延安的“美军观察组”上午坐飞机撤离，下

午国民党的飞机就来轰炸，首先轰炸了军委三局通信枢纽所在地，接着又炸了清凉山上新华社广播电台所在地，企图使中央和总部指挥失灵，失去科学的千里眼、顺风耳；想捂住我们的嘴，不能揭发他们发动内战的罪行，对此中央、总部早有预料和准备，此时都已安全撤离。当天敌机在王家坪周围投下了许多炸弹，听说震得门窗直摇晃，毛主席还坐在办公室工作，当时同志们劝毛主席到防空洞里去躲一躲，毛主席说："窑洞这么厚，不要紧。"这时警卫班一个同志从外边拾回一块炸弹片让毛主席看，毛主席接过来用手掂了掂，笑了笑说："这东西很好，可以打把菜刀。"

3月18日，据报告：敌人已到了七里铺，当时延安的机关干部和群众已转移，同志们多次向毛主席通报敌情，劝他上路，可他总是不肯，还说："大路朝天，各走一边。他走他的，他到那个山头，我到这个山头，没有什么可怕的，来得及。"直到下午毛主席才让警卫员去安排饭，他说："吃过饭再走。"毛主席叫同志们打扫卫生，把书整理好，放在书架上，还风趣地说："敌人来了，首先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也好。"饭后离开延安前还一再问："同志们走了没有？群众走了没有？"同志们回答："都已安全撤离。"毛主席才离开。这时已是下午5点钟了。

我们联司电台是在接到中央台停止工作后才开始撤天线。贺龙司令员和几个参谋一直陪着电台的同志和几个译电员，直至晚上8点才一同开车上路。我们同样按照上级的指示，把窑洞打扫得干干净净，把书摆在桌上，还把火盆的木炭架得高高的，表示我们是从容、主动撤离的。后来听我们在前总电台工作的同志们讲：他们当晚仍住在延安，还曾到我们电台驻地查看，这时我们煮的鸡肉和狗肉已熟，就都慰劳了他们。他们进窑洞时火盆的火还燃着。3月19日胡匪进延安后高兴得手舞足蹈，大开庆祝会，以为取得了多大的胜利，其实他哪里知道，这正是毛主席诱敌深入的"蘑菇"战术，就是利用陕北地势险

要、群众基础好的优势，在泥坡上，山沟里拖垮他们，断他的给养，让他的官兵挨饿受冻，最后精疲力竭时消灭他的有生力量。毛主席还很形象地打比方说服官兵："胡宗南军队是五块豆腐垛在一起，你一口吃不下，一块一块就可以吃掉，敌人进犯边区像是一个拳头进来，进来后变成一个巴掌——占领的据点，要分兵防守，我们一个指头一个指头地斩断他。"

迎接战斗考验

1947年3月16日，根据战争形势的需要，成立了解放军西北野战兵团。我们联司电台20、21两个分队，抽调身强力壮的男报务员组成一个电台，黎辉宝任队长，冀守廉任报务主任，由三科科长刘克东和参谋黄达带领调西北野战兵团司令部，司令员是彭德怀。留下的10名报务员（我在其中）组成一个电台，队长是段华夫，由参谋向明华、吴雄带领留联司，司令员是贺龙。

联司最后一批人员于3月18日晚8时撤离延安，经安塞第一站撤到了距延安80里的真武洞。这时电台的任务是联络中央前委、西北野战兵团和联司所属几个分区，还有晋绥。

此后，联司转战各地，于1947年9月（大约），向前委、前总靠扰，驻在子州县境。这时，我们的电台几次遭空袭，敌机好像就是冲着我们电台来的，这引起了领导，特别是通信部门的重视。从此，我们的电台每到一地，天线就不许架在首长和联司机关驻地附近了。

当年10月（编者注：应该是7月），野司驻在子洲县马蹄沟，离我们的驻地只有一河之隔。从延安两个台分开，两台人员只是在机上交手，互相都很想念，现在靠得这么近，大家都很高兴。野司电台有的同志和我们联司电台通报时，在联络结语中说让我们过河去玩。我们在空班时真的去玩了。谁知第二天他们的电台就遭到了空袭，天线都被炸断了，幸亏没有伤人。以后又发生了几次这样的事，于是彭总将

三科科长找来问："为什么敌人的飞机跟得这么紧？盯得那么准呢？这一定有什么原因，通信部门要认真研究。"

这成了当时通信部门领导和电台工作人员讨论研究的一件大事，大部分同志认为：野司和联司两部电台，发报机都是在延安用过多年带出来的，声音敌人都熟悉了，我们的发报手法敌人也摸清了，从而认准这是我军的重要电台，因此追踪轰炸。

认识到症结所在，三科领导和通信机务参谋就领导大家换了发报机的管子；各台更换了呼号、波长；各人发报通报手法也尽力模仿敌军；在机上声东击西，躲过敌人的监听。例如，把对方呼出来，叫他等一等，立即把波长调到另一个事先约好的波长发报。

后来，在清涧的一次战斗中，缴获了敌人一部无线电测向台，还俘虏了一名测向员，通信参谋向明华参加了审讯俘虏的工作。据被俘的测向员供认，从他们向我陕北重点进攻以来，就千方百计对我军电讯测向侦察。例如三纵队由晋绥来陕北参战，每天行军路线，所到的位置均被测获。这次发现我军在马蹄沟方向电台活动频繁，估计我军可能在开高级军事会议。据说那次野司电台邀请我们"过河来玩"，敌人分析是一位首长的行动密语，便派飞机来轰炸。看到缴获敌人的测向定位记录才明白，几乎我们所有的军事电台，他们都准确地标了出来，难怪敌机对我们电台跟得那么紧，盯得那么准。

当知道敌人用了侦察测向，了解我军军事部署，对我军作战危害很大时，毛主席发出指示，要我们设法对付敌人的测向定位，而且一定要做出成绩。于是一场无线电反测向斗争开始了。主要是发挥人的作用，采取隐蔽指挥、隐蔽行动，加强电台佯动，特别要加强通信纪律，经过上下一齐努力，确实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光荣使命

1947年11月，联司张参谋长召集报务员谈话，说中央首长急需

看报纸和加强对全国的宣传，要抽调几个报务员去工作。一听说是毛主席需要，我们到会的马上都报了名，最后选定了6名（我是其中之一）。

宣布的第二天我们就起程去亚洲部（出延安后中央前委的代号）。亚洲部当时在米脂县的杨家沟。毛主席、周副主席、任弼时司令员，下有4个大队：一大队是负责警卫的；二大队是侦察敌情的；三大队是搞通信联络的；四大队是搞新闻的。我们去后编进了四大队，大队长是范长江，我被分到了新闻通报台。

我们四大队新闻通报台的任务就是把党中央、解放军总部、毛主席向各解放区以及全国人民、全世界告知的宣言、评论、社论、新闻等发往邯郸，再通过陕北广播电台（撤出延安后，延安广播电台迁往邯郸，改名为陕北广播电台。）播出。

1947年11月，毛主席在米脂杨家沟召开中央会议。毛主席起草《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向全国人民发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伟大战斗号召。

1947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在杨家沟召开会议，毛主席在会上作了题为《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极其重要的报告。

1948年3月7日，毛主席发表《评西北大捷兼评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的重要评论。

这些报告、评论等都是通过我们新闻通报台发出去的，其中我记得最清楚、印象最深的是发毛主席的报告《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这是我们新闻通报台三个锄头兵和12个摇机员花了12个小时发出去的。译电员就和我们住在一个院，他们一边译，我们一边发。毛主席这篇报告是我遇到的最长的稿子，从晚上9点开始，我们每人发两小时一换手，摇机员俩人一班轮流干，大家紧张有序、聚精会神地工作着，一直到第二天上午9点才发完。

我们这些锄头兵，都深刻地认识到在中央前委身边，担负电讯

传递任务是无上光荣的，我们能够在这个重要的历史时刻，履行党的通信战士职责，深感自己责任的重大。我们深知毛主席的战略思想、战役部署、英明决策、重要讲话等，都是通过我们的无线电波传递给各野战军、各联络对象，甚至全国人民的；各地的胜利捷报频频传来，同样离不开电台的工作。我们预感到伟大的祖国即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一想到这些，就觉得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我当时虽身怀有孕，但从未因此而休过一个班，我们当中也从来没有一个同志叫过苦，因为我们知道，自己肩负的使命神圣而光荣。

原载《王铭慈的博客》

（作者 王铭慈，女，河北省平山县人。1925年生，1940年在晋察冀边区五中学习，同年入党，1942年参军入抗大二分校附中，1943年赴延安编入抗大七校女生队，1945年学习报务后，先后在陕甘宁联防军电台和中央前委新闻通报台任报务员，1949年5月到西安，在联司通信总台某台任报务主任，同年10月调入兰州西北军区通信总台任载波长途话务站领班，1955年入人民大学法律系学习，1960年到重庆通校干部科工作，1962年调西安军事电信工程学院（现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工作，1982年退休。）

胡绩伟：《啊！延安，我们回来了》

党中央决定离开陕北的时刻，我又一次见到了毛泽东主席。1948年3月23日，毛主席率领党中央和解放军总部的机关，在吴堡县的川口东渡黄河，进入了山西地区，从此结束了共产党中央机关在陕北指挥各解放区军民抗击日寇、打退蒋介石进攻的前后共十二年漫长的历史。

就在这个可纪念日子的两天之前，毛主席在杨家沟召集“亚洲部”（中央纵队的化名）全体会议，宣布了中央机关开赴华北的决定，并决定把一部分人员和物资留下来。西北局叫我赶到杨家沟参加了这次会议，听毛主席离开陕北前的讲话，并迎接新华总社和解放日报留下来的同志以及一批印刷物资。

面临着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在望的大好形势，我的心情十分激动。当时，因为通知参加会议的人不作记录，对毛主席的这一番讲话，我们几个在场的同志会后又聚在一起回忆一遍，把大家脑子里记下来的凑起来，由我回到报社作传达。

时间一晃又过去了五十年，在写这篇回忆录之前，我特地回到西安，和当年的老战友团聚了几天，畅谈那一段难以忘怀的珍贵岁月。毛主席这次讲话的意思，大体上是这样： 主席说，中央机关决定离开陕北，转移到华北去。陕北是个好地方，我刚到陕北，中央红军只剩下两万多人，现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发展到三百万。中央在陕北十二年，我对陕北是有感情的，当然舍不得离开陕北。 主席说，延安保卫战刚满一年。仅仅经过一年的战争，西北人民解放军就由劣势变为优势，由内线防御转为外线进攻。眼看延安很快就会光复，整个陕甘宁边区就会光复，我们还会发展很多解放区。在这一年当中，全国各路解放战争的形势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完全消灭蒋介石的反动军队，解放全中国的新时期很快就会到来。主席说，随着全国形势的迅猛发展，党中央必须从陕北转移到华北，以便于领导这场最后解放全中国的伟大战争。主席说，在中央离开陕北时，需要留下一批同志，一来是陕甘宁边区需要人；二来是中央在转移中也需要队伍精干，轻装前进。决定留下来的同志中，有人写信给中央，要求同中央一起转移。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我也舍不得同志们啊！这时，主席幽默地说，我毛泽东离开陕北时，把所有干部都通通带走，将来到了华北，走时又把全部人员都带走。如果这样毛泽东越带人越多，走到哪

里都带到哪里，这像话吗？（说到这里，把大家都说笑了。） 毛主席还说，陕北是个好地方，这里还是模范解放区，中央走后，还要把这里建设得更好。西北局和边区政府的林老（伯渠）、彭老总、贺老总、仲勋同志都欢迎留下来的同志，共同解放大西北，建设大西北。 这时，林老带头鼓掌，热烈欢迎“亚洲部”的一部分同志留在陕北。

我回到群众报社后，马上召开了一个欢迎大全，传达了毛主席的讲话，欢迎“亚洲部”留下来的同志们。留下来的几十位同志中，记得有林朗、丁济沧、张潮、普金，莫艾、李蕴辉、田方、马沛文、冯森龄、刘漠冰等人。群众报社一下增加了这样一大批富有新闻工作经验的同志，这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这不仅为以后办好延安群众报和西安群众日报增强了主力军，而且对以后增强西北五省的新闻队伍也发挥了巨大作用。这时，西北人民解放军已经挺进到大关中，裁断了西兰公路，蒋介石、胡宗南十分恐慌，赶快把驻守延安的军队调来解救西安之危。眼看延安就要回到人民手中了。1948年3月，我由新华社西北分社回到霍家坪时，边区群众报早在三个月前，也就是1948年的1月时已经改为《群众日报》。西北局决定我不再去前线分社，留在后方，主持群众日报的业务工作，准备回延安办报。 这一年来，我虽然从前线回报社看过几次，却都是像回娘家一样，时间很短。这次回来，才比较具体地了解报社同志在这一年来的战斗历程，报社同志们的工作和生活十分艰苦，也十分英勇。从撤出延安到回到延安这一年，报社的同志们承担了三项任务，这三项工作各自独立又紧密相联。边区群众报社坚持出报，由杜桴生、金照、林朗负责，随同我到新华社西北前线部分社的记者跟随西北人民解放军总部采访写作，出版《新闻简报》，在全边区组织通讯网，对新华总社发稿，也对报社发稿；边区新华书店，为报纸的出版和发行服务，同时印刷发行一些宣传品和书籍，由陶西镛同志负责。在战争中，书店的同志们走到哪里，只要有一点停留的时间，就把书籍从马背上卸下来，摆开地摊，

向群众售书、做宣传。同志们的革命热情，像一团火一样，照亮了群众的心。

在这一年当中，报社同志在十分困难的环境中，紧紧跟随西北局在陕北“打游击”，不管条件多么困难，无论是油印、石印或者脚踏式的铅印；无论用的是马兰纸、麻纸或者晋恒纸；无论出八开两小版、四开两版或者对开四版，始终坚持这支新闻队伍在保卫延安战中所表现出来的顽强的战斗意志。看一看下面这些文字短小的简单记载，就更具体地了解到群众报社这一年的战斗历程，是令人为之惊叹的。

1947年3月18日晚10点，报社五六十人，带着一台油印机离开延安。19日中午到达安塞县的真武洞，20日进驻附近的朱寨河村。我们是西北局机关的一部分，代号是五大队十二中队。4月11日到19日，出版了六期试刊的油印报。4月21日正式出版了油印的《边区群众报》，四开两张，单面印刷。当时的印刷厂是四人的油印组，在半个破窑内，用玉米秆挡挡风雨。油印组的同志手冻麻木了，仍然坚持工作；油墨冻了不能印，只好烤一烤。刻写一张蜡纸只能印几百份，以后发报的份数不断增加，只好再刻写一张蜡纸。出一期报纸，弄得大家精疲力尽。同志们一面出油印报，一面派人去搞机器。5月，从敌我争夺的地区，从我们原来的“备战点”，经过百般辛苦，秘密运回一部石印机和一些纸张油墨。5月12日，油印报改为石印报。报社人员在朱寨河住了72天。5月31日，敌情紧张，大家经过两天两夜的急行军，于6月2日到达安塞县东北的子洲县，在（三）皇峁镇安营扎寨。先出版了三期油印报。6月6日石印机也从朱寨河运到，报纸又恢复为石印版。经过八天的艰苦努力，同志们又从延安的山沟里，运回一部对开的脚踏园盘机。从6月13日起，《边区群众报》正式改为对开四版的铅印报。这时，报社又有了自己的印刷厂有石印机，又有铅印和六副排字架。当时印刷厂铅字不全，临时手刻也赶不上用，只好用其他字号的

字或者同音字来代替。这样印出来的报大小字都有，还有一些“黑屁股”（即缺字的黑空）。可是这毕竟是我们在战争中建立起来的印刷厂，是战火中编印出来的报纸呀！看起来模样不大好看，可是读者得到这张报，仍然如获至宝，争相传阅。在（三）皇峁镇住了六十天。8月2日，又转移到绥德县义和镇的豆子沟。在这里只出版了两期油印报。由于敌军接近绥德城，敌情紧急，报社人员只好东渡黄河，在山西临县的碛口镇侯家台村住下来。这里是晋绥解放区比较稳定的后方，我们在这里不仅继续出版《边区群众报》，还由柯蓝、李季、闻捷、石鲁等同志组成了副刊组，编辑出版了一份专门刊登通俗化文艺作品的32开小册子《群众周报》。这四位同志在全国解放以后，都成为全国闻名的大作家、大画家、大诗人。

1947年11月1日，报社编辑部又西渡黄河，回到绥德义合镇的霍家坪村，直到1948年5月15日，才全部返回延安。沙家店大捷以后，我军节节胜利，敌军节节败退 ，霍家坪成了最稳固的后方，报社编辑出版人员在这里住了半年。工作和生活条件还是很艰苦的。印刷厂设在没有门窗的羊圈里，印刷机没有动力，靠几个年轻人手摇。排字房常常冷得像冻窖一样，排字工人还是坚持把一个一个冰凉的铅字钉拣出来排成文章，排成报版，每天出四版报纸非常辛苦。解放军打了大胜仗，还要赶着出号外，真是整天整夜加班工作。 就在这样紧张艰苦的工作条件下，报社同志仍然努力做好各项联系群众的工作。大家热情地帮助群众除草收割，拉碾推磨，担水铡草，扫街扫院，教群众读报认字，在墙上写标语、画宣传画。这年（1948年）春节时，报社还组织了宣传队，跳秧歌、演小戏，给烈军属拜年，走村串户，把周围几十里的村庄都带动起来，十分红火热闹。三四十年后，霍家坪的老年人还说，咱这山沟沟里，从古到今，再没有像群众报在时那样热火朝天。

1948年1月10日，《边区群众报》改为《群众日报》，就是在霍家

坪的时候 。沙家店大捷以后，边区的敌我形势开始发生质的变化，我们由劣势转为优势。一方面是后方比较稳固了，印刷条件好多了，可以放开胆子出报了；另一方面，眼看延安就要收复了，正式出日报，早作具体准备，早日进行实际练兵。在改为日报之前，我们请毛主席为日报写一个新报头。毛主席很高兴，马上拿起笔写了四幅“群众日报”，他看了看，自己圈了一个，说这个好。我们就是用这幅字，请印刷厂长曹国兴（边区特等劳动模范）在一块版上刻成新的报头。在我回到霍家坪仅仅一个月，4月21日，延安就光复了。从我们在1947年3月18日撤出延安算起，仅仅一年零三天，胡宗南和他的残兵败将就滚出了延安。 收复延安以后，先由副社长杜桴生带领一支先遣队回延安筹备出报，我留在霍家坪继续天天出报。等到延安已经出版了十五天的试刊，工作正常以后，霍家坪才停止出报。编辑部在霍家坪住了七个多月，大家依依不舍地告别了霍家坪父老兄弟，全班人马回到清凉山，结束了一年来在战争中坚持出报的游击生涯。

回到延安一看，旧居已被敌人破坏得体无完虞。解放日报和群众报在清凉山工作的地方，几乎成了一片废墟。社长博古和总编辑陆定一同志住的几孔窑洞全部捣烂了。编辑部的两排石窑洞门窗全砸破了，好在拱门和拱墙还没有完全倒塌。我们先把这些修补好。可是一张桌子、一个凳子也没有。驻延安地区的记者从延安专署办公室要来几张桌子和几把木椅，编辑部工作又运转起来了。原来的印刷厂设在千佛崖的石洞里，敌人难于破坏，我们把机器搬来，就可以开动机器印报了。 最令人痛心的，是我们走时掩埋起来的报纸合订本、图书资料和印刷器材，完全被敌人挖走了。

从报纸创刊到撤出延安的七年零二十二天中，《边区群众报》共出版了三百六十三期，全部不见了（平均每期发行八千份）。八十年代，我同陕西日报的同志共同设法在全国各地图书馆寻找这三百六十三期报纸，结果只找到零零散散的一小部分，希望将来能够

一张不少地搜集到整套报纸。5月15日，我们全部人马离开霍家坪，经过三天的行军，十八日晚上回到延安。在离开延安的一年时间里，除了尽可能地每天出版《新闻简报》以外，《边区群众报》不定期地共出版了192期，四八年元月改为《群众日报》后，在霍家坪还出版了四个月的日报。这中间还出版了五期三十二开本的大众化的《群众周刊》。

离开延安时报社只有五六十人，回到延安时，已发展成近二百人的队伍，主要是解放日报社和新华总社留下了一部分同志，从边区各地又陆续调来了一些人，我们的队伍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大大增强了。

回到延安以后，大家仍然像行军时一样，把破坏了的土窑洞打扫一下，地上铺一点草，就是安身之地，大家一心一意地投入了出版报纸的工作。正如毛主席说的，人是世间最宝贵的，有了人就有了一切。我们继续发扬自己动手克服困难的精神，把机器修复起来，又千辛万苦地到新解放区去采办纸张油墨等印刷物资。至于办公用具和门窗、床板、桌凳，都是因陋就简，自己制作。当然既不可能从市场买到，也不可能从什么地方去调拨，只能就地取材，自己动手。大家既是木匠，也是泥水匠，人人变成了能工巧匠，真是神了，好像要什么有什么，但这不是念念有词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绞脑汁、沥心血、出大力，制造出来的。我们还自己动手种菜、养猪、做豆腐……，生活在改善，工作也日趋正常了。 一年当中，我虽然始终在前线，却没有拿过枪去冲锋陷阵，但我仍然受到战火的洗礼。火与血锻炼了我，仇和爱磨炼了我。正义终于摧毁了正义的践踏者，人民终于战胜了人民的叛逆者。我这个文弱书生，身体锻炼得更能吃苦耐劳，头脑锻炼得更加能够明辨是非。

老实说，在这场战争的初期，我的“必胜信心”并不那么“十分坚强”。在我军主动撤离延安时，虽肯定相信一定会回来，但没有想

到会这样快。对于解放全中国，原来以为会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根本没有想到在八年抗战以后，仅仅用三四年的时间就全面胜利了。重新回到清凉山以后，我心里所琢磨的和同志们所探讨的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我们为什么能这样快得到这样伟大的胜利？ 一年来延安保卫战的节节胜利，给我最大的教益，就是使我从理论和实践的密切结合上，更深切地认识到我们党的新民主主义政治纲领的英明正确，也更深切地体会到这一纲领确实是日益深入人心的。一场战争和一个党的胜败，决定于人心的向背，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1947年秋，解放军发起全面大反攻时，党中央发表了一个“双十宣言”，对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政治纲领又作了一次阐明：“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 、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就是我们人民解放军的、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最基本的政治纲领，就是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政治纲领。 我们把国民党反动派政府的政治纲领概括为“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的独裁专制，因为蒋介石效法的是希特勒那一套，人们都称为法西斯主义的政治纲领。所以，人心的向背，就是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深入人心，国民党的法西斯主义丧失人心。 面对国民党先安内后攘外方针的失败以后，又积极推行反共内战和独裁专制的反动方针，对我们这些革命知识青年来说，当然更热烈地拥护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对广大的人民群众来说，他们更需要从切身的体验中来加深认识。在这次反共内战中，人民群众面对国民党军队的烧杀抢掠，地方官员的敲诈勒索，高官要员的贪赃枉法，腐化堕落，无数血泪斑斑的惨痛事件大大增加了对国民党、中央军的仇恨，也大大增加了对共产党、解放军的热爱。这也是我一年来耳闻目睹、亲身体验到的。人民的爱憎感染了我，教育了我，坚定了我的信念。

老实说，回到清凉山时，我已经是有十年党龄的共产党员，但我

对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还是了解得很肤浅，我心目中的社会主义，实际上就是当时毛主席一再阐明的新民主主义。面对清凉山的一片废墟，我们没有气馁，没有畏难，仍然意气风发地开始了新的战斗。我们党的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坚定了我的信心：中国人民很快就会“打败蒋介石，解放全中国。”正如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的最后说：“新中国航船的桅顶冒出地平线了，我们应该拍手欢迎它！”站在清凉山上，我似乎已经很清晰地看见新中国航船的桅顶了！我不仅拍手欢迎它，而且更要加紧努力，促使它早日完全升出地平线！

原载《胡绩伟自述(三十三)》

（作者 胡绩伟，四川威远人，（1916—2012），华西大学数学系、四川大学经济系肄业。1936年参与组织成都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任队部宣传委员。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成都《星芒报》、《通俗文艺》主编兼《四川日报》编辑，陕甘宁边区《边区群众报》总编辑，《解放日报》采访通讯部主任兼新华通讯社西北前线分社社长。1949年后，任延安《群众日报》总编辑、副社长兼新华社西北总分社和西北人民广播电台总编辑。1952年后，历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总编辑、社长，是第六、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第二届主席团成员，首都新闻学会会长，全国新闻学会联合会会长。是中共八大、十一大、十二大代表，第三、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六、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胡绩伟调全国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担任副主任委员，1990年3月14日被撤销这一职务。1990年3月，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免去其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职务。）

王黎明：《艳红的青春旗——延安中学毛泽东青年团》

美国精良武器装备的蒋介石30万大军，在胡宗南指挥下云集在延安南大门一线，正是弩张待发的时刻；

被誉为保卫党中央近卫军的西北野战军的一部分，也正严阵以待，迎战敌人突然袭击延安。

在延安东郊桥儿沟的延安中学校园里，一个20世纪40年代中国先进的青年学生组织在时代的风暴中诞生了，同学们自己命名为：延安中学毛泽东青年团。

“我们的团，是毛泽东旗帜下的积极进步的青年组织，为团结一切思想进步的青年，共同努力把工作做好，并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努力向毛泽东指引的方向迈进……为了完成人民革命事业而奋斗……”

这是我们的《团纲》中的首语，它旗帜鲜明，它表明了我们青年团以“毛泽东”命名的重大意义和崇高远大的理想。

1946年12月9日，桥儿沟东山腰前岭拐渠作为校部会议室的大土窑洞里，正中悬挂着毛主席像，四周墙上贴满了团员们书写的各人的贺词、祝词、他们的心愿与感想，一派庄严、隆重、热烈的气氛。“12·9”的火炬，这时在我们立志要将自己的热血和生命献给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的青少年们心中熊熊燃烧着。我们一致通过了团章，站在毛主席像前宣誓：

“我们毛泽东青年团团员，誓为毛泽东革命事业奋斗到底……我们……在团内过着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生活，为团积极工作，把自己锻炼成为毛泽东旗帜下的坚强不屈的战士……若在行动上违反了我们的诺言，我们愿受团纪的一切处分。”

铿锵之声，飞出窑洞，好似严寒中的一声春雷，震撼着黄土高原的冬野。

我们这批宣誓的队列里，有继承父志的烈士遗孤，有老一辈革命家的子女，他们是这支队伍中的前哨兵。

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厅长、原延安大学校长江隆基，满腔热忱地祝贺毛泽东青年团的成立。他的一席讲话，将先辈们青年时代的革命生涯同我们这一代青年学生的前进道路联系起来，构成了一幅中国青年运动的壮丽画卷。他说："当我们这一辈还是青年的时候，就没有你们今天这样幸福。那时，马列主义理论还没有发展得像今天这样深入、普遍，又比较缺乏导师，所以虽有热情，有理想，也难以实现。我在学校时，曾和几个同学组织了一个青年励进社。可是，我们一毕业，也就烟消云散。这说明没有正确的途径，就不会成功。你们今天比上一辈人幸福，有毛泽东同志的指引，有党中央开辟的道路。

毛泽东青年团今天正式成立了。这是中国青年革命运动史上的又一个盛典，对解放区的青年运动，对全国的青年运动，都有着重大的意义和影响。它将在挽救民族危机的斗争中发挥作用。当前，毛泽东青年团的神圣使命是：积极投身到保卫延安、保卫毛主席的战争准备工作中去……"

我们背负起这个神圣的历史使命前进……

在"不给胡匪军留下一粒粮、一寸布"的口号下，团员们首先积极投入了延安的坚壁清野工作。学校把教学用具、粮食等各种物资转移到后方或埋藏在山洞里。团员们不怕苦，不怕累，自动背运东西到安塞县吊儿沟和离学校不远的一些村庄，他们带动其他同学，迅速地完成了任务。鲍克明同志是六班年纪最小的团员，只有14岁。他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中，也和大同学一样，背着一张课桌送到20里以外的捻庄隐藏。往返整整一夜，他累得满头大汗。同学们赞扬说："鲍

克明背东西，顶一个大人。”后来他参加了第四野战医院后，主动要求当通讯员，也总是不管白天黑夜，刮风下雨，情况艰险，都勇敢负责地完成了任务。

这时，军事训练替代了往日的数理化课程。打靶、射击、投手榴弹，轻装演习等，成为每个同学的必修课程。团员当然义不容辞地要以身作则。六班17岁的团员李凡民在打靶比赛中名列榜首。女团员杜芳枝也打中9环。十二班团支部书记韩秉义和同学们一到驻地，就利用间隙时间带动同学架起单杠，锻炼身体。六班每天晚饭后，大都进行练习瞄准、刺杀、投弹等活动。

我们毛泽东青年团员，在保卫毛主席的战斗里发挥了自己应有的作用。

1947年3月，学校改建为战时第四后方医院，全校三分之二的团员，报名参加了医院，踊跃为前线服务。3月15日，成立了医院团总支，也是人民解放军的第一个团组织。苏红同志在医院担任团总支书记有两年多之久。团员王涛英最后英勇牺牲在抗美援朝前线。十三班的团员高耶夫，50年代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工作，救死扶伤，曾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到了80年代，他年过五旬，还毅然到云南边疆老山前线野战医院工作，又一次受到部队官兵的热烈赞扬，报刊、电台、电视台报道了他的先进事迹。团员中干部子弟很多，但他们都能严格要求自己，以著名的白衣战士李兰丁为典范。15岁的小团员齐翔安，是著名学者齐燕铭的女儿，体弱多病，有时发着高烧还坚持在重病房工作，给重伤员喂饭、换药；有时还背着重伤员上厕所。后来她患了伤寒、回归热，她宁肯躺在担架上随军转移，待病愈后护理伤员，也不肯到后方去休养。为了提高医疗技术，她抓住一切机会学习，在行军中，她和另一位女团员李骏，每人拿着一块死人骨头，边走边互相问答，熟记解剖学的名称。休息时，她们用树枝在地上画着、写着做练习。每次考试她们都名列前茅。

在最初试建青年团和正式建团以后，我们始终强调团员必须响应党的号召，在各方面发挥模范作用，密切联系群众，保证学校各项任务的顺利完成；团员们都要在实际斗争中锻炼自己，提高自己。我们一直注意加强团的思想建设，巩固团的组织。延中青年团员们实现了自己入团的誓言，为团组织争得了荣誉，同时赢得了群众的信任，提高了团的战斗力，我们真正成为党的得力助手和可靠的后备军。

努力学习是青年团员的首要任务。团员不仅自己积极参加文化与时事政策的学习，而且要带动同学们一起努力学习。

例如六班有一个同学平日比较调皮，不爱学习，团小组就分配团员李夫星帮助他。他们经常一起生活谈心，打消了他只埋怨别人帮助不够的想法，后又指出他的毛病，并为他指出了改正的方法。经过两个月的耐心帮助，他做了深刻的自我反省。他说："我今后决心改正自己的缺点，愿意加入青年团。"

后来他积极参加学习，进步很快。他到西北第四野战医院去做护理工作时，工作积极负责，并且当了护理班长。这时他参加了青年团。二十班同学呼延福，入团后不仅对自己的学习抓得很紧，而且经常和同学在一起研究，相互帮助，使他们的小组成为全班的模范学习小组，带动了全班。在加强战备教育，突出时事政治学习中，团员们个个情绪振奋，踊跃发言。原来有些不看报纸，不爱参加政治学习的同学，在团员们的影响下，也天天看报，关心政治大事了。

建团过程中，我们始终很重视团员的思想教育，把它放在首位。开始主要抓了共产主义理想的教育与团员应起模范作用的教育。后来又抓了关于形势与任务的教育，抓了时事政策学习，坚定战争必胜信心的教育，还抓了行军中的纪律教育。先后请冯文彬、范长江、卢勤良、贾芝等同志作报告，这些报告受到大家欢迎。女同学还请了三五九旅参加过中原突围的女干部汪志平同志，讲他们是怎样突围的，特别是她自己是怎样闯过渡河、爬山、同敌人打遭遇战等一个个

难关的动人事迹。在抗议美军暴行的活动中，团总支召开了女生座谈会。女团员们从抗议美军暴行联系到妇女的解放问题。美军可以任意蹂躏中国妇女而逍遥法外；相比之下，她们感到边区妇女是受尊重的，切身体会到妇女的权利受到保护的幸福。但就全世界说，妇女的解放仍然是一个长久才能解决的大问题。座谈会不仅对女同学，对全体同学都是一堂深刻的政治课。

在团内，我们表扬好人好事，批评一些歪风邪气。例如有的团员在行军中，发脾气，打人，甚至强拉了老乡的毛驴，骂老乡，影响很坏。团支部对此给予了严厉的批评，对个别情节严重的还给了警告处分。

团员在战时宣传中十分活跃。延中宣传队演员四十多人，其中不少人是团员。宣传队演出的主要节目有《战斗舞》、《石头开花》和《女游击队员》。1946年12月到1947年2月，在延安、安塞演出数十场，观众达1万多人。他们的演出受到了群众的热烈欢迎。那年，西北文工团、民众剧团等专业文艺团体都到外地演出，延中秧歌队，一时间成为延安最活跃的秧歌队了。

根据上级号召，团员们所到之处还经常向群众宣传时事政策，帮助当地群众识字和生产，并进行农村调查，开展群众工作。例如，学校住在安塞吊儿沟时，政治课老师贾芝与语文课老师宁汉戈合作带领同学们下乡，教农村儿童识字，调查陕北革命领袖刘志丹的事迹，宣传时事政策。在这些活动中，起带头作用的仍然是团员们。他们刚到农村时，老乡有顾虑，不乐意让娃娃们学识字，一些同学见此情况有些灰心丧气。但团员郭韬等同学并不气馁，而是设法接近老乡，帮助他们干活，后来人熟了，老乡终于改变了对他们的态度，欢迎同学们到他们家里来。参加识字的娃娃，从两三个增加到二十多个，甚至大人也要求办夜校了。一个多月之后，这些娃娃们都能认识200～300字了，群众非常高兴。

二十六班的五个团员由于经常帮助同学，团结同学，与群众关系密切，威信提高，在选班学生会时，五个团员全被选为委员，形成了全班的领导核心。在他们的带动下，五天的生产突击，收获棉花22斤，达到全校生产的最高纪录。

为了推动团的工作，加强思想教育，加强时事政策和政治理论的学习，在团成立大会后，很快就创办了油印的、不定期的团刊《团内生活》，每期印几十份。1946年12月23日出版第一期，到1947年11月，共出了13期。它是团员们自由论述、民主讨论的园地，也是团总支与团员和群众联系的纽带。团刊由苏红、王黎明、张珍、鲍克明等同志负责编印。

当时全解放区从中央青委到基层团组织主办的团刊共9种，《团内生活》是其中之一。这个团刊内容包括批评团内的缺点错误，表扬各种先进模范行动，政治学习讨论，对指导、推动团的工作和提高团员的觉悟，发挥了很好的作用。我们请贾芝老师在《团内生活》第一期上发表了一篇短文，题为《谈进步》，对团员们提出三点建议：一、做事要切实际；二、要富有朝气；三、要与工农兵相结合。这篇文章受到了团员们的欢迎。

团刚成立时，强调“巩固自己，建立团的威信”。但因怕团员的质量低了影响团的威信，对积极分子要求过高，加上当时处于紧张的战争环境，人员变动频繁，对发展团员的工作一度有些忽略。从成立到1947年3月15日，3个月才发展了12名团员。新班和地干班100多个同学，连一个团员也没有。团总支发现这个情况以后，立刻发布通知，强调应重视发展团员，克服关门主义。同时，高鸿文同志专程去安塞县吊儿沟，帮助新班和地干班发展团员。从此，各班都抓紧了发展工作，使团的队伍不断壮大。从3月到7月发展新团员二十多名，新班和地干班也建立了团支部。到7月，学校和医院的团员已达到122名，团有了很大的发展。

1947年7月初，学校和医院都转移到子洲县马蹄沟一带，院、校两个团总支总结了成立7个月的工作，由我写出了一份书面总结，经贾芝、康勃老师修改后，苏红等同志刻印出来分发各支部，并报中央青委，同时在党团员大会上作了报告。从此，青年团的工作走上了健康发展、不断壮大的道路。

延中青年团，作为建团的学校试点，不只为解放区学校建团提供了有益的经验，而且也培养了一批干部。1949年，延属分区就有三个团县委书记是延中的团员和建团工作者。苏红、鲍克明、王升学、张三保等同志，先后在学校、农村、工厂、部队、机关和陕北区团委、团中央从事建团工作，对建团做出了贡献。

转瞬之间，45年过去了。当年的这批青年团员和建团工作者，现在多数已是五六十岁的中老年人了。有的已经离休，有的还战斗在祖国四化建设的各条战线上，成为各行各业的专家和各级领导干部。例如：陕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力贞，海南省常务副省长鲍克明，核工业部三局局长王升学，原《外国戏剧》主编苏红，原法律出版社党委副书记韩秉义，陕西省渭南地区行署副专员刘凤鸣，人民文学出版社纪委书记张三保，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员李凡民，中国科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药学会副秘书长李骏，北京宣武医院党委书记齐翔安同志等等。

延中一年多的建团工作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与美好的记忆，这是永远难以忘怀的。

1947年冬到1948年春，我曾在米脂县印斗区六乡土改工作组任组长，在工作中认真执行政策，未发生大的差错，把土改和农业生产结合起来进行，取得了较好的成绩。边区《群众日报》在1948年5月报道过该乡的工作。可以说，这与我当年在青年团和学生会工作中的锻炼是分不开的。如果没有这些在校的学习和开始做领导工作的锻炼，一个19岁的青年学生担任一个乡的土改组织工作，恐怕是很难胜任的。

1991年6月19日

原载贾芝主编，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延安儿女》第253—263页。

（作者 王黎明，曾用名王利民，延中十二班学生，延中党总支干事，青年团总支书记。全国解放后在轻工业部北京家用电器研究所任党委副书记、顾问。高级经济师。）

雷根善：《转战三千里》（节选）

内战开始了，胡宗南23万余大军逼进延安，1947年3月19日这一天，党中央放弃了延安，转战南北，在边区政府的率领下，保小随部队转移。

在转战誓师大会上，全体少先队员唱起了激扬的保小校歌：

我们是边区的小朋友，
我们是革命的后备军。
今天我们在战斗中学习，
明天为国效力。
为了自由，为了解放，
我们努力学习，勤奋地学习，
现在是边区的小学生，
将来的中华主人。
同学们，亲爱团结地携起手来，
新社会等待我们来建立！
根善精神焕发指挥大家唱校歌。
……

同学们在领导和老师的带领下，井然有序踏上了征途。保小100多人转战晋冀豫根据地，300多人跟着部队转移。随军转移中，300多学生，大的十几岁，小的六七岁，一路上军队根据敌情信息前进，后退，上山，入川，保小学生也随军队转来转去。从白家坪到志丹县途中一个村庄时，天色已晚，学校通知说敌人要到村里来。于是，大家分散在群众家里藏起来。根善被安排在一位老妈妈家里，老妈妈让根善脱去外衣睡在炕上，告诉他敌人来了就说是她的娃，不敢胡说。老妈妈用棉被蒙住根善的头，根善静静地躺在被子里。过了半个多小时后，根善听到沟里响起了枪声，并夹杂着乱纷纷的嘈杂声，渐渐的声音远去了。第二天，得知敌人是从沟里过去的，没有进老乡家。大家侥幸从敌人眼皮底下躲过了。根善老人动情地说，他至今记着那位妈妈，永远不会忘记那位革命的老妈妈，他感激的心情一直揣了几十年。

在转移过程中，根善和另外两个同学是先遣兵，在前面探路，为大家安排生活吃住问题。

一天，转移到雷嘴河，根善带两名队员执勤，中午时分，突然发现远处有人行色匆忙，专走偏僻之处。根善马上警惕起来，他吩咐两名队员立即隐蔽，三双眼睛一动不动盯着对方。不大一会儿，对方来了，他们三个人豁地蹦出去，吓得对方倒退了几步。根善问："你从哪里来？干什么去？"对方回答说："老婆病了，抓点药。"

根善问："有路条没有？"

对方结结巴巴说："有，有路条。"

两位队员不约而同地说："让我们看看。"

对方摸了摸衣兜："好，你们检查检查。"

他乱摸了一阵，笑嘻嘻地说："哎呀，我这个人真是个马大哈，路条开下忘记带了。三位小兄弟，学个好放我过吧。"

根善说："不行！跟我们到政府去。"

对方说："方便方便嘛，小兄弟，老婆病了，还等我抓药，我要

抓药去。

根善问："你媳妇得了什么病？"

对方指了指胸口说："心口子疼。就像刀子捅上一样，放开声嚎哩。"

根善说："我们跟你去抓药，怎么样？"

对方连忙说："不行，不行，这样多不方便。"

一名队员见对方躲躲闪闪，高声说："那咱们一块取路条去。"

对方急了："何必脱裤子放屁多到手续。我就求求你们，下次我一定带路条，再把这次的也补上。"

根善厉声说："你别装蒜了，我们早看出你不是个规矩人。"

另外一名队员说："就是，你骗不了我们。"

对方一下子慌了说："你们说话要负责任，别冤枉好人。"

根善也来气了说："好人坏人到政府会弄清楚的。"

对方一听笑嘻嘻："好几位革命兄弟。"

他掏出几块银元递过来说："这点小意思请你们收下，放我过去吧，以后见面再多给你们。"

根善大声斥责："收起你的鬼把戏，你这一套只能对国民党反动派有效，我们共产党决不买你的账。"

一名队员说："你想得太美了！"另一个队员猛地将银元打在地上，对方就势跪下连忙捡起银元，头上大汗淋漓，在根善面前瘫软了下来。

根善他们把对方押到政府，交给了治安审查，来人是个大烟贩子，从腰里搜出好几包大烟和数十块银元。在证据面前，这个不法分子低头认罪。

保小辗转到志丹县后，便成了行军的第一驿站。保小在此地做了短暂停留，认真检查了同学们的行军情况。他们首次走这么远的路，敌人追击，辛苦程度可想而知，但是没有一个人掉队，大家群情振

奋，满怀必胜信心要和敌人周旋到底。

晚上，学校领导整顿了队伍。教导主任韩作黎对根善说："根善同学，经学校研究决定，根据你的学业和工作表现及形势需要，你可以升学了，你是延安中学的学生了。"

根善问："韩主任，咱们主要是行军吗！"

韩作黎严肃地说："军也要行，课也要上，行军上课两不误。"

根善一个立正："是，韩主任。我坚决服从学校的安排。"

他又问："那我的工作有没有变动？"

韩作黎一板一眼地说："没有。你仍然做少队干部的工作，只是学校的变化，行军打前站还是你的本职。"

根善回答道："我明白了，韩主任。"

转战途中，根善主要负责班里的生活和打前站工作，他背着被卷，腰间挂着手榴弹，手里提着一根木棍，整个形象既像一个长途跋涉的少年军人，又像一个沿门乞讨的叫花子，他的棍子很得心应手，一边可以当拐棍拄着走，一边可以当武器探路，根善总是跑在最前面探听敌情，一旦得到准确消息，立即向领导报告，领导择好宿营地，他就领命前去目的地号房子、找吃食、用水等安排同学们的生活事宜，此项工作辛苦危险，如果情况不准确就会发生问题，损失是难以估量的。所以，每到一处他慎而又慎，手中经常攥着两把汗，只待安排妥当才放心。一天，他和崔民来到一个村落，村里杳无音讯，静的出奇。他两悄悄走进一个院子，里面无人，他两壮着胆子进屋了，忽然一阵沙沙沙声，好像柴堆里有人埋伏，他两赶紧躲在门后，又是一阵沙沙沙的响动声，根善给同伴使眼色，让他守好门，自己轻轻走到柴垛前，用棍一阵猛戳，里面什么也没有，他们惊吓的心放松下来，抓紧号房，安排妥当，为大家做好后勤工作。

一路行军，过分劳顿，疲惫不堪。根善有时候变得稀里糊涂，很想睡一个好觉。一次，同学们整整行军一天一晚，初夜时分才赶到宿

营地。过度劳顿，大家没有食欲，只想好好睡觉。根善准备好伙食，同学们不想吃，领导命令大家吃饭，大家胡乱吃了些饭就地睡觉了。根善上厕所时，刚蹲下，眼前一花，昏倒在茅坑，王老师发现了，把他扶了起来。还有一次，夏天雨夜间行军在山上的羊肠小道中，怕敌人发现足迹。根善走在前面，小心翼翼探路。几天没睡好，雨刷刷下着，路滑雨大，行走困难，根善一边用棍子探路，一边前进，走路不听使唤，身子一歪，脚下一滑，摔倒了，从山上滚落下去，被一颗大树挡住了，他昏过去。与此同时，老师、同学大声呼叫。

根善被老师救了，同学们围过来看他，校医为他处理皮外伤。

数月跋涉，风餐露宿，安塞、志丹、吴旗、延长、延川、靖边、横山等大大小小的村落无以计算，留下大家的足迹，也留下根善的无限足迹。不一日，他们涉入了毛乌素沙漠南缘，这时天气炎热难当，太阳发疯似得烤着大地黄灿灿的沙子仿佛一片燃烧的烈火，根善和同学们从没见过沙漠，完全被他的浩瀚折服了。金黄色的沙子连绵起伏，渺渺无垠，很少有绿色生命出现，黄风一阵一阵吹来，裹着热浪带着沙粒扑打在他们脸上、身上，跋涉的人儿在大漠边沿上摇摇晃晃行进。根善在前面探路，好不容易看到有人的地方，队伍安息下来，就地用餐，吃了点当地的炒面野菜，又急忙上路了，唯恐定边方面的敌人堵截。他们沿大理河而下，东行数十里到了马蹄沟镇，边区政府就住在这里，根善和同学们便落足于三川口霍家渠村，校部下榻在一霍性地主家。

这里是根善非常难忘的地方，他在对面山上一座龙王庙里加入了共青团。那时的青年团还处于“少年”阶段，在延安时党中央委托冯文彬同志在延中等几所学校开始试办，延中叫“毛泽东青年团”，当时既没有团旗，也没有团徽，但入团仪式不失神圣而庄严。加入青年团是根善梦寐以求的夙愿，党组织宣布批准他为青年团员时，根善激动万分，他的愿望终于实现了，他决心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发挥青

年团的先锋作用。1947年，延中行至山西临县，接上级指示将“毛泽东青年团”改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当时根善已是延中团支部委员，参与起草了团的章程工作。

原载《王燕博客》十岁当了小八路之三

（作者 雷根善，（1932—）陕西富平县人，1942年参加革命，1947年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7年在延安中学、延大附中任学生会主席，1948年在延安大学任青年团总支副书记。新中国成立后，任西安中学学生会主席。1950年在中央团校学习，受到毛主席、朱总司令接见。1951年任西安市委委员，1952年任西安新西北纺织印染公司党委书记(当时西安规模最大企业)。1956—1958年在中央党校任支部副书记，有幸与毛主席、周总理、陈云等中央领导同志合影，聆听周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多次报告。1958年与王秉杰等同志筹建陕西钢厂，任厂党委委员、宣传部长。后任陕西省政府机关团委书记、子洲县县委书记、省供销社副主任、省工业厅副厅长、省食品协会常务副会长(正厅级）、国家食品协会常务理事。）

李树庭：《岳嵩转战陕北》（节选）

1946年夏，国民党反动派以进攻我中原解放区为起点，相继向我华东、华北、东北各解放区展开全面军事行动，受到我解放区军民的沉重打击，其又转而采取重点进攻的策略。向山东解放区进攻，力保中原逐鹿的有利地位；进犯延安，妄图摧毁我革命圣地。

是年冬，敌人进攻延安的迹象已十分明显。按照已往的习惯，岳嵩总是利用节假日，从三边来延安，向边区财政厅汇报或请示工作。这次他也不例外，利用新年的假期来到延安。岳嵩的到来，很快被边

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同志得知，当即责成组织部门将岳嵩留下来，担任边区政府办公厅行政处处长。

此时的延安已笼罩在战前的准备当中，战勤动员工作已扩大到边区参议会、常驻议会议员以及知名民主人士。按照战备的统一要求，机关采取军事化编制，编成许多大队，其转移及一切后勤保障，均由边区行政处负责。也就是说，岳嵩不仅要为整个机关的战略转移操心，而且还要照顾到众多的老人、孩子的行动、吃喝以及驻地的安排。

编在老人队的有常驻议会议员刘培基(刘志丹同志的父亲)，参议会议员“老蒙古”旗海田等，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常驻议会副议长谢觉哉、尚在绥德的副议长安文钦，参议会常委贺连成、霍子乐、霍祝三，杨明轩和晋绥边区的续范亭先生(临时来延安开会)等同志，虽未编进队伍，但也由边区政府行政处负责转移和疏散工作。家属队有边区政府副主席刘景范的夫人李建彤、副秘书长曹力如的夫人田兴、民政厅厅长王子宜的夫人王劲、副厅长唐洪澄的夫人霍其洪、江隆基同志的夫人宋超和刘志丹将军的夫人同桂荣以及她们的子女、老人。共有老幼妇孺近百人。

这两个队的转移工作量是很大的。其中每一个家庭要准备1至2头牲口，除坐人，还要驮一些日常用品。孩子们单独编组，每3个孩子一组，小一点的孩子坐在骡子两边的驮笼里，大一点的孩子骑在骡子的背上，牲口由专人负责。思想工作也是有难度的，有些民主人士还有一些想法，不想和大家一起转移，自己要求找个地方隐藏起来。也有的老人东西很多，想全部带走。这些想法和要求，当时都不符合转移的要求，岳嵩就和各队的负责同志一起，一家一家地动员，一家一家地做思想工作，一家一家地安排，唯恐出现差错。就这样，还有一些老人感到战事不是像说得那样紧张，送走后又返回了原驻地，岳嵩等人又继续做思想工作，直到全部的老人和孩子们撤离。

1947年3月13日，胡宗南督帅20几万大军，由关中地区北犯，大举进攻延安。边区政府机关各单位按部就班地相继撤出，留下少数精干人员，坚守阵地，负责坚壁清野工作，把政府带不走的所有东西全部埋藏起来，并配合部队埋设地雷。

岳嵩指挥边区政府各单位撤退完毕后，带领留下的人员，冒着敌机的轰炸，坚持做后续工作，直到3月18日黄昏，敌人的先头部队进抵延安杜甫川口的七里铺，岳嵩又带领同志们检查了边区政府机关的各个角落，确信无一遗漏，才随政府电台和警卫部队最后撤离延安西关边区政府驻地。

延安城的失陷，敌人得到的只是一座空城。他们气急败坏，遂四处寻机与我军主力决战。但此时，我西北野战军在彭德怀司令员指挥下，避其锋芒，以小部兵力将敌主力诱向延安西北安塞一带，野战军主力则埋伏在延安以东的青化贬，痛歼敌31旅3000余人。

接着我军又在羊马河、蟠龙镇全歼敌两个整旅。敌人回马围剿我军。但此时我边区政府已在安塞的真武洞，开完了一个万余军民的祝捷大会，迅速转移到子洲县的马蹄沟过上了安稳的日子。

边区政府办公厅就住在西北局机关（应该是边区政府，编者注）对面的半山坡上，下面临川道的院落里，分别给老人队和家属队居住。岳嵩可是个大忙人，白天在机关办公，下晚还要到各位老人和家属们的家里去看一看，问寒问暖。

一天，岳嵩来到刘培基老人家，只见从里面走出一位清秀的姑娘。她一看见岳嵩，显得格外兴奋，老人出来后，她与老人耳语了几句。刘老说："岳，这是小女刘荣，在三边人民代表大会上听过你作的报告，对你印象很深，她调皮得很，你以后要多帮助她啊！"岳嵩听后，忙不迭由衷地说："刘荣同志我认识，她是三边人民代表大会年龄最小的妇女代表，很引人注目。"岳嵩的一席话，使刘培基老人很高兴。此时刘老太太听说岳处长来了，连忙走出窑洞，把岳嵩让到屋里。

是时，刘荣已在延属分区党校学习，她随学校先期离开延安，疏散到安塞，又到志丹县。蟠龙镇战役后，也来到这里，住在离此不远的一条山沟里。好在战时学习不太紧张，她经常请假来看望二位老人。

自刘荣认识了岳嵩，不知怎的，总愿意以借看望二位老人或二哥刘景范的名义，到岳嵩处坐一坐，提出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让岳嵩向她解答。谈话中，刘荣了解到岳嵩家庭贫苦，从小孤苦零仃，特别是知道了岳嵩参加革命的艰险历程，在心中由然地产生了敬意。此时的刘荣还比较天真，完全把岳嵩当成自己的兄长对待。时间一长，岳嵩也十分关注这位小妹妹了，经常询问她的学习，她的工作，以及她的生活情况。

8月中旬，西北野战军作了打大仗的准备，边区机关和各后勤部门，奉命陆续由马蹄沟转移到绥德义合北边一带待命，准备东渡黄河。此举主要是麻痹敌人，敌果然中计，误认我军要败退山西，遂下令“迅速追击，勿失千载良机”，并封锁黄河，利用飞机日夜进行袭扰轰炸。

边区政府各机关东渡黄河，还有另外的任务，即参加晋绥地区的土地改革试点工作，为以后开展新区的工作总结经验。

原载黄陵地情网黄陵人物：曾在黄陵任职的领导干部之

岳嵩转战陕北

（岳嵩（1916—1992）江苏省扬州市人，1938年6月参加革命工作，同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任陕甘宁边区光华商店副经理、经理，1941年任陕甘宁边区银行三边分行行长，三边贸易分局长，三边分区财经管理处副处长。1944年任三边分区专员公署二科(即财政科)科长兼缉私队长。1946年任边区政府办公厅行政处处长。1948年起任陕西省黄陵县县委书记兼县长、宝鸡县县长，国家内务部办公厅副主任、

机关党委副书记、移民局局长等职务。1979年起，先后担任民政部城市福利司司长、副部长、党组成员，中纪委特邀检查员。）

刘玉兰：《我心中的二哥》

我叫刘玉兰，是刘景范的八妹，已经退休十多年了，原单位是陕西发改委。今天纪念我二哥思绪万千，心情难以平静，不知道该说啥好，我大哥和我二哥都是咱们陕西最早发动革命的创造者；大哥不幸早年战死沙场，给我父母和家人留下一生难以忘记的痛楚，我二哥继承大哥的遗志，前仆后继，扛起革命的大旗，继续奋斗，然而他也是一生坎坷的经历，一生坚持不懈的努力，每次受打击受挫折，让家人难以理解，无限的痛心，往往认为他一生的奋斗，一生的努力，好像没被理解和接受，很冤屈。今天大家开这个研讨会正是对他一生努力奋斗的重新认识和评价，对他还一个公正、一个清白。对亲人们也是一个宽慰，遗憾的是这一切他都不知道。

二哥名景范字子忠，小名宝生子，陕西省保安县（今志丹县）金鼎楼子沟（芦子沟）人。生于1910年09月04日，自幼聪慧好学，刚毅勤奋，在祖父刘士杰和父亲刘培基的教诲下，识字读书，写字画画，长大后练得一手好毛笔字，无师自通水墨画，尤其是画梅花刚柔兼美，学木工，刻印章样样出色。10岁那年母亲去世，他一下子长大了，主动帮家里干活上山砍柴，割草喂牲口。爱读书手不释卷，走到哪里都不忘读书学习，12岁下地上山干庄稼活，除草、播种、收割、打场、扬场，往家背粮食口袋，样样在行。16岁扶犁耕地，成为家中主要劳动力，是父亲的主要帮手。从小干活不惜力，不偷懒，深得祖父、父亲的疼爱。一大家十几口人张嘴要吃饭，心疼他也无法让他不去受苦。

1921年大哥上榆中后，受共产党先进思想影响，广读革命理论

书籍和先进刊物，寒暑假带回来一些刊物，二哥也拿来阅读，对他触动很大：外面的世界真大呀。他如饥似渴的读，明白了许多革命的道理。大哥讲北京、上海等地闹学潮，反对北洋军阀政府的运动。深深地影响了二哥和家人。激发了二哥的思想，向往和大哥一样。他更是努力学习革命理论，动脑筋想问题。

1928年渭华起义失败后，大哥回陕北开展“兵运”工作，搞土地革命，解决农民拥有土地问题。在大哥的影响下，他积极参加革命活动，搞红色游击队，组织当地农民参加游击队，打土豪、分田地、开仓放粮，救济灾民。组织群众斗恶霸地主，土豪劣绅，同反动派地方武装做斗争。在游击队他制定纪律，开展军训，严明纪律。深受老百姓拥护和支持。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担任西北反帝同盟军二支队一大队副大队长，成为一名坚定勇敢的红军战士指挥员、革命者。

二哥出去参加革命，我还没出生，我们相差二十多岁。解放战争开始之前几乎没见过面，1946年冬，社会上已经传开蒋介石要打陕北了。父亲听到这个消息后，很担心，随即让四哥到金汤打听实情，四哥到金汤找到二哥，当时二哥任西北野战军后勤司令，后勤部驻扎金汤，便于筹粮、筹物，保障供给。四哥说明来意，二哥告诉他：你回去告诉父亲他老人家不要担心。毛主席说：蒋介石进攻陕北是坏事，给人民群众带来灾难；也是好事，蒋介石这一做法是他的垂死挣扎；我们军民团结起来，行动起来一定会战胜他，迎接新中国的到来。二哥一席话说的四哥心里亮堂了许多，二哥还说：你回去以后带领家人先到附近深山沟去躲躲，看事态发展再定。依照二哥的说法，父亲决定先到高路湾、郭家畔、庙嘴等处躲藏。后来陕甘宁边区政府决定，我们一家随同陕甘宁边区原政府家属队一起转移，由政府负责。在二哥的关照下一家人于当年五六月份到达子洲马蹄沟，后转移到山西临县坳村。在这一过程中，二哥负责后勤转移、军队供给，时常到各处查看医院伤病员，边区老同志的供给保障，保育员孩子们的行军

情况。有几次到马蹄沟查看，顺便看望父母和家人，我们才有机会见面，有一次他给我和妹妹九娃照了一张相，令我们很是难忘。

延安收复后，机关学校陆续迁回来了，二哥让我们上保安小学。开学时，大嫂同桂荣带我们报了名，父亲的勤务员送我们去杨家岭二保小，这些事情渗透着二哥的关怀，二哥的心血，他一心要把我们培育成有用的人。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他调往北京工作，我们见面的机会少了，1956年暑假我和妹妹上北京看二哥和六姐两家亲人，二哥工作很忙，抽一个星期天，他和二嫂李建彤、孩子们一起上北海公园游玩、划船、照相，后来又到王府井的百货大楼给我们买衣服、鞋袜，从头到脚武装一遍。又带我们上颐和园游玩，介绍颐和园的来历，让我们大长见识。总之这个夏天过的特别有意义，临别时二嫂给我们一把小提琴，让我们练琴学音乐。

二哥从小养成爱学习、好动手的好习惯，在父亲影响下，他自学绘画，尤其喜爱画梅花，像他自己说的“学习梅花的柔美和枝干的钢骨，人也一样刚柔并存。”二哥曾在1958年春天回西安新城大院看母亲和我的弟弟妹妹，他送给母亲一副梅图，母亲一直挂在她的房间墙上。“文革”时我们一大家都不同程度的遭了难。家人四路大散，天南地北到处都有我们家的人。到处都有无尽的思念。打到“四人帮”后，二哥和家人陆陆续续又都返回工作岗位。1978年二哥有一次要到成都，路过西安看望母亲，母亲告诉二哥：家里人过的还可以，你不要操心。唯独玉兰还在商洛，孩子大了，该上学了，看能不能给文瑞（原省委书记马文瑞）说说把她调回来，下放快10年了。现在在解放门汽车站工作，一个大学生快四十岁了，每天引导旅客上车，住没住处，五个人住房不到10平方米，太困难了…。二哥说：家里人的事情我不便说，自己好好工作，争取早日回来。实际上他嘴上这么说，心里放不下。第二天一早到西安解放门汽车站看我们，我当天上午在

蓝田许庙这趟车上跟车售票去了，我的大儿子看见舅舅来了，马上打招呼。二哥问孩子：你妈去哪里了？老大说：“我妈跟车走了。”舅舅说：我想看你妈住的地方。大儿子说：“您等下，我去拿手电。”二哥等在走道外，大儿子拿来手电筒，走在前面给他引路，走廊里黑洞洞。走到我们家，一开门，房子里面更黑。不时从后窗户传来黎明羊肉泡馍馆的腥味和鼓风机声。舅舅感叹：你们咋住呀！大儿子说：“天暖时我们兄弟两个住客车顶上，妈妈和弟弟奶奶住房内，冬天大家挤一起。”晚上我去省委招待所看他，他关心地问：你的工作、生活怎么样？我说，我下放商洛至今八年了，还没回来，组织照顾才让我到解放站临时工作，住处很困难……我一般不想说这些……。二哥说：原来这样，你们受苦了，但我不好说。我理解他工作的原则和心性，他是不会因为家人的事情向组织开口的，我们静等组织上落实政策再回来吧，我不怪他。回想起1945年五姐带她的儿子到延安，想看二哥能给他安排个啥工作，以便母子有个着落，结果二哥让她在难民工厂的被服厂工作，缝制衣服，她工作一段时间后，因为孩子没人管，吃住也困难，无法坚持。后来经人介绍，只好再找人家才安顿下来。

这些事情能看出，他绝不会用手中的权力谋私利，干一辈子革命，搞一辈子建设，大公无私真正做到了权为民所用，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我们家人非常理解他也谅解他，二哥是我们的榜样，我们全家人的榜样，我们永远不忘他，永远怀念他。

原载刘米拉汇编，北京时代弄潮文化发展公司印刷成书的《纪念刘景范同志100周年诞辰座谈会资料汇编》第二十章

（作者 刘玉兰，志丹县人，曾任陕西省发展改革委员会巡视员，是刘志丹的八妹，写有《一个真实的刘志丹家族》等作品。）

薛振和：《绝不能让伤员落在敌人手里》（节选）

1947年3月19日，胡宗南匪军侵占延安。我军在青化砭、羊马河、蟠龙三战三捷之后，我们这些原来延安中学的学生从吊儿沟转移到志丹县古庄科收治伤员。我当时是护士，我和另一个护士冯育劳、军医马五甫三个人是一个医疗小组。.....

晚上到了镰刀湾，这是坐落在延川的一个镇子。我们在这里休息了一夜，次日天一亮就又走，到双山子吃过了饭，便顺着去青杨岔的大路，向东北方向走去。

正当我们在山顶上朝前走时，迎面碰见几个老乡。他们告诉我们前边有敌人，叫我们不要往东走了。我们顺着老乡指的方向看去，果然黄黄的一片在蠕动着（当时胡匪军穿的是黄军服）。我们肯定了那就是敌人，决定调转方向，改为朝后走并加快了步伐，尽最大努力摆脱敌人，决不能让伤员落在敌人手里。

事情偏不随人愿，当我们刚翻过几个山头后，刘银贵突然病了。他恶寒战栗又发高热，疟疾病犯了。怎么办？不走吧，我们还在敌人的眼皮底下；走吧！他发烧41℃，也确实困难。我扶着刘银贵在后边慢慢走，他全身热得像一团火，不住地颤抖，还是脚不停步地向前走。我看着他那艰难的样子，决定在山坡上坐下来休息片刻。刚坐下，他就身不由己地躺下了。躺了片刻，他站起身来说："咱们走吧，前面还有伤员呢。"我们一边走，刘银贵一边在他的衣袋里摸着，终于找到了两颗吃剩下的奎宁，把它放在口里咽了下去。

我们走下山时，前边的伤员已经在路边的林子里休息了。

我们和村长谈了一下情况，估计这个村子距敌人有20多里路。为了伤员安全，村里派人到山下放哨，我们在村口瞭望。

我们还和村长查看了退路，让伤员和衣而睡，以备不测。幸好，这一晚没发生什么事。天没亮，老乡们说已经给我们做好饭，村长还派了领路人。吃饭后太阳也出来了，我们这支伤员队伍又出发了。

这几天的经历，使我们感到陕北老区的人民真好！他们把窑洞让给我们住，拿出粮食给我们做饭，给伤病员拉毛驴、抬担架、带路、通知情况，真是无话不说，无事不做，使我们这支伤员队伍在敌人的眼皮底下畅行无阻。革命的胜利，与人民的支持和帮助是分不开的

就这样，我们和离我们不远的敌人周旋着，有时能听到枪炮声，有时静悄悄的，什么动静也没有。有一天，我们来到一个叫巡检寺的地方。我们正在做午饭，忽然看见后沟里有四五个身穿灰军装的骑马人飞驰而来，他们见我们30多个人在一个院子里吃饭，便冲我们而来，一齐下了马。为首的一位同志问："你们是哪部分的？"

我说："我们是第四后方医院的，带着30多名伤病员转移，途中遇上了敌人，现在正不知该上哪儿去呢？"

他说："我们是总部的。敌人已经过去了。我们去追一后方医院，他们上吴旗方向去了。"

我们告诉他："前两天我们还和一后方医院在一块住了一夜，后来他们走了，我们没赶上。"我们又问："我们该怎么办？"他给我们写了一张纸条，叫我们先到乌龙堡去找叶参谋长，说他会告诉我们到哪儿去找四后方医院。我们让他们吃饭，他们说："不了，还有急事呢！"于是他们又上马顺大路向西疾驰而去。

我们吃完饭，转而向东走，大约经过两三天的路程，我们来到一个半山坡的村子。那里有许多军人，还有哨兵。他们问我们是哪部分的，干什么的，到哪儿去。我们说，我们是四后方医院的，到乌龙堡找叶参谋长。他们又盘问我们怎样知道的，有什么证明没有？我便把那张纸条拿出来给他们看了，他们这才给我们安排了住处，说他们可以替我们先联系一下，后来又说叫我们明天去见叶参谋长。我想，这

张纸条可真重要！

第二天，我、刘银贵、马五甫三个人被带到一个山窝的林子里，那里有一个由三孔窑洞组成的小院子，里面安静得很。带我们的同志给院里的一个军人说了几句话，那人进窑去，不多一会儿出来了，叫我们三个人进去。我们进到窑里，只见在一个临时用木板搭成的长桌旁边，站着一个穿灰单服的人，他背后的墙上挂满了军用地图。我们向他行了个军礼，说我们要找叶参谋长，并把那张纸条拿出来给他看了。他说，他就是叶参谋长，有什么事可以向他讲。我们向叶参谋长报告了我们的情况。叶参谋长让我们先在这儿住下，等联系好了，再回医院去。这时有电话来，他接完电话后拿了两个小红旗，走到地图前，插在一处，看来电话是报告军情的。我们见首长有事，便告辞了。他送我们到门口，我们一同向他行军礼告别。

我们被安置在乌龙堡前边山脚下小河旁的一个村子里，并在那儿过了端午节。端午节那天，叶参谋长还特意派人为伤员送来了一只羊，一些白布。我们在战争中还过了个丰盛的端午节。

在这儿停留期间，我们还看到了毛主席、周副主席，他们都是我们在延安时多次见到的，一见就认识。我们才知道这个小山窝，原来住的就是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前些日子，敌人刚从这里经过呢！蒋胡匪军日夜寻找着我们的总部，我们的总部就在他们旁边，他们却有眼看不见。我们的总部毛主席党中央，有着陕北人民真心实意的保护，敌人只能是睁眼瞎。敌人在人民的汪洋大海里，只能是四处碰壁，而我们对他们的行动，却了如指掌。

过了端午节，我们接到通知，叫我们到马蹄沟找西北联防司令部，找王司令员，那里会进一步准确地告诉我们医院所在地。因为我们从志丹县出发时送我们的毛驴和担架已经返回家乡去了，我们又重新动员毛驴和担架上路。

由于休息了许多日子，我们每个人都养足了劲儿，急于回部队的

心也绷得更紧了。担架和毛驴转运伤员的方法也改为一程一程向前送，再加上有的伤员的伤情因长途跋涉恶化了，要坐担架。凡此种种，都要求我们加快步伐，尽早回到医院使伤员能够得到及时的治疗。

我们沿着大理河，顺着大路向前走，每天早起晚睡，最多一天走120里。伤员同志不论伤轻伤重，谁也没有说过什么怪话，大家一个心眼想早日摆脱敌人的包围，回到医院去。

现在一些人伤情重了，特别是刘国清和张排长，他们都伤在脚上，而且都有骨折，这么长时间骑毛驴，脚肿得老大，伤口直流脓。那时又没有抗生素，疼得他们实在没法，喝点鸦片酊，但喝的稍多点，又吐的不行。伤员的痛苦，使我们心里着急，老乡也不忍心。为加快行程，我们轮换着抬上伤员飞也似的向前跑，空手的人还赶不上抬担架的。

经过3天的行军，我们到了马蹄沟，这儿是子洲县政府所在地，西北联防司令部也住在这儿。到了联防司令部，王维舟司令员看了我们的介绍信，用电话问好第四后方医院的确切位置在清水沟。我们又返回5里路，终于到医院了。

所里的佟宝山指导员、宁汉戈所长、杜亚非副所长和全所同志迎接了我们。他们向我们和全体伤员问候，并立刻把伤员安置到病房里去。我们向领导汇报了沿途情况。所里、院里对我们能在敌人包围下，把伤员带回来，给予很高的评价。

我们受到表扬，立了功，解放日报社戈壁舟还专程来访问。但是我们深深感到，没有陕北人民，没有各位领导给我们及时指明方向，我们要完成任务，也是不可能的，成绩应归功于党和人民。

原载贾芝主编，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延河儿女》247—252页

（作者 薛振和，当时是延中九班学生。后任陕西国棉十厂职工医院内科副主任医师。）

米世同：陕甘宁边区政府主要机构设置（节选）

第四阶段 1946年至1949年5月

1946年4月，陕甘宁边区第三届参议会在延安召开。林伯渠继续当选为边区政府主席，副主席为李鼎铭、刘景范。这一届新任命的厅处负责人有办公厅秘书长王子宜，副秘书长常黎夫；继续留任的有教育厅长贺连成，副厅长赵伯平，民政厅长刘景范，财政厅长霍维德，建设厅长霍子乐，保安处长周兴，保安司令高岗去东北后由王世泰接任。这年12月增设了审计处，处长由刘景范兼任。另外还成立了两个临时机构，总动员委员会和查缉毒品委员会，刘景范、王世泰分别兼这两个委员会主任。

1947年初因国民党军队进攻延安。3月8日，延安召开保卫边区的群众动员大会后，边府机关迁至安塞真武洞李家渠办公。为统一领导和管理各机关的工作，成立了战时后方办事处，主任马锡五。

撤离延安初期，边府领导进行了分工，副主席刘景范赴前总工作，任西北野战军后勤司令。主席林伯渠负责后方工作，成立了以林伯渠、王子宜、惠中权、曹力如等七人组成的后方委员会。为使边府机关更加干练、机动、灵活，1947年6月和8月对机关人员进行了两次缩编，后方机关总人数由1946年的8784人减为2864人，边府机关人数由553人减为220人。缩编后的边府机关主要负责人为：

1947年9月，办公厅改为秘书处正、副秘书长仍为王子宜和常黎夫。民政厅长刘景范因赴前总工作，由王子宜兼代厅长，副厅长唐洪澄。财政厅长范子文，副厅长黄静波。教育厅长贺连成、副厅长江隆基。建设厅长霍子乐、副厅长惠中权。保安处长周兴、副处长赵苍璧。为加强战时粮食工作，1947年5月，将原财政厅粮食局升为边府

直属局，厅长薛兰斌。这一年新成立的五个战时临时机构是：后方委员会、后方办事处、生产救济委员会、农业生产委员会、合作指导委员会。

1948年4月22日，延安光复。5月13日，边府机构迁回延安。

原载《延安文史资料》第四辑112—113页

（作者 米世同，延安革命纪念馆研究馆员。）

五、历史故事

彭德怀主持马蹄沟会议

1947年7月21 日，中共中央前委扩大会议在靖边县小河村举行，会议研究部署了全国的战略进攻，对陕北战场作出了进攻榆林的重大决策。

小河会议闭幕的第二天，彭德怀和习仲勋就离开小河，回到米脂县背坬村的西北野战兵团司令部。与此同时，西北野战军从三边等地迅速向子洲县水地湾、电市、周家硷、马蹄沟、双湖峪等大小理河一线集结。26日，彭德怀在米脂县背洼村的西北野战兵团司令部召开干部会议，对攻打榆林作出总体部署：在我围攻榆林时，如果胡宗南部按过去行进速度北援榆林，我军则有充裕时间攻克该城；如敌军增援迅速而未克，亦可调动其主力北上。

7月28日，彭德怀司令员从米脂县来到子洲县马蹄沟区。29日，在彭德怀司令员的主持下，西北野战兵团在子洲县马蹄沟位于新民寨三城的小学校里，召开了西北野战兵团第一、二纵队旅以上、新四旅、教导旅团以上干部会议。

不算太大的窑洞里，西北野战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司令员贺龙、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西北野战兵团副司令员兼第一纵队司令员张宗逊、西北野战兵团副政治委员习仲勋、西北野战兵团参谋长张文舟、政治部主任徐立清、副参谋长王政柱、第一纵队政治委员廖汉生、副司令员贺炳炎、第二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王震、副司令员彭绍辉、教导旅旅长兼政委罗元发、新四旅

旅长张贤约、政委黄振堂，一纵下辖三五八旅旅长黄新庭，政委余秋里，独立第一旅旅长王尚荣，政委朱辉照，二纵下辖独立第四旅旅长顿星云，政委杨秀山，第三五九旅旅长郭鹏，政委李铨，以及第一纵队参谋长王邵南、政治部主任洗恒汉、第二纵队参谋长张希钦、政治部主任王恩茂等各就其位。

会议首先听取了侦察人员的敌情通报和各纵队的情况介绍，通报了各战略区情况及晋绥与陕甘宁统一和榆林战役等问题，与会者就落实“小河会议”精神，如何进攻榆林，吸引胡宗南主力北上，配合陈赓、谢富治集团南下，谈了自己的意见和建议，最后作了详细地部署。在彭德怀、贺龙讲话之后，习仲勋着重对即将发起的榆林战役，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他说：“榆林是国民党军晋陕绥边区总部所在地，其西与宁马集团，南与胡宗南集团形成掎角之势，北与绥远傅作义集团相依，为国民党在陕北的重要据点。榆林城西有榆溪河，西北面均为广阔沙漠，东南是丘陵与沟壑，城墙坚固，易守难攻，我们必须充分了解和高度重视敌军特点，坚决执行中央军委的战略部署和彭总的战略决心，诱敌深入，拖住胡宗南主力深入榆林，以利于陈赓纵队南进和发展，也有利于西北野战军今后发展。”

彭德怀司令员在总结时指出：“榆林战役的主要任务是诱敌深入，是配合刘伯承、邓小平及陈赓纵队南渡黄河，打烂敌人的整体部署。我们拖住了胡宗南的主力深入榆林，就有利于陈赓纵队在陇海线上站住脚和发展。”

7月31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西北野战兵团更名为西北野战军。8月6日，西北野战军发动榆林战役后，调动了国民党政府军10个旅的兵力北上增援，策应了晋冀鲁豫野战军陈、谢集团南下黄河挺进豫西的作战行动。随后，西北野战军适时转移兵力，于8月20日在沙家店一举歼灭胡宗南的精锐部队第36师主力6000余人，扭转了西北战局，开始由内线防御转入内线进攻。

正如彭德怀所言，进攻榆林，吸引了胡宗南的主力尽量北上，虽然未克，但有力地支援了陈赓纵队在陇海线的全线出击，还在沙家店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

马蹄沟会议虽然只有一天，但因其特殊的战绩，已经在西北野战兵团史上划了浓浓的一笔。

贺龙双湖峪参加庆祝会

1947年3月，蒋介石指挥国民党政府军全面进攻解放区严重受挫之后，不得已改变方针，集中主要兵力对东西两翼的山东和陕北革命根据地实施重点进攻。为此，蒋介石调动他的骨干部队，养精蓄锐、装备精良的胡宗南集团和“青宁二马”马步芳、马鸿魁的三十四个旅计二十五万余人，准备入侵陕甘宁解放区，攻占延安。用国民党政府国防部的话来说，他们是要“摧毁匪方党、政、军神经中枢，动摇其军心，瓦解其斗志，削弱其国际地位。”

这时，在陕北的人民解放军只有四个野战旅，约一万七千人，在兵力对比上，处于绝对的劣势。但是，陕北黄土高原，山丘起伏，沟壑纵横，地形复杂，周旋余地大。中共中央军委决定：人民解放军在陕北战场的基本作战方针是，诱敌深入，必要时放弃延安，与敌周旋于延安以北的黄土高原上，陷敌于疲惫、缺粮的困境，然后，抓住有利战机，在运动中集中兵力逐次歼敌，将胡宗南集团拖死在陕北战场。

1947年3月18日，人民解放军主动撤离延安，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开始转战陕北的历程。

3月30日，贺龙从山西兴县赶到临县三交镇，在这里会见了从陕北赶来的周恩来。 周恩来向他传达了3月29日中共中央枣林沟会议精

神。并专门同贺龙研究了中央机关留晋人员具体问题和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的组建等。

7月中旬，正在晋绥军区碧村医院由一名苏联医生负责治疗的贺龙接到中共中央发来的电报，让他速去陕北参加一个重要会议。苏联医生不同意他去，可贺龙想，西北战场战火正酣，这个时候开会，一定有关系到全局的大事要讨论。他必须出席，不能请这个假。决定立即出院。院方无奈，只得让这位苏联医生跟随他去陕北。

7月18日，贺龙赶到了靖边县小河村。7月21日，由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小河扩大会议召开了。会议决定由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贺龙统一领导这两个区的后勤工作，给横刀立马的彭大将军当“供给部长”。

小河会议结束后，贺龙很快回到了马蹄沟区张圪台村的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不几天，贺龙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把晋绥野战军的最后一个野战纵队——晋绥野战军第三纵队调拨给了西北野战军。从此，集中全部精力，组织力量支援西北解放战争。

7月30日晚，驻扎在子洲县双湖峪的西北野战兵团独四旅和359旅召开大会，庆祝建军20周年。因为独四旅和359旅当时同属王震领导，贺龙是这支部队的老首长，所以通过邀请，贺龙司令员便专程从马蹄沟区张家圪台村的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赶来，参加了庆祝大会。

那天晚上，会场设在大理河川地里，前面搭了一个台子，挂着汽灯，在全场唱完《解放军进行曲》之后，王震司令员走到台前说：“再过两天就是建军二十周年了，为了纪念这一光荣的日子，也为了打好几天后的战斗，现在请贺司令员给我们做指示。”

贺司令穿着灰军装，戴着军帽，扎着皮带，非常随和地走到主席台前挥手致意。贺龙司令员说：“我知道你们很惦记毛主席，我告诉大家，毛主席、周副主席和任弼时书记都在咱陕北，他们都很健康，

工作生活都很紧张愉快。”等全场的掌声和欢呼声停了之后，贺司令又说，“我这一次来第一是向你们表示祝贺和慰问的，你们不到两个月就协同兄弟部队，干净利落地消灭了敌人3个旅，活捉了胡宗南‘四大金刚’之一的中将旅长李纪云，我这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理所当然地应该来看望大家。现在敌人比刚进犯边区时乖了点，像个乌龟一样，老是缩头缩脑的。”

说完，贺司令员自己哈哈大笑，下面的战士们也笑成一片。贺司令员接着又说，“从现象上看，是敌人还在追我们，实际上是我们牵着敌人的鼻子转圈圈。这就叫‘蘑菇’战术，把急于速战的敌人磨软，把抱成一团的敌人磨散。彭德怀总司令一贯善摆‘口袋’阵，咱们看准时机，好再来个瓮中捉鳖。”说完，做了一个双手合围的手势，全场哄堂大笑。

贺司令接着深情地说，“我这次来的第二件事情是要和同志们共同欢庆建军节的。从南昌起义到今天，就要整整20年了，这是不寻常的20年啊！我们跋涉了千山万水，经受了千难万险，从小到大，由弱变强。在过去的一年里，我们消灭了蒋军70多个旅，蒋介石如今又玩什么‘重点进攻’，对我山东解放区、陕甘宁边区和延安进犯，我看这是飞蛾扑火自取灭亡。蒋介石这个‘运输大队长’又要给我们送新的战利品了。几天之后，你们又将在新的战场大显身手，我希望你们能旗开得胜夺取新的胜利。”所有的战士都握紧拳头，表示一定。

这次建军20周年的庆祝会，没有演出任何文艺节目，听完两位首长的讲话就结束了。

战士们开完会摸黑回到各自的驻地后都在想，贺司令其实也是来动员战士打榆林的。因此，只休息了一会儿，鸡叫时分就紧急集合，开始向榆林方向进发了。

王维舟挂帅查泄密

1947年，随着陕甘宁边区政府驻在马蹄沟、中共中央西北局驻在水浇湾之后，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也来到了马蹄沟大理河南岸的张圪台村，

7月29日，西北野战兵团在马蹄沟召开旅（团）以上干部会议，可就在会议即将召开之前，国民党空军的轰炸机突然来到了马蹄沟上空进行轰炸，一颗炸弹掉到了彭德怀司令员驻地旁边电台工作人员住的窑洞顶上（现通三城门洞靠东第三孔窑洞，住张怀祥），由于是颗臭弹没有爆炸，幸未造成损失。但这件事对大家来说都感到非常意外。彭总也将三科科长找来问："为什么敌人的飞机跟得这么紧？盯得那么准呢？这一定有什么原因，通信部门要认真研究。"为了弄清原因，时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主持工作的副司令员王维舟便亲自挂帅，迅速调派精兵强将，调查这次遭到国民党政府军飞机轰炸的原因，寻找通讯工作中存在的不足。

几天过去了，事情的调查丝毫没有进展，大部分同志认为：野司和联司两部电台，发报机都是在延安用过多年带出来的，声音敌人都熟悉了，我们的发报手法敌人也摸清了，从而认准这是我军的重要电台，因此而追踪进行轰炸的。但没有弄清事实真相之前，调查侦破的决心丝毫没有松懈，他们一边随军转移，为攻打榆林作后勤服务，一边继续多方调查。

不久，清涧战斗西北野战军消灭了廖昂师，顺带缴获一部测向台，俘虏了几名测向员，据测向员口供，通过技术手段，国民党政府军凭借该测向台就可以随时掌握中共中央和西北野战军的指挥位置。三纵队自晋绥到陕北参战，每天行军路线、所到位置，敌人都了解得十分清楚。飞机轰炸马蹄沟前，由于西北野战兵团司令部的通信人员

和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的通信人员在延安时是一个单位，彼此都十分熟悉。几个月没有见面了，这次好不容易住在了河的两岸，于是就经常用电报来相互交谈。那一日，他们拍发了“请你台队长来玩”的英文明语，被国民党政府军通讯人员窃听到，并根据繁忙的电波频率，判断解放军可能要召开军事会议，结合测向信息的方位，派出飞机进行了轰炸，因此，西北野战兵团在开会前遭到了敌机的侵扰。

当知道敌人用了侦察测向，了解我军军事部署，对我军作战危害很大时，正好当时又发生了北平地下情报台被国民党政府军破获一事，两件事放在一起，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毛泽东主席立即发出指示，要设法对付敌人的测向定位，而且一定要做出成绩。专门由周恩来副主席主持召开了通信保密工作会议，参加的有军委三局局长王诤、机要局局长李子中、三局副局长王子纲、西北野战军参谋长张文舟、通信科长刘克东、副科长朱仕朴以及联防司令部的相关人员。周恩来在最后作了“划清系统，调整人员，改装机器，变换手法，模仿敌人，多种呼波，严守纪律，加强保密”的总结。

此后，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召开了落实会议。总结出电台的缺点为：手法没有调子，笨里笨气，不流畅；波长集中；谈话特别多；报头不一样；改换呼波不齐；下面很多家叫一家，上级台一出来叫多家。并据此作了相应的改进，主要是加强纪律性。技术上采取少用无线电通信；战斗布置开进途中不开机，打响后突然开机；勤改呼号和将呼号的被呼和自用分开等措施，最终获得了良好效果。

李鼎铭急治病人

1947年6月11日，陕甘宁边区政府机关从安塞县白庙岔来到子洲县马蹄沟区张圪崂村之后，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也随机关一起来到

了这里。

李鼎铭从从政开始，就充分体现了他深明大义的爱国情怀，追求真理、胸怀坦荡的高尚品格。不仅对主管的工作躬亲过问，而且不顾年迈体弱，坚持调查研究，作出了多方面贡献，发挥了特殊作用，获得了边区人民的敬仰和爱戴，得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高度评价。与此同时，他作为一位医术高明的中医大夫，中央领导同志身边的良医。在工作之余，还经常为毛泽东、徐特立、林伯渠、谢觉哉等人推拿按摩、望闻问切，并和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延安期间，毛泽东相信中医，就常请李鼎铭给他看胃病和风湿性关节炎。当时，传统中医经常被西医瞧不起，并且毛泽东身边的西医也反对他用中药。但李鼎铭开出的药方常能见效，西医的大夫又不得不信服。毛泽东也很佩服这位看起来瘦弱但颇有见识的老人，经常借治病之机，和李老先生探讨包括中医、政权建设在内的一些问题，并通过李老向党外人士表达共产党和他们合作的诚意。同时，毛泽东还把李老先生介绍给周恩来、朱德等领导同志，李老也乐意为他们奉献自己的一技之长。后来，在毛泽东的倡导下，陕甘宁边区成立了中医研究会、中西医协会、中医保健社。李老在繁忙的公务之余积极参与活动，并兼任中医训练班主任，有力推进了中医中药事业的发展。

1947年7月的一天，陕甘宁边区政府张圪崂驻地不远的一位50多岁的妇女突感右下腹疼痛难忍，痛苦难堪，且高烧不退，被请来的医生诊断为“急性阑尾炎、腹膜炎”，并要求立即送往医院，进行手术治疗，否则就有生命危险。患者及家属听了后非常害怕，一时不知所措，就大哭起来。

刚刚开完会的李鼎铭副主席正在院外散步，听到哭喊声后急忙走了过去，问明情况，立即进行望闻问切，当确诊病情之后，马上安慰患者“不要害怕、这不算什么大病，一定能够治好”，并且很快拿出经常随身带的银针以针灸给其止疼，然后让随行人员到办公室取来自

家珍藏的广木香，将大蒜碾碎以黄酒拌之，让病人马上服下，结果病人很快就不怎么疼痛了，到了第二天就基本不疼了，连服三日之后，基本恢复了健康。病人家属及患者感激不尽，连说："李老真是神医。""是救命大恩人"，并且准备了礼品到边区政府驻地欲送给李鼎铭副主席，李鼎铭副主席见到后坚辞不收，说："救治病人，是每一位医生都应该做的，我虽然在政府部门为大家服务，但我也是一名医生，救死扶伤也是我应尽的义务"。

李鼎铭副主席精湛的医术、高尚的医德和不图名利的思想品德，受到患者及其家属和当地百姓的一致称颂。几十年过去了，故事依然流传，正如马文瑞1998年2月4日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说，李鼎铭先生是"中共党忠实的朋友 竭诚参政的典范"，高尚的精神将永远牢记在人民群众的心里。

马锡五调解纠纷

1947年6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和中共中央西北局先后来到马蹄沟之后，转战陕北的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马锡五也来到了马蹄沟。

这一日午后，他从边区政府驻地张圪崂前往中共中央西北局驻地水浇湾，途径水浇湾村中大槐树下时，看见许多百姓聚集在一起，手里握着铁锨等工具，议论着什么。来到西北局居住的王家大院，看见对面窑洞的吴姓院子里，也有许多人在议论着什么。凭着职业的习惯，他不由地走上前去进行询问。一了解，脑海里不由地吓了一跳。

原来，水浇湾这个村庄，主要居住着张、吴、王、薛、栾等大姓，由于张姓人口最多，吴姓比较刚烈，王、薛两姓人口相对较少，栾姓是文化人在外做官的多，因此一直流传着张姓说的"栾姓要避哪，吴姓要打哪，薛、王两家一马平"的话语。几天前，一场突如其

来的暴雨，冲毁了张姓的部分耕地，地的主人说是因为上面吴姓人将水渠架在自己的耕地中间而造成，因此而正在召集同族人员，准备作一决战。以讨回公道。

马锡五了解情况之后，立即让工作人员将张吴两姓中有威望的长者和当事人请来。双方的人员到了之后，马锡五没有作任何的批评，先请各位讲了自己的委屈或理由，然后便讲起了故事。说清道光年间，山西省寿阳县平舒村祁姓与邻居因修围墙为一尺地皮打起了官司，由于双方都是当地的富户，因此就不惜一切代价想压住对方。眼看官司从县里打到州里，祁家便派人到京城请自己的本家，道光皇帝的老师，大学士祁隽藻帮忙。祁隽藻了解了事情真相之后，什么话也没有说，让来人带了一封信回去。当来人回到家后，大家拆开信封一看，原来里面只有四句话。

“千里捎信为堵墙，

让人一步有何妨？

好地千年换百主，

自古人长天也长。”

祁姓本家人一看，回想起过去的许多事情，自叹不该，将计划占的一尺不占了，而且又让出了一尺，邻居见状后一时不解，待了解情况后，主动登门致歉，并承诺以后翻修院墙时也后退一尺，这场官司便不打自消了。平舒村也就有了三尺巷的地名。

故事讲完了，两姓中的当事者已将气消了几分，几位长者也连连点头称是。马锡五接着又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吴家将上面土地的排水渠直拨在下面土地的正中是不对的，但谁也没有想到老天爷会下这么大的一场雨呀。冲毁了的土地可以修复，但如果通过打斗造成人员的伤害，那就成了永远的。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张吴两家的地能够紧挨在一起，这可以说是一种缘分，应该得到珍惜，如果我们什么事都想动武，那是不是有些不够意思了？我们应该把眼光

放长远一点，不仅看到现在，也要看到未来，互相礼让一下，不就没有事了吗？

马锡五的一席话，说的双方心服口服，刚来时的火气没有了，吴家人当即表示回去后就更改排水渠的走向，使洪水不在从下面的地中流过，如果张家需要，他们还可以帮助修复冲毁的土地。张家的人也当场表示，地冲毁了损失不是很大，回去后他们一补就好了，今后一定不会再闹，以免失去双方的和气。

一场眼看就要发生的冲突就这样平息了，马锡五用自己的方式，解决了看似非常困难的问题，这也可以说是一种“马锡五审判方式”。

其实，“马锡五审判方式”是马锡五在陇东工作时总结的审判经验，其主要的特点是：一是走出窑洞，到出事地点解决纠纷；二是深入群众，多方调查研究；三是坚持原则，掌握政策法令；四是请有威信的群众做说服解释工作；五是分析当事人的心理，征询其意见；六是邀集有关的人到场评理，共同断案；七是审案不拘时间地点，不影响群众生产；八是态度恳切，使双方乐于接受判决。集中概括起来，就是“司法工作中的群众路线”。这种审判方式归结为“就地审判，不拘形式，深入调查研究，联系群众，解决问题”，在新中国成立后对人民司法工作的发展也产生过深远而积极的影响。

进入21世纪之后，马蹄沟人民法庭在这片红色土地上，认真落实司法为民的要求，积极探索新时期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新方法、新途径，全面强化民事调解职能，在辖区内创建了广泛的调解服务网络，大量民间纠纷被就地化解，有效地维护了社会的稳定，人民的安定，使“马锡五审判方式”得以发扬光大，受到了党、政府和人民的一致肯定，2005年3月，捧回了由最高人民法院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联合颁发的、陕西省司法系统唯一的“金天平奖”，为陕西人民赢得了荣誉。

岳嵩照顾老人队

1946年夏，国民党政府军以进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相继向华东、华北、东北各解放区展开全面军事行动失败之后，又转而采取重点进攻的策略，开始向山东解放区和陕甘宁边区进犯，妄图摧毁我革命根据地 。

是年冬，国民党政府军进攻延安的迹象已十分明显。时任三边分区专员公署二科（即财政科）科长兼缉私队长的岳嵩利用节假日从三边来延安，向边区财政厅汇报和请示工作。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同志知道之后，当即责成组织部门将岳嵩留下来，担任了边区政府办公厅行政处处长。

此时的延安已笼罩在战前的准备当中，战勤动员工作已扩大到边区参议会、常驻议会议员以及知名民主人士。按照战备的统一要求，机关采取军事化编制，编成许多大队，其转移及一切后勤保障，均由边区行政处负责。也就是说，岳嵩不仅要为整个机关的战略转移操心，而且还要照顾众多的老人和孩子，安排他们的衣食住行。

1947年3月13日，胡宗南督帅二十几万大军，由关中地区北犯，大举进攻延安。边区政府机关各单位按部就班地相继撤出，岳嵩带领留下的人员冒着敌机的轰炸，坚持做后续工作，直到3月18日黄昏，敌人的先头部队进抵延安杜甫川口的七里铺，岳嵩带领同志们检查了边区政府机关的各个角落，确信无一遗漏，才随政府电台和警卫部队最后撤离延安去追赶老人队和家属队。

延安城的失陷，国民党政府军得到的只是一座空城。他们气急败坏，四处寻机与我军主力决战。但此时，西北野战军在彭德怀司令员的指挥下，避其锋芒，以小部兵力将主力诱向延安西北安塞一带，主

力部队则埋伏在延安以东的青化砭，于3月25日痛歼敌31旅3000余人，活捉旅长李纪云。

1947年5月14日，边区政府在安塞的真武洞召开青化砭、羊马河、蟠龙三战三捷庆祝大会后，岳嵩带领浩浩荡荡的老幼队伍，转移到陕甘宁边区政府和西北局的临时驻地子洲县马蹄沟，驻扎在陕甘宁边区政府机关不远的地方。

据岳嵩后来回忆：当时编在老人队的有常驻议会议员刘培基，参议会议员“老蒙古”旗海田等，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常驻议会副议长谢觉哉、尚在绥德的副议长安文钦，参议会常委贺连成、霍子乐、霍祝三、杨明轩和晋绥边区的续范亭先生（临时来延安开会）等同志，虽未编进队伍，但也由边区政府行政处负责转移和疏散工作。家属队还有边区政府副主席刘景范的夫人李建彤、副秘书长曹力如的夫人田兴、民政厅厅长王子宜的夫人王劲、副厅长唐洪澄的夫人霍其洪、江隆基同志的夫人宋超和刘志丹将军的夫人同桂荣以及她们的子女、老人，共有老幼妇孺近百人。

这两个队的转移工作量是很大的。其中每一个家庭要准备1至2头牲口，除坐人，还要驮一些日常用品。孩子们单独编组，每3个孩子一组，小一点的孩子坐在骡子两边的驮笼里，大一点的孩子骑在骡子的背上，牲口由专人负责。思想工作也是有难度的，有些民主人士还有一些想法，不想和大家一起转移。自己要求找个地方隐藏起来。也有的老人东西很多，想全部带走。这些想法和要求，当时都不符合转移的要求，岳嵩就和各队的负责同志一起，一家一家地动员，一家一家地做思想工作，一家一家地安排，直到全部的老人和孩子们撤离。

在马蹄沟，边区政府办公厅行政处就住在陕甘宁边区政府机关对面的山坡下，面临川道的栾姓院落里，由于窑洞只有9孔，住房相对紧张，老人队和家属队好几口人才能居住一孔窑洞。岳嵩可就成了大忙人，白天在机关办公，晚上还要到各位老人和家属们的窑洞里去看一

看，询问有什么需要帮助。

老人队和家属队居住院落处不远的地方，就是马蹄沟地名来历的马蹄印，老人们喜欢谈古论今，孩子们喜欢追根问底，岳嵩便一有机会就带他们站在巨大的马蹄印前，将从老乡那听来的故事，一遍又一遍地讲给他们听，回答大家提出的各种问题。

8月初，西北野战军作了打大仗的准备，边区机关和各后勤部门，奉命陆续由马蹄沟转移到绥德义合北边一带待命。岳嵩也同老人队、家属队一起，离开了马蹄沟，一直向东，准备东渡黄河。

胡绩伟三皇峁办报

1947年3月18日，时任《边区群众报》主编的胡绩伟，同其他《边区群众报》的工作人员一起，离开延安，开始了转战陕北的生活。

《边区群众报》是中国共产党于1940年3月25日在延安创刊的大众化报纸，它以陕甘宁边区的普通群众和基层干部为阅读对象，当时是陕甘宁边区委员会机关报，始为四开两版。 1941年5月13日，《边区群众报》改为中共中央西北局机关报。由毛泽东亲自题名。

1947年5月31日，转战陕北的《边区群众报》社在离开延安72天之后，从安塞县朱寨村出发，经过两天两夜的急行军，于6月2日来到了子洲县马蹄沟大概五六里地的三皇峁后面的柴家圪崂。

柴家圪崂是因姓氏和地形而得名，位于小河沟入大理河口不远的河流东边，全村30多口柴姓人，就居住在前后的两个圪崂里，而这一家正好有一孔特大的窑洞，非常适合于安装机器，于是报社印刷厂便住在了这里。

《边区群众报》社的同志一到驻地，就开始了紧张地工作，安装机器，编排版面，用随身带的简易设备连续出版了三期油印报，待6月

6日石印机运到之后，报纸又恢复为石印报。又过了几天，等到对开的脚踏园盘机运到，从6月13日开始，《边区群众报》正式改为对开四版的铅印报。这时的《边区群众报》已经拥有了石印机、铅印机和六副排字架。但由于当时铅字不多也不全，临时雕刻也赶不上使用，有时候就只得用其他字号的字或同音字代替。这就使印出来的报纸大小字都有，有时还夹带着个别缺字的黑空。但这毕竟是人民政府在战争中自己建立起来的印刷厂印刷的报纸，虽然模样不太好，可读者得到这样一张报，仍然如获似宝。

由于村庄小，报社的人员无法全部就近居住，有的居住在后面的老庄沟，有的如胡绩伟就住在前面离报社二里多地的李家坬。每天天一亮他就去报社，晚上回到住地还要收集编排，有时候得到重大消息，为了赶出号外，深夜也要赶到报社去编排版面，工作可以说是没有时间性的，但他乐观向上精力充沛的精神面貌，常常能给职工们带去新的精神活力。条件是艰苦的，形势是紧张的，胡绩伟在努力完成好各项工作的前提下，念念不忘到群众中去，在同老百姓交谈的同时，熟悉群众生活，学习群众语言，并且把学到的知识及时应用到实际行动之中，使报纸办的更加通俗易懂，更加口语化、大众化，适合群众阅读。忙里偷闲，他还热情地帮助当地群众读报识字，经常和美术编辑一起，在报社附近的墙壁上写上标语，画上非常漂亮的宣传画，鼓励群众要相信困难是暂时的，胜利一定是属于人民的。

两个月的时间是短暂的，但留在脑海中的印象是深刻的，离休之后，胡绩伟多次在回忆录中提到这一段经历，高度赞扬了老区人民对报社的支持和帮助。

8月2日，由于战争形势的变化，陕甘宁边区政府和中共中央西北局相继离开了马蹄沟，胡绩伟同《边区群众报》社的同志们一起也从三皇峁出发，与次日转移到了绥德县义合镇的豆则沟，开始了转战陕北的新生活。

六、在马蹄沟各机构组成人员

中共中央西北局

书　记：习仲勋

副书记：马明方

常　委：彭德怀、贺　龙、习仲勋、林伯渠、马明芳、马文瑞、刘景范、王世泰、王维舟、李井泉、贾拓夫、谭　政

陕甘宁边区政府

主　席：林伯渠；

副主席：李鼎铭、刘景范

办公厅秘书长：王子宜（兼，1946.4—1947.9）

副 秘 书 长：常黎夫(1946.4—1947.9)

民 政 厅 厅 长：刘景范(1946.4—1948.4)

财 政 厅 厅 长：霍维德(兼，1946.4—1947.10)

教 育 厅 厅 长：贺连城(1946.4—1949.9)

建 设 厅 厅 长：霍子乐(兼，1946.4—1949.2）

保 安 处 处 长：周　兴(1937.9—1949.2)

审 计 处 处 长：刘景范（兼，1946.12—1947初）

高等法院院长：马锡五(1946.4—1949.9)

粮 食 局 局 长：薛兰斌（1947.5—1947底）

惠中权（代理，1947.5—1947.10）

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

司　令　员：贺　龙
政 治 委 员：习仲勋
副 司 令 员：王维舟 阎揆要

参加西北野战兵团马蹄沟会议人员

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
副司令员兼第
一纵队司令员：张宗逊
副　政　委：习仲勋
参　谋　长：张文舟
政治部主任：徐立清
副 参 谋 长：王政柱
后勤司令员：刘景范

第一纵队

司　令　员：张宗逊
政　　委：廖汉生
副 司 令 员：贺炳炎
参　谋　长：王绍南
政治部主任：冼恒汉
副　主　任：张国声
第三五八旅旅长：黄新庭　　政委：余秋里
独立第一旅旅长：王尚荣　　政委：朱辉照

独立第七旅旅长：傅传作　　政委：曹光琳

第二纵队

司令员兼政委：王　震
副　司　令　员：彭绍辉
参　　谋　　长：唐健伯
政 治 部 主 任：王恩茂
第三五九旅旅长：郭　鹏　　政委：李　铨
独立第四旅旅长：顿星云　　政委：杨秀山
独立第六旅旅长：张仲瀚　　政委：曾　涤

新编第四旅旅长：张贤约　　政委：黄振棠
参　　谋　　长：程悦长　　政治部主任：刘绍文
教导旅旅长兼政委：罗元发　副政委：饶正锡
参　　谋　　长：陈海函　　政治部主任：赵光远

中共子洲县委

县 委 书 记：任自新
副　　书　　记：高仰荣
秘 书 处 秘 书：李斗垣
组 织 部 部 长：王生源
宣 传 部 部 长：高振翰
统战部副部长：高树玉（主持）
社 会 部 部 长：白玉山

子洲县人民政府

政 府 县 长：李身修

秘书处秘书：张石修

一科（民政科）科长：高浩富

二科（财政科）科长：白云汉（先）呼宗佑（后）

三科（教育科至1947年秋）科长：张耀文

四科（建设科至1947年秋）科长：姬野黎

保安科科长：白玉山

司法处处长：李身修（兼）

自卫军大队长：李身修（兼）

税务局局长：李洪斌（先）张洪明（后）

马蹄沟区

区委书记：白云汉

区　　长：曹耀桂

七、部分在马蹄沟生活、工作过人物简介

习仲勋

习仲勋（1913－2002），陕西省富平县人，1928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西北野战兵团副政委、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代主席。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兼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第五、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马文瑞

马文瑞（1912－2004），陕西子洲人，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组织部部长、前委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西北局副书记兼西北局组织部部长、西北局纪委书记、西北行政委员会人民监察委员会主任，劳动部部长、党组书记，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兼陕西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陕西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政协第

六、第七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兼政协第七届全国委员会法制委员会主任。政协第二届、三届、四届、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共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

马明方

马明方（1905－1974），陕西米脂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副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陕西省人民政府主席、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国家财贸部部长。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三书记。是中共八大中央委员，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一、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马锡五

马锡五（1899－1962），本名马文章，字锡五，陕西省保安（现为志丹）县人。1930年参加革命，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高等法院院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最高人民法院西北分院院长兼西北军政委员会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是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政协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王　震

王震（1908－1993），湖南浏阳人。时任西北野战兵团第二纵队司令员兼政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5年授予上将军衔。曾任

中共中央新疆分局书记，新疆军区代司令员兼政委、铁道兵司令员兼政委，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国务院农垦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党校校长，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是中共第七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八至十届中央委员，第十一、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十三、十四大代表，第一至五、七届全国人大代表。

王子宜

王子宜（1907－1983），陕西省保安（今志丹）县人。1926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时任陕甘宁边区第三届参议会副秘书长、第三届政府委员，陕甘宁边区政府办公厅秘书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后，先后担任西北军政委员会人事部部长兼政法委员会副主任，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常务副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务部副部长，民政部顾问，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共七大候补代表，八大代表。

王尚荣

王尚荣（1915－2000），湖北省石首县人。1932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时任西北野战兵团第一纵队独立第一旅旅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5年授予中将军衔。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作战部副部长、代部长、部长、副总参谋长。是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七、八、十一、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八、十一届候

补中央委员。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王绍南

王绍南（1906－1979）湖北省天门市人。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时任西北野战兵团第一纵队参谋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5年授予少将军衔。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步兵学校校长，第一高级步兵学校副校长，汉口高级步兵学校校长，中国人民解放军防化学兵部副主任，顾问。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王政柱

王政柱（1915－2001），原名王正柱。湖北省麻城县（今麻城市）人，1933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时任西北野战兵团副参谋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5年授予海军少将军衔。曾任西北军区副参谋长，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参谋长兼西海岸指挥部参谋长，海军青岛基地副司令员，海军南海舰队第一副司令员，总后勤部副部长，总后勤部顾问等职。

王恩茂

王恩茂（1913－2001），江西永新人，时任西北野战兵团第二纵队政治部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5年授予中将军衔。曾任新疆军区司令员

兼政治委员，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政治委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南京军区副政治委员，中共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兼沈阳军区副政治委员，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第六届、七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是第八届、九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一届、十二届中央委员，第一届、五届、六届全国人大代表。

王维舟

王维舟(1887－1970)，原名王天桢，四川宣汉县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时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兼西南民族学院院长，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委。是一、二、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七大中央候补委员，八大中央委员。

刘绍文

刘绍文（1912 － 1981），原名刘秀文，江西省吉安县（今吉安市吉州区长塘镇赵塘村）人。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2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时任新编第四旅政治部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5 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干部部处长，三部副部长，山西省军区副政治委员，北京卫戍区副政治委员、第二政治委员、第三政治委员兼中共北京市委书记。

刘景范

刘景范（1910－1990），又名刘荡平，字子忠，陕西省保安县(今志丹县)人，时任边区政府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担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第一副主任、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部副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副部长。中顾委委员等职。

朱辉照

朱辉照(1911－1964)，江西省莲花县湖上乡南村人。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时任西北野战兵团第一纵队独立第一旅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5年授予中将军衔。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军政治委员，中共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委员会常委，西北军区干部管理部副部长，中央军委民航局局长、党委书记，中国民用航空局局长、党委书记。

江隆基

江隆基（1905－1966），又名泮庵，字盘安。陕西省西乡县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副厅长、后委成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西北军政委员会教育部部长，北京大学党委书记兼副校长，兰州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中共甘肃省第三届委员会委员。是中共八大代表，第一、

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

余秋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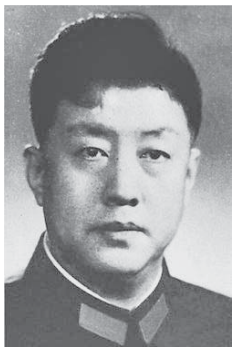
余秋里（1914－1999），江西庐陵（今吉安）县人，时任西北野战兵团第一纵队第三五八旅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5年授予中将军衔。曾任解放军总后勤部政治委员、总后勤部党委第二书记，石油工业部部长、部党组书记，国家计划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兼秘书长，国家计委主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军委副秘书长。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

张文舟

张文舟(1912－1986)，原名霍昭汉，山西省沁县人。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时任西北野战兵团参谋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5年授予少将军衔。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参谋长，中国人民志愿军代参谋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第一副院长，装甲兵副司令员兼装甲兵学院院长。是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会常务委员。

张仲瀚

张仲瀚(1915－1980)，河北沧县人。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时任



西北野战兵团第二纵队独立第六旅旅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九军政委，第三兵团政治部主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二政委，新疆自治区党委常委，新疆军区副政委，中央农垦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顾问。是中国共产党八大代表和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张国声

张国声（1912－1997），山西翼城县人。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时任西北野战兵团第一纵队政治部副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共青海省委常委、书记处书记，中共西安市委书记处书记，中共西安市委书记，中共青海省委常务书记，青海省省长，中共青海省顾问委员会主任。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七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常委。

张宗逊

张宗逊（1908－1998），陕西渭南人，1926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时任西北野战兵团副司令员兼第一纵队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5年授予上将军衔，曾任第一野战军暨西北军区副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训练总监部副部长，济南军区副司令员，总后勤部部长。是中共第七、八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十届中央委员，第一、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

张贤约

张贤约（1911 — 2002），安徽省金寨县人。1929 年 10 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0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时任新编第四旅旅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5 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曾任西北军区空军副司令员，西北军区后勤部部长兼政治委员，总后勤部汽车拖拉机管理部部长，总后勤部副部长。是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张德生

张德生(1909－1965)，学名张世德，字心余、辛余，曾用名博五、仲房、老关、德甫等；陕西榆林 (今榆阳区)人。时任西北野战兵团政治部副主任，前委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甘肃省政府副主席，中共中央西北局统战部部长，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兼陕西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陕西省第一、二届政协主席，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是中共八大中央候补委员。

李　铨

李铨（1912－1968），江西庐陵（今吉安）万福镇塘东村人。1930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时任西北野战兵团第二纵队第三五九旅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5年授予少将军衔。曾任伊犁军区政治委员兼中共伊犁区委书记，新疆军区军政委，

新疆军区副政委，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处书记。是中共七大代表。

李鼎铭

李鼎铭（1879－1947）原名丰功。陕西米脂人。1941年夏，以无党派人士身份，先后当选米脂县参议会议长，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副议长，边区政府副主席。同年，在边区参议会二届会上提出“精兵简政”议案声名远扬。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

杨秀山

杨秀山（1914－2002），原名杨木森，湖北省沔阳县（今洪湖市）人。时任西北野战兵团第二纵队独立第四旅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5年授予中将军衔。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军区副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副院长兼党委副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学院院长兼党委书记。是中共七大、十二大代表，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十一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中共十二、十三大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陈海涵

陈海涵（1914 － 1994），福建省上杭县人，1928 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 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时任教导旅参谋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5 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曾任西北军区空

军参谋长，桂林步兵学校校长，广州军区副参谋长，副司令员，顾问等职。著有《在彭总指挥下》长篇回忆录。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冼恒汉

冼恒汉（1911－1991），广西壮族自治区田阳县人，壮族。时任西北野战兵团第一纵队政治部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5年授予中将军衔。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高级步兵学校政委，西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兰州军区政委、第二政委、第一政委，中共甘肃省委第一书记。是中国共产党第七、八大代表，第九、十届中央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四届代表。

周　兴

周兴（1905－1975），原名刘维新，江西永丰人。1925年参加革命。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保安处处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公安部副部长，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云南省省长、中共云南省委书记处书记，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兼云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昆明军区政治委员。是中共第九、十届中央委员，第三、四届全国人大代表。

林伯渠

林伯渠（1886－1960），原名林祖涵，字邃园，号伯渠，湖南省常德安福（今临澧县）人。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新中国成立后，林伯渠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一、二届副委员长。是第七、八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罗元发

罗元发（1910－2010），福建省龙岩县人。1929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时任西北野战兵团教导旅旅长兼政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5年授予中将军衔。曾任北疆军区司令员兼中共北疆区党委书记，西北军区空军司令员，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军区空军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副司令员兼国防科委副主任，国防科委顾问。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九届候补中央委员。

范子文

范子文（1909－1975），又名范嗣淹。陕西省绥德县人。1928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财政厅代理厅长、后委成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人事部局长，中央人民

政府直属机关委员会副书记，中央人民政府对外贸易部副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部副部长。黑龙江省副省长兼省政府秘书长，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政治部副主任。

饶正锡

饶正锡（1911 — 1998），又名重远。湖北省钟祥县人。1930 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2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时任教导旅副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5 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曾任第二十二兵团副政治委员，中共迪化（今乌鲁木齐）市委书记、市长，中共新疆分局组织部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部长兼政治委员，总后勤部副部长兼卫生部部长，总后勤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贺　龙

贺龙（1896—1969），原名贺文常，字云卿，湖南桑植人。时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5年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曾任西南军区司令员、中共西南军区党委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在1956年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贺连城

贺连城(1890－1958)，又名家璧，陕西米脂县城南关人。清末毕业于陕西三原宏道高等学堂。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厅长。多次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的接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司法部副部长、最高人民法院西北分院副院长，陕西省司法厅副厅长，陕西省人民委员会委员。是陕西省人大代表。

贺炳炎

贺炳炎(1913－1960)又名明言，原名向从炎，湖北省松滋市人。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时任西北野战兵团第一纵队副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5年授予上将军衔。曾任第1军军长兼青海军区司令员，四川省军区司令员，西南军区副司令员，成都军区司令员，四川省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等职。是政协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

唐洪澄

唐洪澄，（1908－1960）原名贺生春，陕西省清涧县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委员、后委成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甘肃军区天水军分区政治委员、党委书记，中共甘肃天水地委书记，中共陕西省委副书记，中共

陕西省委书记处书记。是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共八大代表。

唐健伯

唐健伯（1904－1978），四川省金堂县人。1932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时任西北野战兵团第二纵队参谋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5年授予少将军衔。曾任晋绥军区南下工作团参谋长，成都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军事接管委员会副主任，川西军区参谋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兵器材部副部长、部长，工程兵副参谋长。

徐立清

徐立清（1910－1983），原名徐映清，安徽省金寨县人。时任西北野战兵团政治部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5年授予中将军衔。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干部部副部长，总政治部副主任，济南军区政治委员，成都军区第一政治委员。是第一、二、三、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三届人大常委，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共产党第七、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十一届候补中央委员。在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贾拓夫

贾拓夫，（1912－1967），原名贾耀祖，曾用名贾元、拓夫、红光、虹光、关烽、绍先，字孝先，陕西神木人。1928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常委、后方党组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西安市委书记、西安市市长，国家计划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国务院第四办公室副主任，主任兼轻工业部部长、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监事会主任，国家经济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党组副书记等职。

郭　鹏

郭　鹏（1906－1977），原名郭光前，湖南省醴陵县人。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时任西北野战兵团第二纵队第三五九旅旅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5年授予中将军衔。曾任喀什军区司令员，新疆军区副司令员兼军区党委第三书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常委，兰州军区副司令员、顾问。是第三、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顿星云

顿星云（1912－1985），原名顿新银，曾用名顿兴云，湖北省石首县人。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时任西北野战兵团第二纵队独立第四旅旅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5年授予中将军衔。曾任第

一兵团第五军政治委员，伊犁军区政治委员、党委书记，海军航空兵司令员兼党委书记，装甲兵副司令员、顾问。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

常黎夫

常黎夫（1912－2006），陕西米脂县人。1928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秘书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西北军政委员会秘书长，西北行政委员会秘书长，国务院副秘书长，中共中央西北局统战部部长，中共陕西省委常委、秘书长、统战部部长，陕西省第四届政协副主席和第五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顾委委员、第四、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曹光琳

曹光琳（1917－1994），江西南康人。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时任西北野战兵团第一纵队独立第七旅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5年授予少将军衔，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军三师政治委员，第1步兵学校政治委员，汉口高级步兵学校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国防部第5研究院副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

阎揆要

阎揆要（1904－1995），陕西省佳县人。时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司令员，西北野战军参谋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5年授予中将军衔。曾任中央军委情报部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装力量监察部副部长，济南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军事科学院秘书长、副院长、顾问。是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第五届委员会常委，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顾委委员。

黄振棠

黄振棠（1912－1996），江西省上犹县人。1932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时任西北野战兵团新编第四旅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5年授予少将军衔。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副政治委员，中国人民志愿军军副政治委员，北京军区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南京军区顾问。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黄新庭

黄新廷（1913－2006），曾用名黄新亭，湖北省沔阳县人。1931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时任西北野战兵团第一纵队第三五八旅旅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5年授予中将军衔。曾任中国

人民志愿军第十九兵团第一军军长，成都军区副司令员、司令员兼四川省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装甲兵司令员。是中共七大代表、第十一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中顾委委员，第三、四届全国人大代表。

傅传作

傅传作（1914－1982），湖北省石首县人。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时任西北野战兵团第一纵队独立第七旅旅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5年授予少将军衔。曾任中南军区空军副司令员，西南军区空军司令员，武汉军区空军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委员。是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候补代表，第九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届中央委员。

彭绍辉

彭绍辉 (1906－1978)，湖南湘潭人。时任西北野战兵团第二纵队副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5年授予上将军衔。曾任第一野战军参谋长，西北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训练总监部副部长，军事科学院副院长兼战术研究部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是第二、三、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

彭德怀

彭德怀（1898－1974），原名得华，号石穿，湖南湘潭县人，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时任西北野战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5年授予元帅军衔。曾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共中央西南局“三线”建设委员会第三副主任。是中共六届候补中央委员，第七、八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

惠中权

惠中权（1916－1968），陕西省清涧县后将军沟人。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粮食局代理局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农林部部长，中共海南岛区委代理第一书记兼海南垦殖局局长，国家林业部副部长兼西北林业建设兵团司令员。是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曾　涤

曾涤（1913－1971），原名曾垂坤，湖南浏阳人。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时任西北野战兵团第二纵队独立第六旅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5年授予少将军衔。曾任新疆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新疆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党委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

程悦长

程悦长（1911－1961），湖北省黄安县人。1932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时任西北野战兵团新编第四旅旅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5年授予少将军衔。曾任第六军十七师师长兼政委及迪化军分区司令员，第六军军长，新疆军区生产管理部部长，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副司令员，新疆军区副参谋长。

廖汉生

廖汉生（1911－2006），土家族，湖南省桑植县人。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时任西北野战兵团第一纵队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5年授予中将军衔。曾任军事学院院长，国防部副部长，北京军区政治委员，南京军区、沈阳军区第一政治委员。是中共七大代表，中共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中共第十一、第十二届中央委员，第一、二、三、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六、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薛兰斌

薛兰斌（1904－1991），原名薛馨亭，陕西子长县李家岔乡崖窑沟人。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粮食局局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后，曾任甘肃省农林厅厅长，中共黑龙江省嫩江地委书记处书记，嫩江专署专员，黑龙江省政协副主席，陕西省第四届政协副主席。是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霍子乐

霍子乐(1898－1967)，原名霍育丰，陕西绥德人。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建设厅厅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霍子乐担任西北军政委员会畜牧部部长，后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陕西省第二、三届委员会副主席。是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霍维德

霍维德（1902－1977），陕西省绥德县义合镇雷家沟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党组成员，陕甘宁边区政府财政厅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西北军政委员会交通部长，甘肃省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共甘肃省委第二书记，甘肃省副省长，中共甘肃省委书记处书记，山东省政协副主席等职。是第一、第二、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八、大事记

1947年

6月11日，陕甘宁边区政府（以下称边区政府）由安塞县白庙岔转移到子洲县马蹄沟。先后一起来的还有中共中央西北局（驻地水浇湾）、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驻地张圪台）、第四野战医院（驻地清水沟）、被服厂（驻地吴家沟）、边区群众报社（驻地柴家圪崂）、延安行知中学（驻地霍家渠）等。

6月14日，边区政府财政厅发出关于接收各机关、学校、部队编余人员暂行办法。

同日，边区政府财政厅发出通知，为了加强战时粮改工作，粮食局改由边区政府直接领导。

6月15日，林伯渠和王维舟接到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并告彭德怀、习仲勋、马明方，叶剑英、杨尚昆电，文中指出："敌之'清剿'，主要在骚扰我区，捉走壮丁。据我们经验，只要我们采取积极态度，坚持反'清剿'斗争，即使是十数人的游击队，经常保持与敌接触也可使敌踌躇不敢冒进，或者据山筑工，不敢下沟捉人。这样，既可迟敌前进，便我掩护群众及机关转移，又可阻敌骚扰，减少群众及机关损失。"

同日，边区政府发出命令，嘉奖延安县游击大队副大队长高善祥，颁发"新民主主义奖章"一枚。

同日，边区政府发出命令，决定在此次参军运动中，动员护士500名，到医院服务。

同日，边区政府办公厅发出通知——春耕播种期间各机关不得动员群众牲口。

6月16日，为加强财经部门的政治工作，边区政府任命贾拓夫兼任财经办事处政治部主任，屈志统为副主任。

同日，边区政府办公厅发出通知，要求各系统、各部门、各旅团首长立即清查纠正使用白洋敌币事，以后如发现使用，一律没收，其负责人应受到处罚。

同日，马明方致电马文瑞，要求速回西北局后委讨论恢复青年、妇女工作的组织机构等问题。

6月17日，边区政府发出命令。委任张仲良兼任陇东专署专员，谢怀德为第一副专员，李丕福为第二副专员；免去该专署原专员朱开铨职。还任免了庆阳、米脂等县县长、副县长职。

同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发出西北局关于发展党员的决定。《决定》在检讨“十年和平建设时期，党员发展几乎陷于停顿状态，地方党员仅占边区人口的3%，不仅数量少而且思想、政治水平偏低”的现状之后，指出边区在各个运动，特别是去年的土改和今年的自卫战争中涌现大批积极分子，使大量发展党员不仅必要而且完全可能。西北局决定在年内发展党员4.6万人左右，争取党员人数占到全人口的5%至6%。《决定》要求发展党员必须在自卫战争、参军运动、战勤工作和土改中进行，必须坚持以贫雇农为主的阶级路线，特别注意吸收青年积极分子入党。《决定》强调，发展党员应严格按《党章》要求，保证质量，并坚持个别吸收，严禁“拉伕凑数”和“集体入党”。

6月18日，边区政府发出关于保证邮路畅通的命令。

6月19日，边区政府发出战时邮政工作改进办法。

同日，林伯渠、马明方致电贺龙、李井泉，提出军队干部家属特殊化严重，应即进行整顿。

6月20日，林伯渠主席在马蹄沟会见了子洲县委召开的区委书

记、区长会议的全体代表，在会议上给基层干部作了长篇报告。主要讲了：我军为什么要撤离延安和当前的战争形势与任务；目前各项工作，土改、参军、支前及领导生产问题；如何转变各级干部作风以便适应长期战争需要。

同日，边区政府发出给子长县府的一封信。

同日，马明方致电张德生，说志丹、安塞已无敌人，我军将进行反攻。

6月21日，边区政府发出关于粉碎敌军“清剿”的指示。指示各级政府和干部应记取教训，组织领导群众，打击并粉碎敌军“清剿”，已遭敌军“清剿”蹂躏的地区，当地政府应组织群众互助，恢复生产，帮助群众解决一些困难问题；无论敌军已到或未到之地区，均应普遍建立民兵组织，大量发展游击队，经常袭击敌人，并牵制敌军“清剿”。敌军“清剿”撤退后的地区，应及时检查坏分子，镇压反革命，审查干部，改造乡村政权，掀起参军热潮，支援前线。

6月23日，马明方致电中共绥德地委，要求立即领导地方武装袭击敌人，并制止地方保甲送粮草资敌。

6月24日，林伯渠发出关于做好收复区群众工作给唐洪澄的指示信。

6月25日，马明方致电中共三边地委，要求在解决土地问题的基础上，发动群众进行扩兵和发展党员的工作。

6月27日，林伯渠主席撰写的“为前线立功”一文在《边区群众报》上发表。文中说：“在保卫边区、解放大西北的伟大人民自卫战争中，每次战斗的胜利，都涌现出成千上万的战斗英雄，为人民解放的革命事业立下了永垂不朽的功劳。在后方，为了保证前方胜利，边区人民开展运输、救护伤兵、供应粮草、反特锄奸以及生产节约、土地改革等战时工作，也开始涌现出一些模范事迹和英雄人物。但与前方主力部队的作战功绩相比较，则仍有逊色，甚至赶不上战争的需

要，落在战争发展的后面。须知战争是全面的、长期的、艰苦的，要彻底消灭蒋胡贼军达到最后胜利，就必须动员所有人力、物力，一切为着战争，一切为着前线，人人立功，事事立功。不论党、政、军、民，不论前方后方，不论男女老幼，在一切岗位上为大众、为自由、为保卫边区、为解放大西北建立功劳。把立功运动扩展成为群众性的热潮，为继续劳模运动，组织与动员干部及人民在对敌斗争中，发挥积极性、创造性。要根据不同工作、不同对象，经过群众路线具体组织他们，在参军参战扩大主力涌上前线中立功，在服务战勤担架运输中立功，在为作战部队烧水做饭、缝衣做鞋中立功，在增产粮食厉行生产保证供给中立功，在实行战时土地改革中立功，在响应政府一切号召和完成一切任务中立功，掀起群众性的立功热潮，使全边区人民的雄伟力量，在立功运动中以排山倒海之势支援前线，一直到最后消灭敌人。”

6月28日，边区政府发出命令，为加强各级政府对战时邮政工作的领导，规定各邮政分局由各专署民政秘书负责领导；过去无邮局的县份，应将代办所一律改为邮局，由各该县政府一科负责领导。

6月，为适应战争环境，边府机关进行精简整编，撤销了一批与战争关系不大的组织机构，紧缩了各厅局办事人员；撤销了总动员委员会，将战时动员工作划归民政厅统一管理。同时，大力加强兵站部工作，由其统筹安排和实施战时转运供给。待月底整编工作结束后，边区政府后方党政机关总人数为3746人，较1946年减少5038人。

7月1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召开陕甘宁边区一级党员大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26周年。会议由马明方副书记主持，林伯渠主席向大家讲述了中央苏区五次反“围剿”和长征的情况后说，陕北地形对我军作战有利，群众支持我们，其他解放区战场捷报频传，对西北战场也是个有力的支援。更有利的条件，就是我们在党中央毛主席的直接领导下，牵着敌人的鼻子转。我军突袭陇东，挥师三边，搞得敌人晕头

转向，这就是毛主席的“蘑菇”战术。这些条件加在一起，消灭胡宗南军队是完全有把握的。最后号召全体党员要严格遵守党的纲领、政策、决议和发扬艰苦奋斗的传统作风，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司令员王维舟，在讲话中从党与群众的关系讲起，号召每个党员都要成为遵守群众纪律的模范。

同日，边区政府发出紧急指示，在夏收夏耘紧急关头，敌军阴谋破坏，布置抢收新麦。因此动员战区群众进行抢收抢锄是目前反“清剿”的紧急任务之一，掩护群众抢收并坚壁于安全地点，为我地方政府、游击队的中心工作。要求各级政府必须抓好这一工作，并指示了具体办法。

7月2日，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西北局副书记马明方和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司令员王维舟接任弼时电：要求在半个月内，选送三十名身体强壮的新战士或其他适宜人员，担任中央电台发报机的摇手。

同日，边区政府任命榆横政务委员会副主任王恩惠兼任镇川县县长，免史文秀县长职。

同日，边区政府办公厅给子洲县李县长发来公函。曰：据行中工作团马区六月二十一日报告称：你县“保安科的俘虏兵二万多人，在四旗里村借老乡七个盆子、七八十个碗，有的竟拿丢了。”又在庙沟村时，李树林（当地自卫军干部）、李树茂（马区三乡自卫军连长）....（此处缺少）等，希即将以上事件查明真相，认真处理。

7月初，马明方在西北局机关驻地水浇湾同曹力如、师哲等研究延安以东地区的物资转移和抢运等问题。

7月4日，边区政府发出各机关不得包庇隐藏逃避兵役之青年的命令。

7月6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发出“关于蒋管区工作的指示（初稿）”。明确指出：目前全国正处于新的革命高潮前夜，我全面大反攻即将展开，西北战局也将很快发生变化，而其发展又必然使消灭

胡宗南收复边区解放西北的任务，紧密结合起来，任其功于一役。为此，蒋管区党的组织担负着光荣伟大的任务，应更加深组织广泛的反胡统一战线，开展人民的游击战争，以直接配合我军作战，在新解放地区积极发动与团结广大群众，组织民主政权，建立革命秩序等。

7月8日，边区政府发出重申六月一日通知的通知。

同日，民政厅发出对叛徒应分轻重处理的通知，为严肃政纪，教育干部，决定对干部中叛变投敌者，按干部任免权限由各级政府严肃处理。在处理中要注重事实，严格依照政策办事。

7月9日，林伯渠主席和夫人朱明在马蹄沟临时驻地，接见出席子洲县人民政府召开的教师会议的全体人员，勉励全体教师要坚守岗位教好孩子，不要被眼前的困难所吓倒，要支持正义宣传革命，要相信胜利和光明就在眼前。会后不久，全体教师分组支前。

7月10日，边区政府公布陕甘宁边区战时勤务动员暂行办法。其中规定，凡年龄在16岁以上、55岁以下、身无残疾的男子，均有服战时前后方勤务的义务。规定17岁至45岁之壮丁，根据需要，前后方勤务均出；其他年龄之男子，主要担负后方和村内勤务；高小以上学校的教职员、学生，在授课期间免服勤务。

同日，边区政府任命史文秀代理清涧县长，谭生晟代理延长县长。

7月15日，边区政府主办之《边区政报》第一期出版，林伯渠主席撰写了发刊词。主要内容有：陕甘宁边区政府关于粉碎敌军“清剿”的指示；陕甘宁边区政府关于对夏收夏耘紧急通知；专论：如何组织反“清剿”斗争；安塞七区反“清剿”中转移强壮的经验教训；战勤误工多，还是劳力荒废的；安塞六区遭受“胡灾”的损失和教训；子洲担架队如何从落后变成模范；道托民站——怎样招待过路军队；太行区保存公粮的经验。

7月16日，林伯渠、王维舟接周恩来、任弼时电：在敌向三边加强

活动的情况下，为了加强北面阻击敌人的力量，并加强我们驻地南面警戒，建议将七团之两个营及团部，暂调花子坪及以北地区活动一时期。

7月17日，边区办公厅函告绥德专署杨和亭专员，本府与西北局、联司共同决定，派联司后勤部部长方仲如为代表，赴河边清理边区一级党政军后勤人员家属及牲口。请派人同往协助清理，并负责该处后方人员之责。

7月18日，边区政府发出命令，重申禁止粮食出境及禁用粮食蒸酒熬糖，并颁布了查获出境粮食给奖办法。

7月20日，边区政府粮食局发出1947年上半年工作总结。

7月21—23日，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副书记马明方和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贺龙，出席中共中央小河扩大会议（简称小河会议）。会议决定，人民解放军挺进中原及晋绥与陕甘宁边区合并由贺龙统一指挥，习仲勋回后方主持西北局工作。

7月25日，西北局副书记马明方和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贺龙回到马蹄沟。

同日，边区政府任命白占玉为荣军教养院院长，刘耀三为政治委员，免去任廷辉院长职务。

7月26日，习仲勋、马明方致电三边部队，要求全力进行恢复工作，并与陇东地区取得联系。

7月27日，西北局书记习仲勋返回马蹄沟。

同日，习仲勋、马明方致电三边部队，要求三边光复后应着重发展地方武装，并做好扩兵工作。

7月28日，西北局召开撤出延安后的第一次委员会议，讨论如何支持攻打榆林问题。

7月29日，西北野战兵团司令部发出关于战用品处理的命令。

同日，在彭德怀司令员的主持下，西北野战兵团在子洲县马蹄沟位于新民寨三城的小学校里，召开了西北野战兵团第一、二纵队旅以

上，新四旅、教导旅团以上干部会议。

同日，马明方致电中共关中地委，要求尽快做好准备，积极开展游击战争。

7月31日，中央军委致电彭德怀并告贺（龙）、习（仲勋）又西北局，同意前委即以彭（德怀）、习（仲勋）、张（宗逊）、王（震）、刘（景范）五同志组成，彭为书记。西北野战兵团定名为西北人民野战军，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委；习（仲勋）为副政委。

下旬，正在马蹄沟的警卫连接到新华社总社来电，要求把坚壁在延川县冯家岔的印刷机器和设备，运输到山西碛口，准备出报。警卫连请示上级后立即出发，圆满完成任务。

同月，边区政府印发（子洲县）刘福昌担架队材料。

8月1日，边区政府发出命令，奖励一批在自卫战争中有功的人员。

同日，边区政府主办之《边区政报》第二期出版。主要内容有：前言；陕甘宁边区政府紧急动员令；陕甘宁边区政府参军动员令；陕甘宁边区政府关于战勤工作的指示；公布战时勤务动员暂时办法令；陕甘宁边区政府战时勤务动员暂时办法；财劳共负算法的举例说明；陕甘宁边区政府关于粮食问题的指示；陕甘宁边区政府关于目前粮政的几项具体指示；陕甘宁边区建设厅关于合作社工作的指示；陕甘宁边区财政厅关于目前税收工作的指示；嘉奖石秀山、王瑞臣、徐炳林；撤职董耀卿、王士英、撤职张爱民并送法院究办；嘉奖高善祥；撤职王世雄。

同日起，为配合西北野战军转入内线进攻，陕甘宁边区政府机关、西北局机关等单位，相继离开马蹄沟，经过绥德等地东渡黄河，前往山西碛口高家坪。

九、附　录

毛泽东与中共中央在巡检司

1947年3月18日，毛泽东与中共中央机关撤离延安，开始了转战陕北的艰难历程。

8月4日，毛泽东与中共中央机关由横山县肖崖则村出发，来到了子洲县的巡检司村。

毛泽东主席（当时叫李德胜）住在村西坐西面东的村民傅守申家5孔窑的第二孔窑中，中央副主席周恩来（当时叫胡必成），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当时叫史林），住在于此不远的另一家坐北面南的院子里，就在巡检司的窑洞里，指挥起规模宏大的解放战争。

到达巡检司的当天，毛泽东就为中央军委起草致陈毅、粟裕、谭震林、中共中央华东局并告刘伯承、邓小平电，提出山东(解放军)主力现在西边，请考虑粟裕带炮兵主力迅速去鲁西南，统一指挥陈（士榘）、唐（亮）、叶（飞）、陶（勇）五个纵队，积极策应刘、邓作战。电报指出："刘、邓南下作战能否胜利，一半取决于陈、唐、叶、陶五个纵队是否能起大作用。"

同日，毛泽东再次为中央军委起草致陈毅、粟裕、谭震林，并告中共中央华东局电："我们支午电发后，接你们江午电。我们仍主张粟裕迅即绕道聊城去郓城，指挥陈、唐、叶、陶五个纵队在郓城地区休整，就现有兵力在鲁西南积极策应刘、邓作战，不可丧失时机。粟未到前该五纵均归刘邓直接指挥，粟到后粟受刘、邓指挥。陈率六、

九纵俟水退后，迅速转至东边与二、七纵会合，从反面钳制鲁中、鲁南之敌。但你们的供应重心应转至鲁西南。”

当天，周恩来、任弼时致电贺龙、习仲勋、林伯渠和王维舟并告彭德怀。电报指出：从靖边向东，一路上均有伤员，后方人员及部队零星人员向群众频繁要差，影响当地政府备战和群众坚壁转移。为制止这种行为，“我们除在石湾设一纪律检查队，并在附近派出巡逻队”，希颁布办法，并“在马蹄沟设站严格检查过往人员”，将可以不用的牲口放回。根据周恩来和任弼时的指示，贺龙和林伯渠立即发布了《(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与(陕甘宁)边区政府联合通令--战勤动员应遵守纪律》(联字第一号)，以切实维护群众利益。

8月5日，周恩来致函高崇民（时任东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兼民政委员会主任委员及安东省主席）：“民盟二中全会决定由总部派特派员分驻东北、华北。民盟东北区总支工作范围以非解放区为限，东北解放区特派员由你担任。”

同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了给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副司令员粟裕、副政治委员谭震林和中共中央华东局并告刘、邓的电报。“各电均悉。（一）华东局仍应在胶东。陈率六、九纵应迅速转至东面，与谭及二、七纵会合，从反面钳制敌人，不使敌达到驱我过黄河目的。我们多次告诉你们，敌之基本计划是驱我过黄河，而不是迫我入滨海与胶东，你们必须重视此种企图。（二）但目前你们有五个纵队已到运河以西，正好协助刘、邓执行出击计划。对于此种计划，刘、邓及陈、谢集团（指由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第九纵队、西北民主联军第三十八军和太岳军区第二十二旅组成的作战集团，集团前委书记陈赓、副书记谢富治）准备已久，非有特别重大情况，不应轻易动摇。根据刘、邓江酉电，此次黄河大水已过，敌我均在抢修河堤，仍争取实现原计划。根据陈、粟、谭未支电，陈、唐三个纵队此次行动中仅减员五千余，不算很大，不必补充人员，

只需休息十天左右即可作战。各部略有损失即叫苦连天，你们应予指导。叶、陶减员较多，应酌量补充，但亦非不得补充即不能作战。该五纵均应集中郓城，由刘、邓指导整理。你们速派粟裕西去，统一指挥五纵，将全军供给重心经渤海转至鲁西南，争取在鲁西南立足，协助刘、邓作战，否则有被敌驱过黄河危险，你们必须严重对付此种情况。（三）待刘、邓南出最后决定并实现后，原先刘、邓所得之供给可拨交粟裕，加上渤海供给即可支援五纵作战。冀鲁豫仍属邯郸局管理，但应指定暂作华东局机动地区，望刘邓区处。”

同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了给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和政治委员邓小平的电报。“刘、邓并告陈、粟、谭：待陈、唐、叶、陶五个纵队渡过运河后，请令该五纵以有力部队沿运河西岸择要筑工固守，制止敌邱、欧（邱，指邱清泉，时任国民党军整编第五师‘原第五军’师长。欧，指欧震，时任国民党军陆军总司令部徐州司令部第三兵团司令官）西渡；主力集结郓城地区休整，并在郓城地区构筑防御工事，保证北岸接济。该五纵至少须有两星期安全休整，并待粟裕到来方能举行机动作战。在局面没有大开展时期内，该五纵主要任务是直接钳制邱、欧，即借以间接钳制陇海线上及其以北之敌，而不是直接钳制陇海及其以北之敌。只要该五纵能于你们出动以前，制止邱、欧西渡，又于你们出动后，能在鄄郓地区立住脚跟，不被邱、欧切断后路，则不但邱、欧不敢使用于进攻你们方面，即金乡、菏泽等地之敌亦将不敢轻动。你们意见如何，盼告。”

8月6日，是相当繁忙的一天。这一天，西北野战军开始了解放榆林战役。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在密切关注着榆林前线战事的同时，还在思考着晋冀鲁豫野战军南下作战和其他战区的问题。

这一天，毛泽东在为中央军委起草的给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和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副司令员粟裕的电报中说，“请转告陈、唐、叶、陶：目前整个形势对我有

利，敌已分散，我已集中。敌机动兵力分置于鲁中、运东、陇海（桂系等）三处，加以鲁西之敌新受巨创，士气不振，我则以一部钳制鲁中之敌，主力位于鲁西南；敌虽想从运河陇海两线向鲁西南进攻，但估计短时间内尚不可能；敌目前既怕你们全力向东攻邱、欧，又怕你们全力向南攻陇海。在此情况下，你们全军可以安全休整十天内外，鼓励士气，整顿队势，以利争取新胜利。此次华东各部虽有几仗未打好，但完成了集中兵力、分散敌人之巨大任务。待陈、粟率野直及六纵到郓、巨（指山东郓城和巨野），我军实力更厚，领导更强，对于争取新胜利极为有利。中央特向你们致慰问之意，并问全军将士安好。

这一天，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了给刘伯承、邓小平电。“刘、邓，并告陈、粟、谭：微巳电悉。敌现时计划是以邱、欧十至十二个旅由运河线，桂系四个旅为主力配合罗广文（时任国民党军整编第十师师长）等由陇海线，向我郓巨地区进攻，至少需两星期方能部署完毕。故你们从未鱼起，至少尚有十天时间，容许你们及陈、唐、叶、陶休整补充。因此：（一）你们仍争取至未删以后出动，最快未灰以后出动，不要太急。此时桂系刚到兰封（旧县名，1954年与考城县合并为河南兰考县），邱、欧在运河以东，你们南出暂时只需对付陇海线上之敌。（二）陈、粟率郓城五个纵队，再加六纵，目前主要任务是从侧面，将来则从反面（将来邱、欧可能南进）钳制邱、欧，如邱、欧由陇海线向南，陈、粟则尾随之。总之，陈、粟从反面钳制敌人最为有力。谭、许三个纵队则在滨海钳制鲁中之敌。（三）你们南出前不要企图再打一仗，南出后在沙河以北亦以避免打大仗为宜。”

这一天，毛泽东还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了给刘伯承和邓小平电。“刘、邓，并告陈、粟、谭、陈、谢：你们对于出动后敌之可能对策估计如何？我们觉得敌可能采取两种或三种办法。第一种办法，迅速组织进攻，使你们不能立足。但此种办法难于调动很多军队，估计可用于进攻者约十二个旅（或较多）左右，即七师、四十八师、十师、

七十九师、三师、五十八师各两个旅。其中除桂系外，战力均不甚强。其出发地点不一，在短期内，势必参差不齐。如我能于运动中歼灭其四五个旅，其攻势必受顿挫，我可取得休息机会，以利再战。敌此种办法的基本缺点，是进攻兵力太少，我之回旋余地甚大，并有迫我渡江南进之危险（敌很怕此着）。第二种办法，宁可给我以立足机会，不急于尾我进攻。除上述十二个旅（或较多）外，并从山东抽调十几个旅，共二十几个旅，以一个月至两个月时间，先从长江、平汉两线完成部署，然后向西向北进攻。此种办法之基本缺点，是给我以立足时间，且使山东攻势完全破坏，鲁西、豫东亦大部难保，即使集中二十几个旅，分两线多路进攻，我亦可能于运动中各个击破之。第三种办法，即同时采用上述两种办法，既以十二个旅左右分数路迅速进攻，又从山东抽调十几个旅用于长江方面。你们必须同时准备对付这几种办法，而主要准备对付第一种办法，即用全部精神注意于运动中大批歼灭敌人，一切依靠打胜仗。陈、谢出豫西后，胡宗南对陕北攻势必被破坏，除现已东调十师两个旅、七十九师一个旅及骑一旅外，必再调至少六七个旅，使用于潼关、商、洛（指陕西商州和洛南）方面，估计一个月内，很难举行有力进攻。此外，我两路南出后，合肥、安庆、鄂东、汉口、平汉（指北平至汉口的铁路）沿线，汉水流域及南阳、潼关、洛阳等地均须守备，而要守备这许多地方，非有几十个旅不可。敌在山东、鲁西、陕北之机动部队共有四十五个旅（山东二十九，鲁西八，陕北八），守备兵力则有九十六个旅（被歼者在内）。为要抽出几十个旅守备长江、汉水、平汉各地，不但有大减陇海线及其以北各地守备兵力之可能，且有将机动兵力一部改为守备兵力之可能。如此，则全局可能引起变化。只有在我南出兵团不能大量歼敌，因而不能立足，被迫缩回之情况下，就只能起临时调动敌人之作用，不能起变化全局之作用，且需付以较大伤亡、减员之代价。此种代价，无论起何种作用均须准备付出，但如能取得变化全局之作

用，则付出此种代价更加值得。”

这一天，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给中共中央华东局和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副司令员粟裕、副政治委员谭震林的电报：“鱼午电告你们，同意陈、粟率野直及六纵去鲁西南，谭（震林）黎（玉）许（世友）组成东兵团（指华东野战军东线兵团亦称内线兵团，下辖第二、第七、第九纵队和正在组建的第十三纵队等部），并同意华东局去渤海之建议。兹接饶（漱石）、张（云逸）、黎（玉）、曾（山）、袁（仲贤）微巳电，（张）云逸、（邓）子恢、舒同以全力组成西兵团（指华东野战军西线兵团，亦称外线兵团，下辖第一、第三、第四、第六、第八、第十纵队和特种兵纵队，并指挥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十一纵队）供应，华东局领导中心暂设东面，俟西面布置完毕，后方中心另作决定等语。关于华东局是否即日西移或暂留东面，何者较便，请华东局依情况决定。惟陈、粟应速西去，愈快愈好。”

这一天，毛泽东收到粟裕致军委并华东局：“自五月下旬以来，时逾两月无战绩可言，而南麻临朐等役均未打好，且遭巨大之消耗，影响战局甚大。言念及此，五内如焚。此外，除战略指导及其他原因我应负责外，而战役组织上当有不少缺点及错误，我应负全责，为此请求给予应得之处分。至（于）整个作战之检讨，俟取得一致意见后再作详报”之后，复电粟裕，“支午电悉。几仗未打好并不要紧，整个形势仍是好的。请安心工作，鼓励士气，以利再战。”

这一天，周恩来在协助毛泽东的同时，得知国民党政府军董钊部整编第一军企图向靖边青阳岔截击西北野战军后勤队伍的情报后，立即通知靖边青阳岔、横山石湾各区，并电告贺龙、习仲勋、王维舟：“一、刘戡鱼未（指今日）闻我三边资材、眷属微（指昨日）晨过薛家口子东进，电董钊派队向青阳岔截击，胡敌鱼未亦令抵靖边之突击队未虞（指明日）向青阳岔进，胡(宗南)已知我军在北面打响，但为粮食接济不上不能立刻派援兵，极焦急。二、望速令世泰（王世泰，时任陕

甘宁野战集团军副司令员）率所部暂勿去长武、邠州（今彬县），直向洛川、耀县间反复破坏(敌)公路运粮，以迟滞胡军北援。并令(绥德军分区)七团开冷窑则、石湾间，从正面迟滞敌人，掩护物资、眷属迅速东移。”

这一天，周恩来、任弼时还致电贺龙、习仲勋：中央机关部队八百余人，马二百多匹，七日将从麒麟镇出发，拟以三天行程赶过无定河后，即在庙岔以北或附近滞留几天，再转至石嘴宽滩地区，请派人至庙岔以北地区，准备三天到五天的粮秣。

8月7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了给刘伯承和邓小平的电报。“刘、邓，并告陈、粟：鱼辰电悉。（一）你们至少一星期不动，帮助陈、唐、叶、陶休整，并待陈、粟到来。（二）陈、粟集中六个纵队于郓鄄地区筑工固守，控制黄河渡口，不怕邱、欧来攻。万一不能守，退至黄河以北，转攻泰安一带，邱、欧亦不敢南下，孙震、刘汝明（孙震，时任国民党军陆军总司令部郑州指挥部主任。刘汝明，时任国民党军第四绥靖区司令官）亦不敢全部南下。（三）陈、粟六纵全部必须从内线，即从你们的反对方向钳制敌人，才是最有力的钳制。你们不要希望他们出陇海线直接掩护。（四）你们出动，全局变化。敌不可能专先打陈粟。（五）只要陈、粟六个纵队集中处于内线，一切有办法；如果分散南进，则全局不利。（六）叶、陶现到何处，运河西岸是否已筑工封锁，黄河船只是否不缺，过渡是否有利，嘉祥是否尚在我手，望即告。”

8月8日，毛泽东与中共中央离开子洲县的巡检司，经马蹄沟、双湖峪等地，于下午到达绥德县的李家崖。

（毛泽东在巡检司居住时间另一说为1天）

（搜集整理　栾世宏）

霍家渠行知中学调查

1947年6月，延安行知中学转移到子洲霍家渠，在这里住了五十多天。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为了全面掌握学校情况，与6月16日至7月2日对行中各方面的情况进行了摸底调查。

霍家渠行中调查

（1947.6.16—1947.7.2）

（一）人数调查

A：学校部分

1．教职员，共93人。

①校部：校长1人。

②教育处：主任2人，干事2人，油印2人，图书2人，医务所2人，计9人。

③事务处：主任1人，干部14人，炊事员12人，运输队11人，商店3人，作坊2人，通讯2人，理发2人，生活7人，其他4人，计58人（内有14名雇工，财政厅不批工资）。

④疏散安置干部及家属6人，娃娃5人。

2．学生：计177人（实际在校124人）

①工作团53人（其中教员1人）

②地干班31人；

③十二班（二年二）22人；

④二十班30人，二十三班41人（皆一年一）。在校教职员学生共计270人（除去工作团，实际在校217人）。

B：医院部分：共214人。

1．教职员

①校长1人，②教员17人，③教员及外务人员36人，计54人。

2．学生

①三年一22人，②二年二46人，③二年一36人，④一年一56人，计160人。

C：借调及疏散学生

1．延川野战医院（柳林）去冬借调45人；

2．第二野战医院（三月初）借调20人；

3．和平医院（四月份）借调20人；

4．给某纵队（五月份）4人；

5．疏散回家（请假不回）20人；

以上三部分共计592人。

（二）经费收支情况调查

1．生产基础

过去着重菜蔬自给，主要投资在土地上，计西菜园修水地23亩，旱地33亩，共56亩；（枣园）在东菜园、高峁湾又修水渠浇地、工程浩大，《解放日报》作过介绍（计浇地48亩），去年种的白菜在延安市数第一。

商店经营不为该校重视，日本投降后一度破产，后经卢校长亲自领导，1946年冬才积累了7000万元。1947年调查时的资产有：

①裕中商店：洋211525000元（一马一骡折价在内）；

②贸易公司：洋50000000元（3月份起）；

③学校存布168丈，洋34000000元。

以上合计洋259525000元。

注：商店中除去马驴折价，又贸易公司股本又不能抽出作流动资金，实际能拿出流通的仅2万万元整。另外存下的资本：骡11头、马3匹、驴4头、牛2头，计20头。（菜园两个，大车3辆已扔掉）。

2．标准与超支

（1）伙食

①每人每月标准3万元；

②实际开支：

科　目	标准（斤）	单价（元）	金额（元）
清油	75斤	200000	150000
食盐	1	5000	5000
蔬菜	22.5	5000	112500
石炭	30	350	10500
合计	278000元		

③每人每月差：洋24000元；

6月份按216人计（出外工作的53人除外）伙食一项共差：洋53568000元。

（2）办公费

①东昌纸：教员、学生、职员每人十张算，按200人计算，共2000张，每张2000元，共洋4000000元。

②笔：教员、学生、职员每人每月2/3支（铅笔、墨等即不再计了），按200人计算，共计134支，每支一万元，共洋1340000元。

③蜡纸：每月80张，每张20000元，计洋1600000元。

④油墨：每月4盒计，每盒800000元，计洋1600000元。

⑤粉笔：每月4盒计，每盒150000元，计洋600000元。

⑥油光纸：每月300张，每张10000元，计洋3000000元。

附注：学生每月十张纸绝不够用，起码应发15张，订账本及其他都未计算在内，据粗略估计每月实差数为80000000元。

（3）不足之数怎么弥补

①把学校存物消化了（如纸笔等）；

②贸易公司原投资8000万元，支了3000万元；

③作坊基金花了3500多万元（吃了东西没有付本）。

按现在开支情况（不增加学生人数）估计，再吃3个月即将资金开支一空，无法继续维持了。

3．问题

（1）假设没有固定地方，不能进行蔬菜自给，就没法想出经济上的出路；

（2）要不按实际标准批发，现况也不能维持，更谈不到扩大或恢复学生；

（3）开源节流问题（包括学校和学生方面）是目下一个大问题；

（4）教员米贴（五升）不能减，且需按市价发；

（5）贸易公司要给学校以便利条件。

学校的结论：政府若不给想法，又要学校坚持工作，就要逼着做违法生意了。

（三）教材调查

1．课程规定：每天上课4节，早晨1节，早饭后3节（早晨一节常有人不上，实上3节），下午生产或做群众工作。

课程规定为国文、政治（有讲义）、地理、算术、音乐（无讲义）

2．印出的讲义有（国文、政治）

（1）《贯彻民主作风和科学作风》（文字并不好）

（2）《边府关于战勤工作的指示》

（3）《边府关于开展春耕工作的紧急指示》

（4）《全力准备大反攻》

（5）《战局的转折点》

（6）《总考验》

（7）《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8）《四月九日训令》

（9）《村自治模范王家坪》

（10）《东塘调查》（毛主席）

（11）《大桥调查》（毛主席）——为了让学生作调查工作记笔记而讲

（12）《李家塘调查》（毛主席）

（13）《鲁忠才长征记》

（14）《边府紧急动员令》

（15）《你们不能绞死每个人的》

原载《陕西延安中学校志》

后　记

《中共中央西北局·陕甘宁边区政府在马蹄沟》一书，是由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马文瑞之子马晓文倡导编写的。全书共分九个部分，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中共中央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子洲县马蹄沟期间的工作与生活，是中共中央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政府转战陕北期间的资料辑。

一年多来，子洲县史志办在栾世宏搜集整理资料的基础上，先安排冯腾飞和栾世宏去延安搜集补充了陕甘宁边区政府在马蹄沟期间发的文件等资料，后安排冯腾飞、师建东和栾世宏去西安在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图书馆等处，搜集补充了部分《人民日报》有关当时陕甘宁边区政府和中共中央西北局的报道等资料，然后由栾世宏选择录入。

编写过程中，栾世宏又将他本人十几年来搜集、整理的有关陕甘宁边区政府和中共中央西北局在马蹄沟的书报文章、人物回忆及历史故事编入，其中历史故事是从人物职务排序，部分在马蹄沟工作、生活过人物简介是以姓氏笔画为序。并附录了“毛泽东与中共中央在巡检司”和“霍家渠‘行中’调查”，前者是栾世宏整理的毛泽东与中共中央机关在巡检司的写真，可以比较完整地了解当时马蹄沟区的具体情况；后者是边区政府教育厅在霍家渠对延安行知中学（延安中学的前身）进行的调查，如实记载了当时行知中学的基本情况，可以对边区政府转战陕北在马蹄沟时有一个侧面的了解。

在资料搜集中，得到了延安大学冯东飞教授、贺永泰副教授和陕

西省档案局（馆）王建领局（馆）长和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子洲县摄影家协会副主席拓毅同志提供了马蹄沟革命遗址的全部照片，中共子洲县委副书记焦延平同志作了序，送审过程中，先经陕西省新闻出版广电局审批，后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陕西省党史学会会长姚文琦研究员审读了全部书稿，提出了许多具体而中肯的修改意见；三秦出版社责任编辑甄仕优先生为本书的顺利出版付出了辛勤劳动，对此，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书经董万寄多次校审，冯腾飞、董惠等反复校对，尤其是栾世宏同志付出了辛勤劳动。在此，对编辑、印刷、帮助此书出版的所有同志，再一次表示诚挚的谢意。

由于时间仓促，水平有限和资料的匮乏，本书尚有疏漏之处，敬请谅解。

子洲县史志办公室

2015年6月30日